

中國邊政

第四十二期

目錄

清代初置駐藏大臣原因之探討	蕭金松
漠北外蒙古	學鉅
回紇文字的起源發展 及其與蒙古文字的關係	阿不都拉作 永樂多斯譯
滿清治新政策	羽田明著 宋念慈譯
西藏志的撰述人	楊和璿
先秦時代邊疆民族與中央之關係（續）	萬毅
奇蹟似的成吉思汗	史耀古譯
蘇俄人的民族性	顧耕野
西藏在我國經濟上的地位	白曉麟
文獻 粉碎共匪統戰陰謀、開創反共復國新局	陳裕清
文獻 突破艱危、開創新局	吳俊才

中國邊政雜誌社印行

中華民國十六年六月出版

一年來的蒙藏工作

本社記者

去年六月一日，在國家風雨連朝、橫逆迭至之際，隨着行政院改組，蒙藏委員會亦易長，由蔣院長提名政論家崔垂言先生繼任，到今天已屆一年，這一年來，蒙藏工作在政府整個革新要求下，也有很多的創新和發展。

革新組織與職掌、觀念與作法

任人皆知，以往蒙藏委員會的組織與職掌，是基於掌理蒙古各盟旗和西藏地方的行政而制定。自政府播遷來臺，該會施政的對象，已是追隨政府來臺、流亡在海外及沉淪於大陸的蒙藏同胞，但考其組織與職掌，却一仍舊貫，顯與現實脫節。據悉，崔委員長於接事之初，瞭解到這個事實，乃根據行政院機關重組的指示，集納該會工作同仁的智慧與經驗，檢討既往得失，針對當前需要，進行調整組織，釐定職掌，並加強工作人員觀念與做法的革新，從擬訂政策法令變為結納民意，由遇事被動變為積極服務，然後再輔以科學辦事的方法，以期能逐步提高行政效率。

確立新的施政目標

各種政績都應延續，任何事業皆需開展，這是該會崔委員長到任後向工作同仁提出的施政要領，同時並補充說明蒙藏的業務，都不能孤立的看待和支離的實施，而要把它們組合起來，朝向一個共同的、現實的目標推進。因此，確定該會新的施政目標：乃在團結並動員海內外蒙藏同胞，和衷共濟，擁護政府，因應世局變化，開創中興機運，全力策進反共復國大業。並準備在三個區域，暫先實現三項要求：

——在臺灣，對蒙藏同胞加強服務，發揮其潛力，支援政府衝破一切險阻。

——在海外，對蒙藏同胞普遍聯繫，溝通意見，粉碎共匪統戰陰謀。

——在大陸，配合有關機關，策進蒙藏同胞反共抗暴運動，加速共匪崩潰和滅亡。

召開全世界蒙胞反共愛國會議

召開全世界蒙胞反共愛國會議，為海內外蒙胞一致的願望，也是該會新定施政目標之一。此項會議，經該會與自由地區蒙胞

積極籌劃，乃於六十一年九月廿六日在臺北市中山堂光復廳開幕，計到會代表有：旅美蒙胞代表十一人，旅法蒙胞代表二人，旅西德蒙胞代表一人，旅日蒙胞代表二人，國內蒙胞代表一〇一人，此外並有蒙籍大專學生五十一人列席，共計一六八人。在開幕典禮時，總統特頒書面訓詞，副總統親臨致詞，各院部會首長蒞臨觀禮，至為肅穆隆重。會期三日，各出席蒙胞代表，反共立場堅定，愛國情緒高昂，計通過「譴責並警告日本田中首相訪問匪區決議文」、「全世界蒙古同胞反共愛國現階段行動綱領」、「全世界蒙胞反共愛國會議宣言」等重要議案，並決議成立「全世界蒙古同胞聯合會」。此次會議，不但加強了國人對我海內外各地區蒙胞反共愛國立場的認識，而且更使國際間對我全國各族團結一致，支持政府完成反攻復國大業，有更深刻的了解。故被譽為蒙古同胞繼民國十九年蒙古會議後，又一次重要集會，而其意義的重大，則遠超過蒙古會議之上。

在全世界蒙胞反共愛國會議閉幕後，該會又本「意志集中，力量集中」之旨，創刊了「蒙古通訊」，按期寄發海內外蒙胞閱讀，以報導國內外重要消息，溝通海內外蒙胞意見。

策進藏胞反共大團結

西藏在臺高級人士，為向世界表明堅定支持政府衝破國際逆流的決心，於六十一年九月十八日乘日本特使椎名悅三郎來華之際，聯名發表致日本田中首相公開信，抗議日匪勾結，申述我全國各族一致的信念，乃在蔣總統領導下，消滅共匪，光復大陸。六十二年三月十日為西藏同胞反共抗暴十四週年，在臺藏胞曾集會紀念，由西藏地方兩噶倫蘇康及宇托以藏語向大陸及海外藏胞廣播，並接受記者與電視臺訪問。其次，留印西藏人士經加強聯繫，近來對中央政府的言論，已有改善，如達賴喇嘛主辦的西藏自由報，最近刊載留印西藏教育噶倫功德林向藏胞羣衆發表的談話稱：「中華民國政府對共匪所持立場，與我西藏完全一致，因此我們有友好合作的希望」，「吾人所憎恨者為毛周匪幫及其所施暴政，對廣大漢族人民絕無任何仇恨」。云云。西藏地方與中央的隔閡，已經二十餘年，原有關係的恢復，必須具最大的決心，盡最大的努力，設法加強雙方認識的溝通與願望的調和。相信該會策劃進行之下，假以時日，必將大有成就，應可預料。

除上述各項工作之外，關於舉辦蒙藏維語廣播，蒐集及編譯蒙藏資料，輔助邊疆學術團體，輔導在臺蒙胞社團活動，聯繫海內外蒙藏同胞，接待海外蒙藏同胞回國參加慶典，輔助海外蒙藏同胞社團及文教事業等，必在已有的基礎上，繼續向前發展。

清代初置駐藏大臣原因之探討

蕭金松

一、清初帝國的擴張趨勢

滿洲崛起東北，自太祖努爾哈齊龍興（一六一六—一六二六）以來，襲併諸部，勢力漸盛，與朝鮮、蒙古諸部相抗，構成明廷北邊之大患。太宗皇太極（一六二七—一六四三）嗣立後，力量更大，先破朝鮮，繼犯寧遠，為明將袁崇煥所挫。正面受阻，遂採迂迴戰略，轉而征服內蒙。

其時，內蒙諸部以察哈爾、科爾沁二部最強。科爾沁因不容於親明之察哈爾林丹汗，更以位於東北境內之故，與滿清關係較深，歸附最早。在科爾沁勸誘之下，原屬察哈爾的杜爾伯特、札賚特及郭爾羅斯諸部，亦於太祖時代相繼投順。太宗以後，又繼續綏撫奈曼、敖汗、巴林、札魯特、喀爾沁及翁牛特等部，於是察哈爾勢孤。天聰八年（一六三四），太宗親征察哈爾，林丹汗不敵，西逃病歿青海，盡服內蒙古。是年十一月，察哈爾墨爾根喇嘛藏護法麻哈噶喇金身來歸，翌年八月，又獲元代傳國玉璽，遂改國號稱天子。

此後，滿清全力進行與明決戰，清除遼明勢力，及重建戰後中原秩序。暫停對漠北、青海及漠西蒙古的進一步征服，祇有透過內屬蒙古，與上述這些地區，保持親善、平等的非隸屬關係。直至康熙二十二年（一六八三），聖祖先後平定三藩之亂，及收服臺灣以後，為確實維護內蒙既有權益，及樹立新帝國權威，開疆拓土起見，遂又發動一項長達七十年的戰爭，繼續其祖先在蒙古未竟之遺業。

固然有種種理由，將清初西北用兵的責任，向失敗者準噶爾身上推得一乾二淨，如康熙、雍正諸帝之所辯白，縷述其不得已之苦衷^①。實則衡諸當時內外形勢，不僅漠西蒙古如準噶爾者，遠處滿清勢力之外。即漠北喀爾喀蒙古、青海和碩特蒙古，以至西藏達賴喇嘛，均非當時清廷實力所能控制。必聖祖先存「天覆地載日月所出之區悉以昇我」^②之心，及有朝一日盡入囊括之念，始不辭遠涉，共約達賴之使，參與喀爾喀七旗內爭之仲調^③；亦必欲利用宗教以安撫蒙古，始亟亟乎殷邀達賴班禪以東來^④。

再如康熙三十六年（一六九七）二月壬寅上諭：「朕閱經史，塞外蒙古多與中國抗衡，自漢唐宋至明，歷代均被其害；而克宜威蒙古，並令歸心，如我朝者，未之有也。」^⑤聖祖躊躇滿志之狀，盡露言表。准此，清初政策，未必非如蕭一山氏所云：「鑒於元朝賤儒蔑漢，暴力統治之失策，故不以旗兵為壓迫之工具，而以政治為籠絡之方法」^⑥；一方面「使漢人有聯合為治之想，無

亡國受制之虞」^⑦，一方面進而聯合蒙古以牽制漢人。所以清廷急於控制蒙藏，經營蒙藏，鞏固其外圍大本營。而盛清諸帝，以擴張版圖自壯聲威，藉對外武功安定中原文治，當即聖祖所謂「蕩寇所以息民，攘外所以安內」^⑧，不得已用兵準部之另解。

此外，清太宗天聰八年（一六三四）十一月，親征林丹汗後，有墨爾根喇嘛者，載元朝帝師八思巴以千金所鑄護法麻哈喇佛像來投。太宗命於盛京城西建寺供之，崇德三年（一六三八）八月廟成，賜名「實勝寺」，於東西建碑，勒以滿漢蒙藏四種文字^⑨。已預示未來大清帝國之發展，必將囊括東北、中原、蒙古、西北及西藏諸地為一國，合滿漢蒙藏諸族於一家也。

凡此均不難看出清初諸帝，俱懷擴張之野心，早於順治，甚至崇德時代，即已開始為將來一統帝國之規模預示藍圖，康熙乾三朝之經營，所謂十全武功，不過是踵其餘緒，逐步完成而已。如此大一統理想之追求，及多求無畏的征服，交互激盪的結果，使得最後的版圖，確定於帝國實力、客觀環境、及第三勢力等三大因素的適切調和上，其中任何因素的發生變化，都足以打破此種均衡，導致領土和勢力範圍的相應調整。這就是清初勢力一再擴張，如無底止，而曾幾何時，國祚中衰，在內憂外患之下，導致邊疆頻頻失地，邊疆問題層出不窮的局面。

註①：參見聖祖御製平定噶爾丹碑文，及東華錄世宗雍正九年四月上諭。

註②：聖祖御製平定噶爾丹碑文。

③：大清聖祖實錄卷一一九，頁二，卷一二六，頁二〇—一。

④：達賴喇嘛於順治九年（一六五二）至北京；康熙三十年以後，曾屢召班禪呼圖克圖來京，因第巴桑結陰阻，以未出痘辭。見大清聖祖實錄卷一七五，頁七；卷一八一，頁三〇；及卷一九二，頁九。

⑤：大清聖祖實錄卷一八〇，頁二三四。

⑥：蕭一山清代通史第一冊，頁二九，敘言。

⑦：同上註。

⑧：同上註。

⑨：大清太宗實錄卷四三，頁七一—〇。

二、清初喇嘛教的影響力

喇嘛教為西藏地域性佛教之俗稱，係揉合印度大乘佛教顯密兩宗，及藏地原始信仰^①而成。西元六世紀起，漸由印度及喀什米爾等地傳入，後經衍化，

重要者有寧瑪巴②、噶魯巴③、噶舉巴④、喜解巴⑤、薩迦巴⑥、爵義巴⑦、格魯巴⑧諸派。

其中薩迦、噶舉及格魯三派，從西元十三世紀以來，先後掌握西藏政教大權，影響尤為深遠。格魯派創始者宗喀巴（一三五七—一四一九），更採擇各派所長，成一家之說，教化所及，全藏靡然風從。晚年（一四〇九）自建甘丹寺於拉薩東北，其弟子儉樸、儉欽、根敦嘉巴，又分別創建哲蚌、色拉及札什倫布諸大寺。⑨

根敦嘉巴（一三九一—一四七四）示寂後，札什倫布寺為安法方便起見，遂仿噶瑪巴轉世之法⑩，迎請靈兒根敦嘉措（一四七六—一五四二），指為根敦嘉巴之轉世，確定了格魯巴的轉世制度⑪。再傳為鎮南嘉措（一五四三—一五八八），晚年曾應俺答汗之請，弘化於內蒙，並獲俺答汗所加「達賴喇嘛」之尊號⑫。第四輩達賴雲丹嘉措（一五八九—一六一六）就地轉生於俺答汗家，啓格魯巴政教結合之端，藉此黃教⑬盛行於蒙古，種下後來五世達賴依附和碩特蒙古及滿洲之因。

直到第五輩達賴阿旺羅桑嘉措（一六一七—一六八三），因鑒於後藏噶瑪巴及藏巴汗勢力之盛⑭，始藉青海和碩特蒙古之力統一全藏。並在順實汗的授權及監督下，開始達賴喇嘛的初期政教合一統治。同時又請其師羅桑却格堅參駐錫札什倫布，開以班禪呼圖克圖分掌後藏教法之端。⑮

如前所述，明清之際，以格魯巴為主流的喇嘛教勢力，已在精神上統治了內外蒙古，成為蒙古人精神團結的中心。元亡以來，衆蒙古分散不相統一，太祖嘗謂：「蒙古之人，猶此雲然，雲合則致雨，蒙古部落合則成兵，其散猶雲收雨止也；俟其散時，我當驅而取之。」⑯說明了清初對於蒙古，軍事上驅而取之，政治上分而治之，宗教上合而籠絡之的策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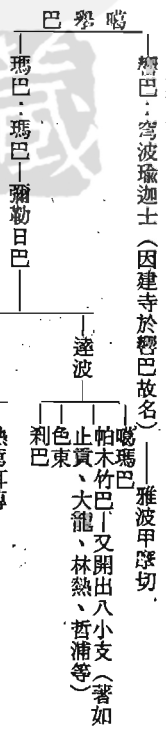
清廷與喇嘛教的接觸，早在入關之前即已開始，後以歸附之蒙古愈衆，愈使清廷重視喇嘛教，以至於利用喇嘛教，當作安撫蒙古的工具。自崇德四年（一六三九）循喀爾喀三汗之請遣使迎請，迄順治九年（一六五二）五世達賴來朝，清廷努力的目標，一如李鐵錚氏所云：「基於一項非正式的約定，達賴喇嘛藉其在蒙古政治上的聲望及威信，曾予清廷以有力助益；而達賴喇嘛在佛教世界領袖地位的獲得滿清皇帝之承認，亦有助於其宗教權威之提高。」⑰爲此，世祖更自述自太宗以來屢次遣使往迎達賴的眞意，謂「當太宗皇帝時，尚有喀爾喀一隅未服，以外藩蒙古惟喇嘛之言是聽，因往召達賴喇嘛。」⑱與高宗御製「喇嘛說」：「中外黃教總司此二人（達賴、班禪），各部蒙古一心歸之，與黃教即所以安衆蒙古，所繫非小，故不可不保護之。」⑲同可道破清廷二百餘年扶持喇嘛教，籠絡達賴與綏撫衛藏之動機。

註①：「鉢」（Bon）爲藏族之原始信仰，此種信仰普遍存在於古代之中亞、東北亞及西亞一帶，稱「巫」或「薩滿」。

②：寧瑪巴（Nima-Pa），譯爲舊派，此派總稱朗達瑪毀法以前之「前傳」佛教，祖述蓮華生大師。

③：噶魯巴（Gharu-Pa），譯爲教誠派，此派始自阿提沙尊者，時以佛教衰微，特倡重佛金口所宣聖教，以誠衆生，因之得名，惟至阿提沙弟子仲敦巴，始正式建立成派。

④：噶舉巴（Karma-Gyud-Pa），一稱「Kar-Gyud-Pa」，前者譯爲「教誠承傳」，後者譯爲「白衣承傳」。此派分支甚廣，參考劉立千印藏佛教史頁六七—六八，列表爲下：



⑤：希解巴（Zhi-Jed-Pa），譯爲「解寂」，謂依此派教授能得寂滅；初祖當巴桑結來藏五次，其攝授弟子又分前中後三期，遂各成派。

⑥：薩迦巴（Sa-Kya-Pa），譯爲爲白土派，乃因地立名。自管噶魯波至八思巴，號稱五祖，此後又分成薩、俄、刺、仲、貢諸小派。

⑦：得贊巴（Jo-Nang-Pa），爵義原爲地名，後成本派道場，因以名宗，實爲薩迦支派，至篤補巴時，派名始顯。明萬曆年間，多羅那他等重振宗風，後以後繼乏人，五世達賴將之吸收爲格魯巴，此派遂滅。

⑧：格魯巴（dGe-lugs-Pa），譯爲善規派，或稱格丹巴（dGe-lDan-Pa），以曾於格丹建寺故名。此派以聖教爲基礎，以清淨律儀爲本。以衣帽色黃之故，因稱「黃帽派」，清朝以後並以黃教爲通稱。

⑨：西元一四一六年倭樣（Jamyang Chojé）建哲蚌寺於拉薩西郊。一四一九年倭欽（Jamchen Chojé）建色拉寺於拉薩北郊。一四四七年根敦嘉巴（Gedun Trubpa）建札什倫布寺於後藏日喀則。參見 Tsepon W. D. Shakabpa: Tibet, A Political History, P. 85, 91

⑩：柏爾原著，宮廷譯述，「西藏之過去與現在」，頁二四。

⑪：據歐陽無畏「喇嘛教」（西藏研究）及文海出版社影印衛藏通志序等文，力駁俗傳宗喀巴道命二大弟子以達賴班禪轉世之說。另按前引夏古巴西藏政治史頁六五，謂「忽必烈曾嘗噶瑪巴帕克西（Karmapa Pakshi）於潛邸，此人死後又轉生爲來世噶瑪巴，是爲藏史第一位轉世活佛。」另據現強達賴喇嘛自傳「吾土吾民」藏文原本頁六，亦稱「噶瑪巴是西藏喇嘛轉世制度的開創者」。所以根敦嘉措之轉世，僅能說是格魯巴活佛制度之始，並不是喇嘛轉世制度之創始者。

註⑨：「達賴」為蒙古語「大海」之意，藏文則稱「嘉措」(Gyama Tso)，從根教嘉措起，歷輩達賴均以「嘉措」為名，至「達賴」之號，則至三輩達賴始受蒙古俺答汗之封，遂為定稱。

⑩：格魯巴以衣帽尚黃，俗稱黃帽教，清朝官文書又簡稱為「黃教」，見註八。

⑪：五世達賴轉世之初，噶瑪巴曾進佔拉薩各格魯巴寺院，肆加迫害，雖經逐出，不久藏巴汗繼為噶瑪巴護法，又聯合西康鉢教護法白利土司及青海韓克圖蒙古等，企圖毀滅格魯巴。參見夏古巴西藏政治史頁一〇〇—一〇五。

⑫：班禪為藏合體字，「班智達神寶」(Pandita-Chen-Po)之簡稱，譯為「大寶師」。自首五世達賴根敦巴創建札什倫布寺，受此稱號，後遂沿用為該寺首座之崇稱。羅桑却嘉堅參即為札什倫布寺首座「班禪」，後任第四、五世達賴經師，藏巴汗滅後，始正式受命分掌後藏教法，並為班禪轉世之始。

⑬：東華錄天命朝卷四，頁二〇。

⑭：T'ieh-T'eng Li: Tibet Today and Yesterday P. 34.

⑮：大清世祖實錄卷六八，頁一。

⑯：衛藏通志卷首，頁二七。

三、清初達賴與準噶爾之勾結

準噶爾為厄魯特之一部，原游牧於伊犁河流域。明清之際，其酋巴圖爾璦吉勢力漸強，凌逼諸部，土爾扈特率部西走，和碩特移牧青海，其餘各部盡臣服於準噶爾。順治十五年(一六五八)左右巴圖爾璦吉死，子僧格嗣，為庶兄車臣等所殺，改立僧格子索諾木阿拉布坦。時僧格同母弟噶爾丹在藏為僧，於康熙十二年(一六七三)歸以靖亂，執亂黨並殺其侄索諾木阿拉布坦，自立為準部長，自稱受達賴封以博碩克圖汗之號①。十六年(一六七七)噶爾丹以兵襲西套，狀和碩特鄂齊爾圖，破其衆。次年逾天山，擊破黑山黨，置官收稅。自是雄視西北，漸與清廷抗。

噶爾丹張西北之際，正值清廷東南及西南軍事方酣，無力北顧。但當準部襲殺鄂齊爾圖汗，青海和碩特諸部率部避居大草灘，清廷曾誘而漸至內附②。泊喀爾喀七旗爭端事起，復與達賴約使共盟調停③，足見清廷志不在小。故於東南軍事告竣，準噶爾大學侵入喀爾喀時，遂不再坐視。一面策動喀爾喀三部內附，發歸化城、張家口、獨石口之倉儲，指授科爾沁水草地使其游牧④；一面動員軍隊，以收復喀爾喀故土為目標，而展開持續七十年之正式衝突。從康熙二十九年(一六九〇)到三十六年(一六九七)，八年之間，聖祖三次親征，噶爾丹雖窮蹙自殺，而其侄孫輩不久又繼起為雄。

聖祖自認與達賴關係十分密切⑤，原欲假藉達賴宗教聲望，配合本身政治力量，迫使噶爾丹就範。無奈達賴於順治年間北京一行，已看清楚清初國力畢竟有限，難即馴服。康熙十三年(一六七四)吳三桂反，聖祖詔青海蒙古兵由松潘入川，桑結使達賴上書尼之，並囑青海蒙古境，搶奪山陝良民。嗣又代

吳三桂乞降，擅發裂土罷兵之論，謂「西南地熱，風土不宜，若吳三桂力窮，乞免其死罪；萬一虜張，莫若裂土罷兵」⑥。及大兵圍吳世璠於雲南，世璠割中甸、維西二地，乞援於達賴，書為清廷所獲，朝廷仍未深究⑦。

第以達賴自崇德七年(一六四二)獲順實汗支持，統一全藏，但以沈潛宗教之故，政事實際由「第巴」⑧秉承和碩特駐藏領袖之命而行，久之第巴與和碩特之駐藏統治階層間，漸至不協。故當噶爾丹留藏時，桑結深予結納，又乘準噶爾內亂，遣返伊犁，特欲假手制和碩特，削弱和碩特對西藏之壓力，而噶爾丹亦圖利用桑結，思假達賴名義，以統一蒙古各部，與清廷策略酷似。

康熙二十一年(一六八二)達賴示寂，第巴桑結秘不發喪，偽言入定，居高閣不見人，凡事傳達賴命行之。三十二年(一六九三)假託達賴入貢，言已年邁，國事決第巴，乞賜封爵，詔封為土伯特國王，頒給金印⑨。桑結擅權，既祖準噶爾殘略喀爾喀，又唆噶爾丹以圖中國，故達賴屢次所派使臣，名義上為調解喀爾喀內亂，及準噶爾與清廷之爭端，暗中實皆為噶爾丹所操縱利用。⑩迨噶爾丹敗亡，達賴、桑結之夢想，隨之幻滅，雖欲故智重施，謀與準噶爾新興勢力策妄阿拉布坦勾結，不久却以爭立六世達賴，意見與拉藏汗不合遇害，和碩特蒙古再度恢復順實汗以來在藏的實力統治。經此教訓，清廷亦認清整個西北形勢，達賴具有舉足輕重之地位，為期解決準噶爾問題，有進一步綏撫西藏的必要。

註①：魏源聖武記卷五，頁一三六。

②：大清聖祖實錄卷一一，頁六十七；卷二二八，頁四；及皇朝藩部要略卷九，頁四四一。

③：大清聖祖實錄卷一一九，頁二；卷二二六，頁二〇一。

④：同上書卷一三九，頁七一九。

⑤：西藏記上卷，頁一，聖祖平定西藏碑文，所謂「三朝恭順之誠」及「八十歲同行善事」。

⑥：大清聖祖實錄卷五四，頁一六七。

⑦：張其勛西藏宗教源流考頁一九。

⑧：第巴(Sde Pa)，全稱應為「第巴悉魯」(Sde Pa Srit-Hsün)，簡稱「第悉」(Desi)，意為攝理政事者，即後來所稱之「攝政」，其職位設自崇德七年(一六四二)，係順實汗所派以治理西藏政務者，後來沿用，除達賴親政外，均置之。清朝官書稱「第巴」，易與其他官稱混淆，似以稱「攝政」或「第悉」為妥。

⑨：大清聖祖實錄卷一六一，頁九一〇。

⑩：如濟寧呼圖克圖於烏爾布通之役，為噶爾丹卜日誦經。又張蓋山上觀戰，勝則獻帕，不勝則代為講和，以為緩兵，清廷大吃其虧。參見同上書卷一八八，頁一五。

四、設置駐藏大臣的直接目的

瞭解以上滿清帝國的擴張趨勢，及清初喇嘛教與蒙古、準噶爾的特殊關係，可知清朝無西藏的動機，與經營西藏的迫切，本節再就政治、國防及宗教的目的，探討後來設置駐藏大臣的若干直接因素。

(一) 安輯藏政

以達賴為首的格魯巴勢力，在西元一六四二年以前，仍僅限於拉薩一帶及零星散處各地的格魯巴寺院而已，大部分的西藏地區，仍在紅教各派①控制之下。直到順治汗擊敗白利土司及藏巴汗等反黃教勢力後，達賴始在蒙古汗王監督下，正式派官治理前後藏政務。此時達賴及其「攝政」，自治權限甚小，從第巴桑結企圖勾結準噶爾擺脫和碩特蒙古束縛之意志，及後來陰謀驅逐拉藏汗反為所殺的事實來看，當可瞭然。清廷自亦認清此點，故在邀請達賴訪問的過程中，先將邀請函致送於藏巴汗②，藏巴汗滅後，亦照例送請順治汗查照③，無非為徵求同意。

此時清廷或得於順治汗介紹交往達賴之功，有所顧忌，未便介入西藏與和碩特蒙古間之附屬或傀儡關係，避免接觸到政治問題。基此吾人可得分析而言者，苟非順治汗與清廷交往之初先有約定或諒解，即和碩特對達賴「政府」的涉外事權控制至嚴，一如清廷在乾隆五十八年以後之所為。否則以清初擴張之勢，在蒙古內亂及西北擾攘之際，豈有不強施壓力，使達賴完全聽皇帝之御用，反甘忍於任令桑結為噶爾丹之鷹犬？此外，清廷初對吳三桂父子勾結達賴一事未究既往，對桑結匪報達賴之喪，及陰險準噶爾悖逆諸事極盡寬容④。泊乎桑結為拉藏所殺，聖祖則又盡數其悖慢之跡，並加封拉藏翊法恭順汗以結寵，在在顯示和碩特蒙古以西藏為禁脔，及清初在藏政治基礎薄弱之事實。

清初西藏形勢的轉變，起於康熙四十四年（一七〇五）桑結被拉藏汗執殺，清廷勢力開始直接介入西藏以後，當時西藏政局的關鍵，一為宗教信仰中心的達賴喇嘛，一為控制西藏政治的設法。從康熙二十一年（一六八二）五輩達賴示寂，到康熙五十九年（一七二〇）清廷派兵護送羅桑嘉措入藏坐床，其間三易達賴，真偽莫辨，皆有分別代表某方面利益的政治勢力在支持⑤。足見宗教固然影響政治，政治更是支配着宗教。所謂「喇嘛與護法」(Lama and Patrons)的關係⑥，顯然是建立在武力征服與實力控制的基礎上，從忽必烈、順治汗，以至於康熙以後清廷的征討，均循此軌跡，直到乾隆晚年，清廷直接統治西藏，此種關係始行消滅。

康熙五十六年（一七一七），準噶爾侵入西藏，殺害拉藏汗，從順治汗以來支配西藏政治的和碩特勢力瓦解。清廷得自西北軍部的報告，謂策零敦多卜

徵調民夫整修布達拉城池，有欲為藏王率眾內附之意⑦，廷臣多存觀望，聖祖則認為「此時不進兵安藏，賊寇無所忌憚，或煽惑沿邊諸蕃部，將難處置」⑧。遂決定冊封羅桑嘉措為第七輩達賴⑨，派兵護送入藏，一舉徹底解決藏政。此役，清廷順利填補西藏自拉藏汗死後以來的政治真空，至是清帝已從宗教保護者的地位，進而成為西藏的統治者。為因應此種新任務的需要，清廷遂在屢屢派兵遣官之後，於雍正五年正式設置駐藏大臣，長期駐劄，治理西藏。（詳請參考本刊第三十九期拙著「清代初置駐藏大臣經過考」）。

註①：清朝對於喇嘛教，尊崇格魯巴，而抑制噶舉、薩迦、寧瑪各派。因其衣帽尚黃，稱為「黃教」，而稱其他各派為「紅教」。

②：T'ieh-Tsang Li: Tibet Today and Yesterday, P. 34

③：大清世祖實錄卷三，頁四。

④：大清聖祖實錄卷一八一，頁一五。柏爾原著，宮廷增譯述，「西藏之過去與現在」頁二七，則稱：「一六八〇年（應為一六六二）五世達賴之喪，桑結密不發喪，中國政府雖伴為忿怒，但暗中實曾唆使之。」

⑤：如策零嘉措為代表西藏土著勢力之第巴桑結所支持；伊西嘉措為來自青海的蒙古統治者拉藏汗所支持；羅桑嘉措又係青海蒙古諸臺吉及清廷勢力所支持。

⑥：這是盛行於西藏的說法，認為西藏特殊的任務，是發展宗教。既然達賴以教主的慈愛，賜福於施主，也希望蒙古或滿洲的統治者，以超邁的身份。來捍衛西藏，保護佛法。

⑦：大清聖祖實錄卷二八四，頁二一一。

⑧：同上書卷二八七，頁五。

⑨：康熙五十九年九月十五日，羅桑嘉措在布達拉坐床，詔加封「宏法覺眾第六世達賴喇嘛」，蓋以不承認桑結私立之策零嘉措故也。惟實際上羅桑嘉措係策零嘉措死於青海後，所尋出之靈童，藏方資料均稱為第七輩，後來清朝官方資料，亦照第七輩認定。

(二) 防禦準部

康熙三十六年（一六九七）噶爾丹窮蹙自殺後，其侄策妄阿拉布坦①繼起，不久準噶爾又盡復昔日規模。清廷為防其私通西藏，除命尚書富寧安，率大軍出甘肅至巴里坤（今鎮西）屯防外，又令侍衛阿齊圖督青海諸臺吉兵，駐防噶斯湖、察罕烏蘇及察罕托灰一帶，斷其經青海通藏之路。而策妄阿拉布坦却於五十五年（一七一六）派策零敦多卜等追軍六千，由西路渡漠越嶺，入阿里、後藏，襲擊拉薩，拉藏疏而未備，兵敗被殺。

準噶爾突擊西藏的成功，使滿清帝國面臨嚴重的危機，誠如李鐵錚氏所云：「那可能是曾經一度統治西藏的蒙古帝國，在同一情況下再度走向成功基礎的序幕，這是長期使清帝驚擾於心的恐懼，絕不能袖手旁觀」②。清廷隨即完成整個西北的軍事佈置，以將軍富寧安、傅爾丹兩路率制準噶爾後方，派主力分由

青海及西康兩路入藏，始將準噶爾勢力自藏逐出。

準噶爾勢力雖自西藏退出，清廷威脅並未解除。康熙六十一年（一七二二）南撤西北各路之師，次年（雍正元年）即有青海羅卜藏丹津之叛；雖無直接證據證明為準噶爾幕後所策動，但羅卜藏丹津之敢於跳梁者，顯受準噶爾之影響與鼓勵，故當其敗而逃亡準部，清廷屢索不得。雍正五年（一七二七）策妄阿拉布坦死，其子噶爾丹策零立，雄狡不讓乃父，屢謀犯邊，世宗以一旦準部有事，則喀爾喀、青海、西藏必被其擾亂，甚屬可慮，屢集廷議，大興西師，有此賊不滅天下不安之諫。此後清廷於準部，剿撫不定，未嘗稍釋西顧之憂，直至噶爾丹策零死後，始乘其內亂，漸次就撫。

在清廷與準噶爾的長期戰爭中，除消極防止準噶爾與西藏的勾結外，還積極整飭西藏營伍。除了派駐大量軍隊，任命大員駐劄外，並訓練西藏軍隊，在前後藏阿里等地通準噶爾隘口駐防，受駐藏大臣節制指揮③。此時頗羅鼐整軍經武，訓練萬騎，又練步兵萬有五千，於通準部各路嚴設卡倫④。不但自是準噶爾不敢窺藏，影響所及，如拉達克、布魯克巴及巴勒布等國，亦先後畏威附貢，成為清廷之藩藩⑤。

通常在一致權控制之下，如有反動勢力產生，往往依附或援引另一外來勢力，以求自存和發展。西藏自不違例，遠者如薩迦派之依附元朝，格魯派之依附蒙古，都是藉外力而控制西藏。近者如桑結之聯使噶爾丹攻擊青海，謀挫和碩特蒙古之在藏勢力，及鼓勵噶爾丹侵略喀爾喀以與滿清抗衡。而策零敦多卜攻擊拉薩汗當時，拉薩有臺吉那木札爾之內應⑥，該役未必非桑結殘遺勢力之陰謀。即雍正五年阿爾布巴等殺害康濟鼐後，聖武記亦有「欲投準噶爾，……頗羅鼐率後藏及阿里兵截賊去路」之記載⑦。再如乾隆十五年（一七五〇）珠爾默特那木札勒密謀不軌，經駐藏大臣傅清、拉布敦等計除之，事後亦經證實其有勾通準部、私立偽號之陰謀⑧。從而可知當初駐藏大臣的設置，防禦準部實為重要目的之一。

註①：策妄阿拉布坦為噶爾丹兄倫格次子，其兄為噶爾丹所篡弑，策妄率其父舊臣七人降清，後乘噶爾丹南侵敗竄之際，收集散亡，遂有準部大半。

②：T'ieh-Tsung Li: Tibet Today and Yesterday, P. 39

③：康熙五十九年清廷開始駐兵西藏，雍正元年一度裁撤，六年又恢復駐防。在未派駐藏大臣之前，西藏官兵土兵防務，由駐防將領節制，雍正五年派駐駐藏大臣後，即由該大臣監督指揮。

④：西藏圖考卷二，頁六。

⑤：參見大清世宗實錄卷一一六，頁一四；卷一二二，頁二一三；及西藏考頁三

⑥：大清聖祖實錄卷二七八，頁一九一〇。

⑦：聖武記卷五，頁一四四。

⑧：大清高宗實錄卷三八三，頁七。

(三) 保護黃教

中國古來對外藩所施之政策，不外威服與羈縻二者；羈縻之道，尤以宗教為有效。故近世以來，臨御中原者，每思假宗教之力，以制馭外藩，如元世之國師，明代之法王。蓋宗教潛移默化之功，有甚於耀武揚威之軍事行動者，清廷即利用此政策，以綏服外藩者，垂二百餘年。

蒙藏諸族崇拜喇嘛，禍福休咎，唯其言之是從，故宗教不僅籠絡人心，而且支配着物質及社會生活，舉凡一切制度文化，皆與宗教有關，都是宗教的附屬物。因此清帝看清此點，能在蒙藏事務紛擾之際，以「保護黃教」為號召，進而為政治之利用焉。

當效康熙之際，西藏外受準噶爾之威脅，內有權臣之離貳，達賴除在宗教上深具權威外，其政治俗權仍甚有限，即拉藏滅亡，清廷再派出準噶爾勢力以後，政治大權仍由康濟鼐為總理的五人噶廈政府所主持。雍正五年阿爾布巴亂後，頗羅鼐以助平西藏有功，累封郡王，直接奉命皇帝行使統治權，直至乾隆十五年，其子珠爾默特謀叛被誅，西藏實際上在受駐藏大臣監督，及受清帝任命的藏王治理之下。達賴始則被移居裏塘，後雖送回，亦僅領有宗教領袖名義，無權過問政治，可知此時宗教已在政治影響之下，為清廷政治運用之工具。

基於保護黃教之目的，駐藏大臣除坐鎮拉薩，照看達賴以外，又協助達賴鞏固格魯派的信仰基礎。顯然，黃教經賴實汗大力扶持，並掃除異派以後，已控制了全藏的信仰，但非絕對，其他各派所留下的殘餘勢力，偶而仍對黃教構成威脅。如康熙八年（一六六九）達賴疏稱：紅帽帕克木（或即帕木竹巴一派）取兩族之人而去，請將伊等還歸於噶爾馬；賴聖祖遣官取之發還①。康熙十三年（一六七四），又因達賴之疏請，降敕禁止中國僧俗不得誦習巴志馬三寶瓦巴克什（蓮華生）之經②。再如乾隆五十三年（一七八八）廓爾喀侵藏，主要導火線，即起於六世班禪赴京，祝高宗七旬壽，卒於京師，中外施舍甚豐，資送歸藏，財皆為伊兄仲巴呼圖克圖所有，損其弟沙瑪爾巴為紅教，不使分惠，致沙瑪爾巴煽動噶爾喀入寇③。後又以紅教薩迦呼圖克圖向賊遞送哈達及私情議和，清廷恐薩迦恃此議和之功，侵奪黃教之權④，故命駐藏大臣密查其中情實，預防煽聚日久，致黃教漸入紅教⑤。甚至光緒二十二年十二月，班禪感習紅教，駐藏大臣亦奏令具結改悔⑥。此皆清廷派駐駐藏大臣，以扶持黃教，抑制他派之明證。

其次是提高班禪政教地位。西藏盛傳，班禪係「阿彌陀佛」化身，為「無量光明」之意；達賴為「觀世音菩薩」化身，意為「慈悲之主」。阿彌陀佛為觀世音菩薩之心靈指導，第一輩班禪羅桑却格堅參，又曾為第四輩達賴雲丹嘉措及第五輩達賴阿旺羅桑嘉措之經師，故藏人多以為班禪之精神地位高於達賴

，但於俗務則權力較小^⑦。實則班禪之以呼畢勒罕轉世，為第五輩達賴喇嘛所促成，當初除令管後藏若干格魯巴寺廟，並賞給附近三個宗為其香火外，無任何政治地位可言。後來清廷顧及一旦政教大權集中達賴，勢將不便控制，才開始有計劃地培植班禪地位，用來牽掣達賴，並保持前後藏的均勢^⑧。康熙五十二年敕封「班禪額爾德尼」，照達賴之例，給以印冊^⑨。雍正六年達賴移錫囊塘，班禪受命主持全藏教權，乾隆二年班禪圓寂，教權復歸達賴，其間制衡地位已見重要。嘉慶道光以後，第九、十、十一、十二輩達賴，皆未成年而寂，一方面固然造成攝政之用權，一方面亦使班禪脫穎而出，得間觀西藏政教大權，亦因此啓達賴、班禪不和之端，終至水火難容。^⑩

註①：大清聖祖實錄一五七，頁一三四。

②：同上卷頁一五。按巴志馬三贊瓦 (Padmasambhava) 即蓮華生，為寧瑪巴之祖師，專宏密法。

③：張其勳西藏宗教源流考，頁三七。

④：大清高宗實錄卷一三四，頁四三。

⑤：同上卷一三九，頁二五。

⑥：大清德宗實錄卷四五，頁一一二。

⑦：柏爾原著，宮廷譯述：「西藏之過去與現在」，頁二五。

⑧：聖武記卷五謂「宗喀巴圓寂，遺囑二大弟子，世世以呼畢勒罕轉世。……一曰達賴，一曰班禪」。歐陽無畏師「影印衛藏通志序」（文海出版社）云：「按宗喀巴弟子，偕解行證德業俱尊之大弟子，何止千百？惟大弟子中，通推最稱爲二者，一爲嘉慶達賴瑪仁欽，一爲開創格魯巴者，此二者並非達賴或班禪。至其大弟子中推稱七金剛土之末位，名根敦嘉巴者，是爲第一輩達賴喇嘛。轉世至第五輩阿旺羅桑嘉措時，統一全藏政教大權，乃奉請其師羅桑開格堅參爲札什倫布寺之主。寺主職名號稱「班禪」，代管後藏政教，並勒定自後該寺班禪一職，永遠歸由羅桑開格堅參之轉世再來嗣襲，不復另行委派。故第一輩班禪之羅桑開格堅參，實非宗喀巴之及門大弟子。」蓋清廷思政治之利用，故急提高班禪名位，不計事實，將班禪之轉世，自羅桑開格堅參上推三世，詭爲與達賴喇嘛同爲宗喀巴之二大弟子轉世也。



外蒙古地處大漠以北，故亦稱漠北外蒙古，清會典理藩則例載：「陞大漠曰外蒙古，喀爾喀部四附以二，爲旗八十有六」，所謂喀爾喀部四係指：土謝圖汗部（二十旗）、三音諾顏部（二十二旗）、車臣汗部（二十三旗）及札薩

⑨：大清聖祖實錄卷二五三，頁七。

⑩：光緒三十年七月，以達賴喇嘛於英軍榮赫鵬進藏之先離開，詔革名號，並以班禪暫攝；以至於宣統三年藏變，達賴回藏聲言獨立，班禪遂流落內地，不得回藏，此皆交惡所致。

五、結論

西藏在中國歷史上，一度曾以「吐蕃」的名稱，與唐朝分庭抗禮。唐武宗會昌二年（八四二）朗達瑪王被刺以後，吐蕃王朝瓦解。宋時吐蕃種族分散，無復統一，其酋則自宋太宗太平興國八年後朝貢不絕。元世祖迎薩迦五祖八思巴 (Pha-Pa) 尊爲帝師，至元六年（一二六九）升號大寶法王，主宣政院，總攝天下佛教及吐蕃政務。在西藏境內，則密烏斯藏、納里迷、古魯孫等三路宣慰使司都元帥府，下轄十三萬戶府^①。明興，太祖因襲前元舊制，亦利用宗教制馭藏蕃，惟其時薩迦派已漸式微，噶舉派及格魯派均在方興，故三派並尊，均封大法王，此外又封法王國師等無數。又於藏地設烏斯藏、朵甘二都指揮使司，及指揮使司、宣慰使司、招討司、萬戶府、千戶所等凡三十有三，以法王國師所舉之西番首領授官職^②。明朝中葉以後，俺答汗入據青海，大弘格魯派，也使西藏政治環境改觀。因明廷與格魯派關係並不密切，亦未把握機會利用西藏蒙古日益密切的關係；相反地，滿洲則自太祖努爾哈齊以來，留心蒙古習性，看清喇嘛教爲其精神團結之中心力量，遂慨然以喇嘛教護法自居，俾便其奄有蒙古，囊括天下之御用。清廷爲了肆應帝國擴張的要求，並安撫內附諸蒙古及對付準噶爾起見，不得不積極經營西藏。康熙末年的駐兵，和雍正五年駐藏大臣的設置，正是因應當時清廷、蒙古與西藏的內外形勢，以期達成安輯藏政、防禦準部與保護黃教的目的。

註①：從薩迦派依附元廷取得西藏政權，及元代在藏設官分職的事實看，中國在藏主權早已發生，惟時斷時續，直到清代始正式確定耳。

②：明史卷三三一，西域列傳三。

學 銚

克圖汗部（十八旗）；所謂附以二，則指附於三音諾顏部之額魯特部（二旗），附於札薩克圖汗部之輝特部（一旗），以上四部附以二共八十六旗，是以明白規定外蒙古之範圍爲喀爾喀四部及所附之二部而言。

一般人均未注意清會典此項規定，於是外蒙古之範圍遂有各種不同之說法，茲簡節如後：

(一)指喀爾喀四部及科布多二盟而言：如民國二年中俄聲明另件第四條有：「外蒙古自治區域應以前清駐紮庫倫辦事大臣、烏里雅蘇臺將軍及科布多參贊大臣所管轄之境為限」之記載，茲按烏里雅蘇臺將軍之前身為定邊左副將軍，據清會典載定邊左副將軍之職權為：「外札薩克喀爾喀四部之事務」，統於定邊左副將軍……，當時定邊左副將軍之職權為管轄喀爾喀四部之事務；至乾隆二十八年（西元一七六三年），留駐烏里雅蘇臺參贊大臣事權漸重，遂改定邊左副將軍為烏里雅蘇臺將軍，並添設庫倫、科布多兩大臣，當時乾隆皇帝一再收權，烏里雅蘇臺將軍之權限亦較原定邊左副將軍之權限為小，僅及於三音諾顏部、札薩克圖汗部之事務，而庫倫辦事大臣則轄土謝圖汗部及車臣汗部之事務（註），換言之，即前定邊左副將軍之職權分別劃歸烏里雅蘇臺將軍及庫倫辦事大臣管轄。

註：請參看清會典卷九九七。

至於科布多參贊大臣之權限，據清會典載：「杜爾伯特、新土爾扈特、和碩特之兵，統於科布多參贊大臣……」，及至清光緒三十二年，科阿分治後，將新土爾扈特之青塞特奇勒圖盟及和碩特一旗，劃歸新疆，由阿爾泰辦事大臣管轄，所餘科布多三音濟雅哈圖左、右翼盟十九旗仍歸科布多參贊大臣管轄，是則所謂外蒙古乃指喀爾喀部及科布多二盟而言。

(二)指喀爾喀四部、科布多及唐努烏梁海而言：如清魏源所撰聖武游牧記所載：「……其附庸於喀爾喀者，又有北屬國二，亦游牧而非元裔，一曰烏梁海，即兀良哈，在烏里雅蘇臺之北，俄羅斯之內……一曰科布多，橫亘於準喀二部之間……」（請見該書卷三國朝綏服蒙古記二），此外，民國五十七年版高中標準地理教科書第二冊有下列記載：「戈壁以南，稱漠南，舊稱內蒙古……以北稱漠北，除呼倫貝爾外，舊稱外蒙古……」（見該書第一五五頁），是則所謂外蒙古，自含科布多與唐努烏梁海。

以上兩種說法，僅在地理位置上顧慮到喀爾喀、科布多與唐努烏梁海三者相聯接而已，如依清會典所載，仍不無商榷之餘地，因此本書所稱外蒙古，其範圍以喀爾喀四部（含所附之二部）為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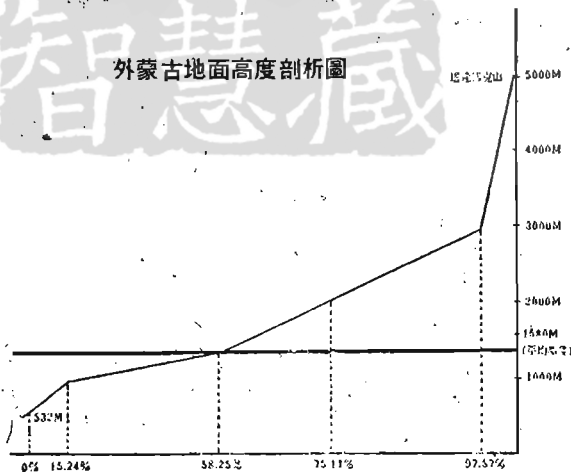
外蒙古向為我國領土，且為元朝龍興之地，而元朝又為我國正統王朝中版圖最廣大，武功最顯赫之王朝，同時外蒙古也為我國領土中地位最重要，而其被外國蠱惑煽誘最激烈之一地區，因此，筆者將在本節歷史沿革中，較為詳細敘述其為帝國主義者蠱惑之經過。

一、地理概況

外蒙古在太古時代，屬安加拉大陸，故其地質以變質巖為主，合片麻巖、花崗巖、結晶巖等而成，周圍山地障以火成巖，及其他迸發巖之面積頗廣，而石灰巖亦散布於各處，沙漠一帶亦有赤色之圓礫、沙礫、黏土等，據此，吾人可推定其地為古代大湖或內海之遺跡。

外蒙古有全世界最偏北之乾沙漠，亦有全世界最偏南之永凍層分佈中心，外蒙古地勢大致言之，在東部地區平坦地形佔優勢，在西部地區，則以山地地形佔優勢，茲將外蒙古地面高度剖析製圖如后，以供參考：

外蒙古地面高度剖析圖



至於蒙古之山脈概屬阿爾泰山系，均由賽留格木嶺分支而來，有杭愛山脈，自賽留格木嶺分出，略呈東南走向貫穿科布多北部，進入札薩克圖汗部北部，再向東南轉而東北向入三音諾顏部及土謝圖汗部，則稱肯特山，再行東北走，至與車臣汗部交界之處分為兩支，其一向東北走入布里雅特蒙古境內，另一向東走入車臣汗部，最後沒於車臣汗部中左前旗境內。另有一山脈稱南阿爾泰山脈，在杭愛山之南，自賽留格木嶺分出後，亦作東南走向，橫穿外蒙古西南部，至三音諾顏部之東南部時，又稱古爾班插汗嶺，最後入漠南內蒙古烏蘭察布盟西北部；此外再無較大山脈。

本區河流多集中於北部及東部，最著名者當首推源於肯特山南麓之克魯

倫河，此河古名鹽河，亦名飲馬河，自肯特山南流折而東北流，注入呼倫貝爾部之呼倫池，而成額爾古納河上游，再成爲黑龍江上游；另有色楞格河爲外蒙古第一大河，此河上游有三，曰齊老圖河、曰倭帖爾河、曰德勒格河，三河會合後，始稱色楞格河；又有源於肯特山西麓之土拉河，經庫倫曲折西北流，注入源於杭愛山北麓作東北流之鄂爾渾河，鄂爾渾河與色楞格河在賈賓城之西會合後東北流入俄國境內，經上烏丁斯克折而西北流注入貝加爾湖，而爲葉尼塞河上游之一，色楞格河與克魯倫河均可航行。

外蒙古誠然有一望無垠之沙漠——亦即習稱之瀚海，在沙漠之中固然草木不生，然則，上述河流附近，農業仍甚發達，且極有發展希望，至於地下資源尤爲富饒，而金、銀、銅、鐵無論儲量或產量均多，尤以庫倫附近、三音諾顏部產金最多，此外，煤產量亦多，據民國五十七年情報，由蘇俄及東歐共產國家協助外蒙古開掘之煤礦凡五百餘處，其較大者爲塔爾托爾郭斯克、薩雷郭爾斯克、那萊辛斯克等地，煤藏量約有一百五十億噸（註），除上述者外，據稱外蒙古亦產銅、磷、鈣等礦。

註：請參看蒙藏委員會出版之「邊疆與國防」一書。

外蒙古之人口向之正確統計，歷來各項有關外蒙古人口數字，亦有極大之差距，茲綜合黃哲生「邊疆屯墾員手冊」、僑外蒙出版之「一九六二年國民經濟統計要覽」、蒙藏委員會民國五十六年之「蒙藏簡介」、美國蒙古協會出版之「蒙古公報」等資料，外蒙古人口大約爲一百萬人（不含科布多蒙人）左右。

外蒙古因離海較遠，又兼以崇山四環，沙漠廣亘，故純屬大陸性氣候，寒暑俱烈而多夏迥異，除夏季間有驟雨外，餘時降雨極少，降雨之時河水每有暴漲之虞，而平時則極爲乾旱。

本區之都會計有：

庫倫：爲外蒙古首府，額土拉河，爲張庫恰二公路交會之處，昔時市區分三部份，東區亦即商業區，又稱東庫倫，多商店；中區亦即官殿區，有喇嘛宮殿，昔時外蒙活佛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駐此，外蒙古官府也在此；西區亦即喇嘛區，又稱西庫倫，喇嘛廟多集中於此；自蘇俄導演外蒙古「獨立」後，庫倫即改名「烏蘭巴托」，蒙語意爲「赤色英雄之城」，僑蒙「首都」即在此，在俄人經濟統制下，庫倫似已建設爲接近現代化之都市，公路、高樓、汽車、工廠、學校、博物館、科學院、醫院、歌劇院亦應有盡有，蘇俄之所以大力「協助」僑蒙各項建設，而蘇俄本身並非富裕，睽其目的，實在於使外蒙古在經濟上、在情感上與中國脫離，其用心實值吾人深加注意。

賈賓城：在庫倫之北，當中俄交界之處，蒙胞呼之曰恰克圖，爲外蒙北部之咽喉，亦我國防重鎮，清雍正五年中俄恰克圖條約，開爲商埠，實爲我國最

早訂約開放之商埠，其舊有市街已於恰克圖條約劃入俄境，我國商人乃另築新市街曰賈賓城，昔時貿易以茶磚爲大宗，礦砂、皮毛次之，原有公路自庫倫經此到烏丁斯克，現已有鐵路與俄境之西伯利亞鐵路相銜接。

烏里雅蘇臺：烏里雅蘇臺在外蒙古西部三音諾顏部之西部，蒙語意爲多楊柳，以其地遍栽楊柳故名，其地杭愛山屹立於東，直盆河帶其南，自此西行，北控唐努烏梁海，西制科布多，軍臺相接，爲外蒙古軍政要地，清雍正時，屯軍於此，準格爾得以鎮懾，延至乾隆仍爲西北屯軍要塞，定邊左副將軍及其後烏里雅蘇臺將軍均駐於此，烏里雅蘇臺城築於清乾隆三十二年，城係木造，周圍三里，有門三，南門曰承恩，東西二門無名，城之北面有菩薩廟一，城中有關帝廟一，另有土地廟、觀音廟各一，光緒七年中俄伊犁條約許俄通商，於是俄人爭來居住，外僑驟增，民國二年，以俄人要求，遂廢屯兵之制，烏里雅蘇臺之東推河畔，元代所建喀喇庫倫城迎堅茶寮殿及園林之故址今尚存焉。

二、歷史沿革

外蒙古在我國正北方，在我國國防上居重要地位，其地古爲獫狁、獯鬻、山戎等所居，秦、漢時爲匈奴所據，東漢時仍爲北匈奴地，後魏曰蠕蠕（本名柔然，魏太武帝時改爲蠕蠕），其後突厥起而代之，唐時回紇據有其地，五代至宋回紇衰，室韋、軻厥諸部散居其地，屬屬於遼，金大安初蒙古始盛，蒙古太宋七年，建都和林，初立元昌路，後改轉運和林使司，前後五位大汗都於此，元世祖始遷都大興，於和林置都元帥府，大德十一年，立和林等處行中書省，皇慶元年，改領北等處行中書省，明時爲蒙古所據，清時綏服蒙古後，推行盟旗札薩克制，計設四盟，即：克魯倫巴爾和屯盟（通稱車臣汗部）、汗阿林盟（通稱土謝圖汗部）、齊齊爾里克盟（通稱三音諾顏部）及札克畢拉色欽畢都爾諾爾盟（通稱札薩克圖汗部）共計八十六旗，其始外蒙古原僅三部，嗣因隨清廷征準格爾有功，於乾隆年間使另立一部，是爲今之外蒙古四部。

至遜清末葉，邊政不修，外交失利，俄國在西伯利亞之活動，日趨積極，對外蒙古威脅侵吞之企圖，已昭然若揭，清廷有見及此，亦逐漸增加對外蒙古之各項行政措施，由是鼓勵移民，加派衛隊，並於清宣統二年（西元一九一〇年）派三多接任駐庫倫辦事大臣，三多抵達外蒙後，未能細察蒙胞需要及當時國際情勢，先謀人和，再調查外蒙古財政狀況，而後再謀求改革，三多均未能作此準備，反而一意求新，兼以朝內重臣多不諳外蒙實情，一味求新，遂函電交催辦新政，三多在此情況下，乃設兵備處、巡防營、木捐總分局、衛生總分局、車駝捐局、交涉局、墾務局、設學堂等等，百般新政，期完成於一旦，原有財政實難挹注，增加稅捐，勢所難免，於是王公喇嘛抵制於先，一般蒙胞反抗於後，明爭暗鬥，糾紛迭起，但無論如何，此事皆我國內政，實不容他

國置喙，不料俄國見此情況，却認為有機可乘，遂於宣統三年六月暗邀外蒙活佛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會盟為名，召集四盟首要在庫倫密議，俄人乃誘惑外蒙「獨立」，於是蒙胞首要遂在此情況外，向俄人乞援，並密遣杭達多爾濟親王、車林齊密特等赴俄京莫斯科，並携有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之簽名函件，意欲送交俄國沙皇，該函內容略為：「俄國人民之偉大萬能沙皇，威強而仁慈，保護黃種民族，乃為美德之化身；如我僑互相協助，將不失固有之地位，黃種民族將發揚光大、永保和平。但據許多國家之經驗，弱小民族，如得強大民族之支持，將轉弱為強。語云，強大國家扶助弱小國家，偉大之沙皇，其以哀憐慷慨之心，考慮我等之處境，我僑請求援助與保護，若大旱之望雲霓也，所言均出於至誠，謹呈此區區不腆之儀」(此信引自美國耶魯大學教授戴維林 David L. Drell 所著俄國侵略遠東史一書中 New York Vostok 所用資料)；此函語氣幼稚而天真，且缺乏政治常識，足證蒙胞之醇樸，當此函到達莫斯科後，大為俄國政府所歡迎，惟以當時國際環境複雜，英日虎視眈眈，致使俄皇未敢親自接見杭達多爾濟等人，僅由代理外交部長尼拉吐夫 (Neratov) 接待，並向俄皇報告：「蒙古人之運動，於中國與我關係之間，可以利用之」(註)，同年八月俄國內閣會就此事加以討論，該內閣會議紀錄坦承：「蒙古人深信如與中國脫離，可賴俄國支持，其觀念之產生，則我在蒙古之代表，實有以促成之」，同時俄並允許協助蒙古人「保持其種族之完整」，足證外蒙古之脫離我國，純由俄國之威脅利誘兼以煽惑而成，並非蒙胞之自由意志。

註：據吳相湘氏所著「俄帝侵略中國史」載，杭達多爾濟等人抵俄後，俄皇待之如宮廷貴賓，其在聖彼得堡之一切費用，均在俄皇私庫支取等情，也足證俄國謀我外蒙古之野心。

俄國作成上項紀錄之同時，並由俄國駐北京公使克羅斯維支 (Kroston) 威脅北京曰：「如不停辦新政，俄國斷不漠視，必在交界等處籌謀對付方法」，此種蠻橫無理公然干涉我國內政，豈僅「豈有此理」而已；上述二事，我駐庫倫辦事大臣三多，尚不知曉，當時清廷中央因南方革命運動深得民心，氣勢大盛，無力北顧，乃電三多以「從緩辦理新政」，由是三多始悉有蒙胞領袖密赴俄京之事，遂向哲布尊丹巴交涉，告以從速召回杭達多爾濟等人，並電阻俄國派兵在邊界滋事，哲布尊丹巴本無獨立之意，至此始知姦事體大，乃要求三多「停辦新政，免治赴俄諸人之罪」為條件，此亦足證哲佛始終無「獨立」之意，三多乃據情奏報，奉旨允准，至此外蒙問題本可消弭於無形，其奈俄人既握有利之機，豈肯輕易放過，對三多與哲佛之協議不予理睬，也不讓杭達多爾濟等人返回外蒙，此外並悍然派兵四千，陣於邊界，狼子野心至是暴露無遺。

至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農曆八月九日)辛亥革命起義武昌，各省紛紛獨

立，清廷已名存實亡，俄人本可乘此「良機」吞併外蒙，奈以日本駐俄大使業已察覺俄國對外蒙之野心，而向俄詢及其對外蒙古之計劃，兼以美英兩國，亦耳聞俄有吞併外蒙之意，甚不以為然，俄國乃知吞併外蒙此非其時，遂轉而協助外蒙「獨立」，遂於一九一一年十一月卅日唆使蒙胞正式通謀庫倫辦事大臣衙門，聲明外蒙「將全土自行保護，定為大蒙古帝國，公推哲布尊丹巴為皇帝」，其通謀文曰：「為札飭事，照得我蒙古自康熙年間隸入版圖，所受歷代恩遇，不為不厚，乃近年以來，滿洲官員對我蒙古欺凌虐待，言之痛心，今內地各省既相繼獨立，脫離滿洲，我蒙古為保護土地、宗教起見，亦應宣佈獨立，以期萬全，現由四盟公推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為大蒙古獨立國皇帝，不日即御極，庫倫地方已無需中國官吏之處，自應即時全部驅逐，以杜後患，合行此飭三多」(蒙文原件請參看本節所附)；並限定三多及所屬兵勇，於三日內離境，三多見大勢已去，遂取道恰克圖經西伯利亞返回北京；烏里雅蘇臺將軍奎芳見三多已離開外蒙，遂亦逃回內地。

由是外蒙古遂在俄國一手導演下於一九一一年十二月十六日，正式宣佈「獨立」，定「國號」為「大蒙古國」，並於農曆十二月廿八日哲布尊丹巴正式「登極」為大蒙古國皇帝，年號「共載」，設總理、副總理、下設內務、外務、軍政、司法、財政五部，其人選為：

總理大臣——巴特瑪多爾濟(喇嘛)
內務大臣——鼓楚克車林
內務副大臣——多爾濟巴多(喇嘛)
外務大臣——那旺那林(車臣汗)
軍政大臣——彭楚克喇布坦
財政大臣——達木鼎
司法大臣——王朝克巴達爾呼(濟農)

此為外蒙古第一次「獨立」，俄人吞併外蒙古之直接目的雖未達到，但對外蒙之脫離我國，已然甚感滿意。

其時中華民國創立伊始，國基未固，國力孱弱，對收復外蒙古雖有其心，實無餘力，稍後國父孫中山先生宣佈禪位於袁世凱，袁氏乃致電「大蒙古國皇帝」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勸其取銷獨立，恢復與中央之關係，該電文略為：「可敬之大喇嘛，余之將領均思與君一戰，惟余出於憐憫，加以阻止，以達和平解決之希望，……君今策動軍事行動，……拘捕王公，予民眾以痛苦，……劫掠與行動無紀，實過於盜匪，……」，袁氏並告以外蒙古之「獨立」，從未獲得滿清之承認與民國之准許，雖自稱獨立，實為無效，外蒙古仍為中國領土，如該電文所稱：「滿清政府從未承認蒙古之獨立，故余也不能承認之，庫倫一地，應受制於中國」；隨後我中央政府續發一聲明，勸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歸順中央，並許以褒賞，如該聲明云：「此一褒賞，異於常賞，神祇共鑒，此約

不渝，倘續騷亂，不願就範，則組成共和國之五族，對汝憤慨，汝將受刀火極刑之罰！」其時哲布尊丹巴在俄人挾持下，而本身又無主見，對袁世凱氏之電文及聲明，乃提出拒絕接受之答復，並引證美國獨立事件，以壯聲勢，文曰：「英美本在同一君主統治之下，然美宣佈獨立，與英簽訂條約，此一條約，迄未取消，未知識之否？」此亦足證俄人在幕後教唆操縱。

此時國際列強如英、日、美、法、德諸國，對俄國製造外蒙傀儡政權均不以為然，俄國乃一方面假其「完全協助蒙古人」之「立場」，而以外蒙古與我中央之調停人居居，另一方面於民國元年一月，發表一冠冕堂皇之宣言，申明俄國並無吞併外蒙古之意圖，以圖緩和列強之注意，因此俄國乃表示願意調查「華蒙」爭執，此可從民國元年四月廿六日，俄國外交大臣薩佐諾夫在俄國會宣佈俄國外交方針時，明白表示：「關於調停華蒙爭執之事願意出頭擔任」（見吳相湘所著俄帝侵略中國史）；但在此同時，俄國復以軍火供給外蒙古，並囑俄國駐華領事注意我國對此之反應，並申述唯有中國始能維持外蒙古之秩序，至民國元年八月，北京政府並派衛隊步兵及騎兵組成之軍隊，前往外蒙，以示統一領土之決心，我國此項措施，實極妥當，不料，俄國竟發表一措詞強硬之聲明，以派軍隊入蒙為威脅，在此稍前即民國元年七月八日，俄國為求獲得在外蒙之既得利益，居然與日本訂立日俄條約，承認內蒙東部與東北部（即外人所稱之南滿）為日本之勢力範圍，以換取日本對俄國在外蒙利益之默認，是以我國之抗議終歸無效，美國另有他圖，英國與日同盟，德法正有事於歐陸，俄見我孤立無援，適於同年十一月三日（一說三日）由俄國前駐華公使克羅斯支，在庫倫與偽「大蒙古國」私訂「俄蒙協約」，計分兩部，前部份計有四條，係原則性之約訂，另一部份則為俄蒙商務專約，計十七條，詳訂俄人在外蒙古所享之各種特權，繼而又簽訂開礦條約、電線條約、鐵路條約等，極盡其勒索榨取之能事（請參看李毓謝氏所撰「民國初年的外蒙古問題」一文，文刊「蒙古研究」，中國邊疆歷史語文學會出版），我國自不能容忍，遂於十一月七日，外交部正式行文向俄抗議，後二日（十一月九日），俄使庫魯朋斯基（Kroupensky）到我外交部訪外交總長陸徵祥（原為梁如浩），竟以撤消對民之承認相要脅，我國被迫，只得與俄舉行談判，而俄國則聲明：「俄國承認蒙古為中國領土完全之一部份，並擔保此領土關係之繼續，不謀間斷；又此領土關係上出生之中國歷來種種權利，俄國並擔保尊崇」，此項聲明儼然以外蒙古幕後主人自居，其實我國在外蒙古行使主權，何需乎俄國擔保？

自是外蒙古人民乃深覺悟，俄國絕無協助外蒙「獨立」之誠意，僅以欺騙手段矇騙蒙胞而以為之為我國行政治蔽詐之籌碼而已，而外蒙古之資源已被俄國以條約騙取殆盡，外蒙領袖失望之餘，醒悟亦銳，對俄之感情，日趨冷淡，且有突起反抗之跡象，此在俄國派駐外蒙古專使伊文可路斯多維之回憶錄中，曾率直述及蒙人對俄人之反感；其時，外蒙同胞曾組一代表團代表傾向中央之

蒙胞，起程前來北京，惜以袁氏當時正全力應付二次革命，且北京政府官員認為既無力收復外蒙古，不如採取拖延手段，為未來處理此項問題時，留下有利地位，此項舉措，雖未盡合理，但既不能作有力之談判，不如留待有利時機再行談判，此亦無可奈何之措施，但其時袁世凱正謀帝制自為，對外蒙之態度，已不若先前之強硬，終於民國二年（一九一三年）十一月十五日與俄國簽定中俄聲明，於翌日換文，該聲明共計五項為：

- (一) 俄國承認中國在外蒙之宗主權。
- (二) 中國承認外蒙古之自治權。
- (三) 中國承認外蒙古人享有自行辦理自治外蒙古之內政，並整理本境一切工商事宜之專權，中國允許不干涉以上各節，是以不將軍隊派駐外蒙古，及安置文武官員，且不辦殖民之舉，惟中國可任命大員偕同應用屬員暨護衛隊駐紮庫倫，此外中國政府亦可酌派專員駐紮外蒙古地方，保護中國人民利益，地點應照本文第五款商訂，俄國亦擔保除領署衛隊外，不派兵、不干涉此境之內政，並不在該處殖民。
- (四) 中國聲明：承受俄國調處，按照以上各款大綱以一九一二年十一月三日俄蒙商務專條明定中國與外蒙古之關係。
- (五) 凡關於俄國及中國在外蒙古之利益，暨各該處因現發生之問題，均應另行商訂。

在此項聲明之同時，並互換照會，其內容為：

- (一) 俄國承認外蒙古為中國領土之一部份。
- (二) 凡關於外蒙古政治土地交涉事宜，中國政府允與俄國政府協商，外蒙古也得參與其事。

(三) 聲明文件第五款後商訂事宜，由三方酌定地點，委派代表接洽。

(四) 外蒙古自治區域應以前清駐紮庫倫大臣、烏里雅蘇臺將軍及科布多參贊大臣所管轄之境為界限，惟現在因無詳細地圖，而各該處行政區域又未劃清界限，是以確定外蒙古疆域及科布多阿爾泰劃界之處，應按照聲明文件第五款所載，日後商訂。

此項聲明及照會內容，已然滿足俄國對外蒙古之伸張，於是協助外蒙古「獨立」之偽面具，也不必顧及，而我國在此項聲明及照會內，雖只取得形式上之領土主權，但可隨國勢之強弱，而有伸縮之餘地，此自為當時承辦此項外交任務者之苦心籌謀。至俄國之所以在此聲明及照會同時規定外蒙古自治區域之界限，查其用意，首在取得日本之信任，以為俄國確無意染指內蒙，俄國之多面外交，狡猾技倆，於此可見一斑。

俄國政府深知此舉必然引起外蒙古之不滿，於是派俄國駐外蒙代表米勒爾（Miller）向外蒙古政要解釋，告以對中國宗主權之承認，僅為形式而已（請參見吳相湘著俄帝侵略中國史頁二六六），同時給予外蒙蒙胞以大量金錢及軍械，

以釋此嫌，此項利誘確使天真之蒙胞再次墮入俄國預置之陷阱；民國二年十二月十六日，外蒙三音諾顏汗以「蒙古國務總理特派公使」名義，分別致函我國駐俄公使及俄國政府，其內容略為：「蒙古政府對於詳慎研究此項聲明文件及附件之後，認為蒙古人之現有的國家組織，其在內部各方面如在工商業、鐵路、電報、經濟、財政等等事務中之獨立自主性，以及與列強發生交互關係之自由，皆被中俄兩國所承認，因而更鞏固了！」，「中俄兩國既已答應不再干涉上述諸事務，不再派遣或維持軍隊，不再於蒙古境內設立軍事的與民事的政權，阻止我國之殖民地位，蒙古政府認為這是蒙古國家之完全的政治獨立之最友誼的與可信的保證」，「但蒙古政府認為有一點應該提出，且已屢次預告中俄兩國者，即蒙古要完成脫離中國之關係，他不能承認未曾獲他同意之任何隸屬關係」！「我們非常看重俄國之友誼的介紹，並希望與中國恢復常態的善意的關係，因此蒙古政府已欣然準備參加聲明文件與另件所預定的三國會談，並斷然相信俄國能於會商進行時，給我們以有力的幫助」，可見俄人金錢及物質之誘惑，又達到預期分化之目的，更由於袁世凱之急欲稱帝，於是對外交涉不得不委曲求全，既受日本之要挾，辱承二十一條要求於前，遂接受俄國之威脅於後，召開中俄蒙三方會議，於是於民國三年九月九日，中俄蒙三方代表在恰克圖舉行會議，我方代表為陳毅及畢桂芳，俄國代表為米勒爾，外蒙古代表為司法部長額爾德尼卓彥貝子希爾達木定及財務總長土謝圖親王察克爾札布，當時俄國正全力注視歐洲戰事及其國內共產革命之情勢，而我國也有意拖延，此項會議正式會議達四十八次之多，費九閱月之多，至民國四年六月七日始達成協議，訂定中俄蒙恰克圖協約，共二十二款，其要點為：

(一) 外蒙古承認中俄聲明文件及其另件。

(二) 外蒙古承認中國宗主權，中國承認自治外蒙古為中國領土之一部份。

(三) 自治外蒙古無權與外國訂立政治及土地關係之國際條約，但有辦理一切內政並與外國訂立關於工商事宜條約之權。

(四) 中國貨物運入外蒙須納內地貨捐，洋貨由外蒙運入內地，照中俄陸路通商章程所訂「免稅」辦理。

(五) 中國屬民民刑案件，由中國官員審理，蒙民與中國屬民民刑案件，由中國官員會同蒙古官員審理，各按其律治罪。

(六) 中國俄國擔保不干涉外蒙古現有自治內政制度。

除此之外，僅有派官駐兵及冊封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之權，綜觀此項「協約」，我國損失頗大，但以當時袁世凱帝制自為，國力不振，而有此項結果，實為無可如何之事矣！外蒙古第一次「獨立」至是改為「自治」而告一段落。我國政府遂依此項協約之規定，於民國四年六月十六日特任陳毅（號任先）為第一任都護使，充駐庫倫辦事大員，代表我國行使在外蒙古之宗主權，陳氏於十月四日由北京啓行，十月廿六日到達庫倫就職，民國五年四月一日，大

總統袁世凱明令陳毅為冊封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專使，但延至七月八日始舉行冊封儀式，在派陳毅之同時，並於四年六月廿二日續任命陳毅、劉崇惠、張增壽為都護副使，分充烏里雅蘇臺、科布多、恰克圖三地佐理專員，均分別赴外蒙就職；陳毅在外蒙古係採取穩當而漸進之方法，與哲布尊丹巴及王公貴族相周旋，因此獲得外蒙古政要之好感，使其對祖國亦漸具好感，陳氏在外蒙古期間雖僅年餘，但其成就極大，其主要成就約有：

(一) 與外蒙交涉取消課漢人之居留稅及房屋稅。

(二) 設立訴訟處管理漢人民刑案件。

(三) 與俄蒙會訂自治外蒙電線合同價目。

(四) 調和庫倫華商分設東西兩事務所，合組總商會，再與張家口總商會及北京之京師會所互相聯繫協助，以謀商業發展。

惜陳毅於民國五年八月堅辭外蒙都護使，六年一月北京政府任命陳毅（原為都護副使駐烏里雅蘇臺）繼任第二任外蒙都護使，陳毅氏於六年八月七日正式接任都護使之職。

陳毅接任之後，一本肅規曹隨之穩重漸進策略，其時恰逢歐戰方酣，俄軍節節失利，同時俄共革命勢力日見增長，於是俄國對外蒙之控制實心餘而力拙，俄共復於一九一七年十月攫獲政權，俄國政局大亂，更無力東顧，陳毅遂把握此一良機，大力推進華蒙間之友好關係，以其阻礙較少，故其成就亦大，茲舉其大者如後：

(一) 創立大成公司，以溝通內地與外蒙間之交通。

(二) 籌設中國銀行庫倫分行，以取代俄國對外蒙之經濟控制，此舉有裨於華蒙商務甚大。

(三) 建議將阿爾泰改道歸併新疆，陳氏於民國七年八月再呈請以阿爾泰一地，屏蔽新疆，援應西路外蒙古，形勢極為重要，但其自身孤懸，岌岌難保，故力主改設為阿山道，併入新疆省，於邀北京政府核准。

(四) 與外蒙古會同出兵收復唐努烏梁海，此時（民國七年五月）陳毅乘俄國紅白兩黨在烏梁海衝突之際，派嚴式超入唐努烏梁海調查，並會同外蒙古派兵於民國八年七月在克穆齊旗（也作肯木次克旗）加大地方，正式成立都護副使佐理專員公署，淪陷八年之唐努烏梁海，重又歸回祖國懷抱。

外蒙古在二陳慘澹經營之下，使我國在外蒙古之宗主權日益加強，而外蒙古對中央之向心力，亦日見增加，此實為外蒙古撤消自治之先聲，而陳毅氏之奠基工作，陳毅氏之繼續努力，均功不可沒。

俄國此時雖成立共黨政權，但實力未固，對西伯利亞帝俄殘餘勢力，尚未能剷除，而日本亦想乘俄國內亂之際，擴展領土，對我外蒙古尤思染指，發行蒙文報紙，輸入外蒙，以期蠱惑外蒙同胞，並卵翼白俄軍人謝米諾夫（Sem-

nov)，發起「泛蒙古運動」，意欲控制自貝加爾湖以東，至我內外蒙之地，外蒙古政要深恐帝俄流寇之騷擾，復懼日本東來之侵奪，遂更轉向我中央。

民國八年八月十四日，外蒙古王公代表簽於日、俄之侵掠，而感我中央政策之正確，遂與陳毅談判，初步磋商撤治條件大致如下：

(一) 添蒙古幫辦大員，與辦事大員職權完全相等。

(二) 五部改組（係指內政、外務、軍政、財務、司法），直隸大員（即駐庫倫辦事大員而言，亦即都護使），仍如清制，用蒙員辦事，參用漢員，均由大總統任命。

(三) 設地方自治議會，由各部王公組織，受大員監督，參與政事，有關蒙旗利害重要事項，先交其討論。

(四) 興辦實業，必須蒙漢均益，不損害蒙旗土地所有權。

(五) 喇嘛方面請中央特予優待，以資安撫。

(六) 對俄交涉，須中央確實擔任。

此六條件即後日外蒙撤消自治六十三條之基礎，當時北京政府即飭各部擬具意見，將「外蒙取消自治後中央待遇外蒙及善後條例」修正為「外蒙善後條例」（請見附件），原條文則少有變更。

其後因陳毅與西北邊使對蒙事見解不一，對外蒙古撤治問題遂有不同之看法，陳毅對於「外蒙善後條例」頗表滿意，且一再表示不便多加修改，如十月一日陳毅派庫倫公署秘書黃成培攜帶善後條例回京時，曾順帶致陳錄函件乙份，其內容有：「其第六條關於用人一節……尚待熟商，此外各條，大致均不便再改……」等語。但西北邊使徐樹錚氏則認為該善後條例一無可取，其批評善後條例為：「所謂政權統於中央，不過首條中籠統語，而餘數十條，皆加重蒙古王公把持之力」，「關稅如何改訂，財政如何整理，農商礦業如何振興，一未計及」等等，總計有七不可，其實徐氏之評有失公允，也與事實不符，善後條例第四十三、四兩條，即明白規定內地人民經商墾種等事，而第四十七、五十三等條亦規定整理外蒙各項財政收支事宜，第四十八條則就有關鐵路電報郵政等交通事業加以說明，絕非如徐氏所評「一未計及」，至是陳、徐意見不合已達不可開交之地步，無獨有偶，外蒙古之王公與喇嘛也有爭執，喇嘛巴特瑪等，貪戀既得權勢，對撤消自治官府，心有不甘，遂藉故推辭，但王公對撤治則頗為自願，因此對撤治問題復橫生枝節，陳毅氏主張循循善誘，徐樹錚氏則主張速即解決，徐氏態度頗為自恃，自十一月十九日起，至陳毅被徐氏派軍隊護送離庫倫時，陳毅已無發言權。

徐樹錚氏對喇嘛之阻撓撤治，頗為氣憤，於八年十一月十一日晚，率同官軍到外蒙官府總理兼內務大臣喇嘛巴特瑪寓所，出示徐氏自擬之撤治條件八款，迫令巴特瑪簽字承認，巴特瑪不允，次日蒙方請求陳毅協助，十一月十五日外蒙官府舉行會議，陳毅力加勸導，蒙方終於同意先請願取消自治，呈遞撤治

公文，條件將來再議，外蒙撤治問題告一段落。

至於呈遞撤治公文，因外蒙堅持遞交大員陳毅，僅以副本送徐樹錚，並無呈遞儀式，該公文係經外蒙官府總理巴特瑪以下各部大臣長簽名。

民國八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北京政府以大總統令（時大總統為徐世昌），正式頒佈外蒙取消自治，其令文為：

「據都護使駐紮庫倫辦事大員陳毅電呈，外蒙官府王公喇嘛等合詞請願呈文，內稱：『外蒙自前清康熙以來，即隸屬於中國，噶嚕向化二百餘年，上自王公，下至庶民，均各安居無事，自道光年間，變更舊制，有拂蒙情，遂生嫌怨。迨自前清末年，行政官吏穢污，衆心益行怨怒，當斯之時，外人乘隙煽惑，遂肇獨立之舉，嗣經協定條約，外蒙自治告成，中國空獲宗主權之名，而外蒙官府喪失利權，迄今自治數載，未見完全效果，追念既往之事，令人誠有可嘆者也。』

近來俄國內亂無秩，亂黨侵境，俄人既無統一之政府，自無保護條約之能力，現以不能管轄其屬地，而布里雅特等任意勾通土匪，結黨糾夥，迭次派人到庫，催逼歸從，擬行統一全蒙，獨立為國，種種煽惑，形甚迫切，攘奪中國宗主權，破壞外蒙自治權，於本外蒙有害無益，本官府洞悉此情，該布匪等以為我不服從之故，將行出兵侵疆，有恐嚇強從之勢，且唐努烏梁海向係外蒙所屬區域，始則俄之白黨強行侵佔，襲擊我中蒙官軍，繼而紅黨復進，以致無法辦理。

外蒙人民生計，向來最稱薄弱，財款支絀，無力整頓，槍之兵弱，極為困難，中央政府雖經擔任種種困難，兼負保護之責，乃振興實業，尚未實行，現值內政外交處於危險已達極點，以故本官府窺知現時局況，召集王公喇嘛等屢開會議，討論前途利害安危問題，冀期進行。

咸謂近來中蒙感情敦篤，日益親密，嫌怨悉泯，同心同德，計圖人民久安之途，均各情願取消自治，仍復前清舊制，凡於扎薩克之權，仍行直接中央，權限劃一，所有平治內政，防禦外患，均賴中央竭力扶救，當將議決情形，轉報博克多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汗時，業經贊成。

惟期中央關於外蒙內部權限，均照蒙地情形，持平議定，則於將來振興事務及一切規則，並於中央政府統一權兩無抵觸，自與蒙情相合，人民萬世慶安，於外蒙有益，即為國家之福，五族共和，共享幸福，是我外蒙官民所共期禱也。

再前訂中俄蒙三方條約及俄蒙商務條條，並中俄聲明文件，原為外蒙自治而訂也，今既自己情願取消自治，前訂條件當然概屬無效力，其俄人在蒙營商事宜，將來俄新政府成立後，應由中央政府負責另行議訂，以篤邦誼而挽利權」等語。

並據西北邊使徐樹錚呈同前情，核開來呈（註），情詞懇摯，具見博克

多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汗及王公喇嘛，深明五族一家之義，同心愛國，出自至誠，應俯仰如所請，以順蒙情。所有外蒙博克多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汗應受之尊榮，與四盟沙畢等應享之利益，一如舊制，中央並當優爲待遇，俾共享共和幸福，垂於無窮，本大總統有厚望焉。此令。」

自是外蒙古自民國元年受俄脅迫宣佈「獨立」，既而因列強均勢關係，俄國不敢破壞，復脅迫北京政府，承認外蒙古自治，限後因俄國需索無厭，又因我前後二任都護使深諳蒙事，循循善誘，蒙胞卒感內外一體，其關係有若毛之於皮，齒之於唇，全體王公乃決定撤消自治，重回祖國懷抱，外蒙古之「獨立」、「自治」終告結束。

註：原外交部所擬稿無此句，但據中央研究院近史所之中俄關係史料外蒙古部份，擬大總統令稿僅爲「據……等語」，同書第九六頁則作：「據都護使駐紮庫倫辦事大員陳毅電呈見十一月十八日電文」等語。

我國北京政府即將此情正式通知在巴黎之外交總長及駐外各公使館、各國駐華公使等，俄國公使聞訊，曾提出抗議，嗣經我北京政府答復如下：

「從前外蒙古要求自治，實由於外蒙自願，此次取消自治，亦由外蒙自願，前後制度之變更及恢復，均完全因新形勢之發生，以外蒙全體之意思爲根據，來照會所稱國際協約取消之先例，比擬不倫，本政府不能認爲同意，至於俄國人民，在外蒙古通商應享之各利益，倘與中國在外蒙古之主權利益不相抵觸者，中國政府當然許其存在」，此項答復義正詞嚴，狹狹如俄使，亦無法再作無理要求。

前述都護使陳毅與西北邊境徐樹錚意見既不和，而徐氏復剛愎自用，堅持邊境使始爲駐外蒙古正式官署，而蔑視辦事大員地位，自八年十一月以後，陳毅實際已無任何權限，外蒙古撤消自治後，都護使亦於八年十二月撤裁，陳毅且爲徐樹錚派隊送離庫倫，自民國九年秋，中央對外蒙事務，遂由徐氏一手包辦，並將西北邊境遷至庫倫，全部接收原自治官府，改設總務、財計、商運、郵傳、墾牧、林礦、禮教、兵衛等八廳；外蒙古同胞對徐氏之專橫既感痛心，更對自治期間一切利權均爲徐氏所剝奪，更感憤怒，而最令蒙胞不能忍受者，則爲民國九年元月一日，徐氏以專使身份冊封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盛陳杖儀，且令哲佛起立受封，徐氏對哲佛在蒙胞心目中之神聖地位全然漠視，致令外蒙古王公喇嘛氣憤無比。

適於此時俄國革命內戰不已，赤、白兩黨在西伯利亞追逐交戰，兩黨均垂涎外蒙，更兼以日本從中煽惑，是以有「泛蒙古會議」之發生，外蒙古王公喇嘛在氣憤之餘，遂與赤白兩黨勾結，甚至連向來最惡惡之日本，此時亦成爲聯絡之對象。

民國九年（西元一九二〇年）七月以前，北洋軍閥已呈不穩局勢，徐樹錚

爲皖系大將，其西北軍經費原係參戰軍經費，是以雖身在外蒙，實未能忘情於當時政治中心之北京，庫倫防務悉委副都護邊使李垣及邊防軍第三旅旅長褚其祥等人之手，至九年七月直皖兩系交戰，皖系潰敗，大總統徐世昌被直系逼走，撤消邊防事務處及邊防軍，明令通緝徐樹錚等十人，徐乃潛逃；九年八月帝俄餘孽白俄軍人謝米諾夫（Baron Feder Von Urgan Stenberg）保德人後裔，爲帝俄時代之官員，思想極爲封建，憎恨民主思想，生性殘酷，率衆首度攻庫倫，但爲褚其祥守軍擊退，此後由於北京政爭，嚴重影響戍守外蒙軍隊之心理，且察哈爾都統王庭楨，偏向直系，切斷北京與外蒙間之交通，兼以外蒙政教領袖不直徐樹錚所爲，而離心離德，以致民國十年二月，恩琴殘部再攻庫倫時，我守軍遂無力防守，於是庫倫遂爲俄國白黨所佔。

此時北京政府由直系所把持，鑒於外蒙古局勢告急，遂再起用都護使陳毅，任陳毅爲西北邊境使，旋又改爲庫倫科唐鎮撫使，其權限爲管理庫倫、烏里雅蘇臺、科布多及唐努烏梁海各部民政事務，兼轄庫倫所屬土、車兩盟事務，統轄境內駐紮各軍隊、蒙旗警備隊及一切軍政事務，並受政府之特別委任，監督財政及司法行政，暨其他特別官署之行政事務，駐紮地點在庫倫；陳毅公忠體國，雖受命於危難之際，亦毅然北上，於九年底到達庫倫，在鎮撫使下分設烏里雅蘇臺、科布多、唐努烏梁海三參贊及副參贊，恰克圖設民政員，增加民政彩色，採取收拾蒙胞心理措施，惜以所有守軍概爲徐氏舊部，紀律既欠，軍心復散，對戍守外蒙，已無能爲力，陳氏雖有守土之心，實已無力施爲，適恩琴又集匪衆來侵，第三旅兵衆潰散，陳毅及屬員退守恰克圖，此時北京又爲直系兩系所共同宰制，曹錕、張作霖等在天津開會，決議以張作霖爲蒙疆經略使，派鄒芬師長爲察哈爾一路軍援蒙，張景惠爲後援，表面上似乎準備以武力驅逐俄國流寇收復國土，但張作霖志在中原，分別駐軍在熱、察兩地後，即按兵不動，坐視俄國赤白兩黨在外蒙古相互爭逐，誠令人痛心不已。恩琴係謝米諾夫舊部，生性殘酷，自十年三月進入外蒙後，迫令外蒙再次宣佈「獨立」，仍尊哲布尊丹巴爲「皇帝」，並自封「親王」；由於恩琴殘酷好殺，遂爲蒙胞所唾棄；此時俄共在恰克圖俄境之後營子，利用受俄共培植之蒙人蘇赫巴圖（Sukhe Bator）及喬巴山，糾集蒙古青年若干人，於十年四月成立所謂「蒙古人民革命黨」，以却哥都爾吉布爲「主席」，召開第一次代表大會時，僅有代表二十六人，由俄籍顧問操縱，蘇赫巴圖爲「人民革命軍總司令」，組織軍隊及臨時政府，遂於同年七月紅黨擊退恩琴時，進入外蒙古，於七月六日再組織「蒙古獨立國」，由會受俄國訓練之波多（Bato）任「國務總理」，哲布尊丹巴則仍被立爲「皇帝」，實施所謂「君主立憲」，自是俄國紅軍遂強行執行佔駐外蒙，雖經我北京政府多次抗議，均不撤退，且與外蒙古相互承認爲合法政府，並私訂所謂「友好條約」，我於民國十一年五月一日向俄國代表提出如下之嚴重抗議：

「勞農政府對中國歷次通牒曾宣言：所有往日俄國各前政府與中國所定條約均爲無效（註），並放棄中國領土之侵佔，……今勞農政府乃忽背反前言，擅與蒙古私訂條約，此等行爲直與帝俄政府時代之對華，如出一轍，須知蒙古係屬中華民國領土，本國政府實難容忍，爲此特向執事嚴重抗議，所有勞農政府與蒙古私訂無論何種條約，中國政府決不承認」。

註：俄共革命成功獲得政權時，曾於民國八年由俄外交部長齊采林（G. V. Chicherin）對蘇維埃第五次會議報告，謂蘇聯放棄在中國一切特權，民國八年七月，俄代理外交部長加拉罕（Leo Karakhan）根據齊采林之報告，簽署一項宣言，致中國民衆及南、北兩政府，正式申明蘇聯不要求任何補償，願放棄帝俄時代對中國一切所得（詳見黃大受所著中國近代現代史）。

於是北京政府與齊采林、加拉罕等舉行多次談判，但均無結果，十一年十一月北京政府提出抗議後，蘇俄代表越飛（Tolstoy）竟答以「蘇俄並非放棄在中國利益」，出爾反爾，背信忘義一至於此，外蒙古問題始終未獲合理解決。民國十二年二月蘇俄竟迫令「蒙古獨立國」改組爲「革命委員會」，並私訂密約十二款，其要點如次：

- (一) 外蒙古當局，須宣告一切森林、礦產及土地，以後均歸「國家」所有，凡無人佔有之土地，均給蒙古貧民及俄國農民居住耕種。
- (二) 外蒙古天然資源，禁止私有，一切礦區，准許俄國實業家僱用蒙人開採。
- (三) 金礦事業，歸俄國工會及工廠承辦。
- (四) 貴族享有之土地，當即廢止，代以蘇維埃自由交易財產制度。
- (五) 聘請俄國實業家，開發富源，振興工業。
- (六) 聘請俄國專家入外蒙古政府，以資指導。
- (七) 請蘇俄工會，參與創設勞工制度事宜。
- (八) 依蘇俄政府之建議，外蒙古政府一切職權，悉歸「人民政府」之行政部施行，先設立一革命委員會及軍事委員會，再召開會議，以便制憲。
- (九) 許蘇俄軍隊駐紮外蒙，協助蒙人，保全領土，以禦中國。
- (十) 活佛及蒙古王公頭銜，一律廢除，以活佛爲革命委員會委員長。

此項密約之訂定，無異將外蒙古視若蘇俄之殖民地，於是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及汗王公等爵銜，一概廢除，並原有四部（盟）一〇五旗（含科布多十九旗）行政區劃，改用人名及山川等地理名稱，而劃爲：喬巴山區、蘭赫巴托省、肯特省、東戈壁省、中戈壁省、色楞格省、南戈壁省、前杭愛省、後杭愛省、布爾津省、巴彥洪戈爾省、匝盆省、庫蘇古爾省、戈壁阿爾泰省、科布多省、烏布蘇泊省、巴彥烏列蓋省及烏蘭巴托兩市等十八省一市；又於民國十三年強迫外蒙頒佈所謂憲法，自是極引起外蒙同胞之反感，追念昔日中央之寬厚與和平，莫不悼念祖國，民國十三年曾密遣代表至呼倫貝爾，請呼倫

貝爾副都統貴福向政府陳情，表示仍願重回祖國懷抱，請求中央派兵救援，此事中央正在磋商時，不料至五月二十日，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竟受共產黨唆使而告國叛，此事遂發，但外蒙同胞之反抗共黨統治業已普遍展開，同年八月卅日僑外蒙軍政部長丹桑，曾發表演說，警告蒙胞如與蘇聯發生更密切關係，將使外蒙永處蘇聯控制之下，事後此部長即爲蘇聯所派特務暗殺（註），而民國十五年復殺害反共之「中央委員會主席」丹巴多爾濟、「黨代表」因呼喇喇嘛等人，此足徵外蒙古上自黨政要員，下至一般蒙胞均極反共。

註：參見張運民氏所著「俄帝侵略下之外蒙古」（書第一三九頁）。

我國當時既無力收復外蒙古，對外蒙情勢也僅能止於關心而已，但仍在積極交涉，至民國十四年中俄建交時，曾有「中俄協議大綱」之簽訂，在此大綱中，蘇俄依然承認我國在外蒙古之宗主權，並允諾在適當時期撤退紅軍，然則事實上蘇聯並未撤退一兵一卒，但由於我國無力維護在外蒙之宗主權，亦唯有聽之而已。

蘇聯爲求更進一步控制外蒙古，遂於民國二十三年（西元一九三四年）十一月迫令外蒙古與之訂立所謂「君子協定」，以外蒙同胞充當炮灰，抵擋日本在我國東北之猛烈攻擊，至民國二十五年二月又將「君子協定」改爲「同盟協定」，對外蒙之控制較前更甚，遂有民國二十八年之諾門罕事件（註），在此役中外蒙傷亡極爲慘重。

註：諾門罕一地在呼倫貝爾省海拉爾正南方，甘珠爾廟東南方，日俄爭奪此地，俄則以蒙人爲炮灰，日蒙雙方傷亡均大，詳情可參看俄人阿貝爾羅傑金之「諾門罕空戰記」、日人島田俊彦之「關東軍」、林三郎之「太平洋戰爭陸戰概史」、角甲順之「現代史料」、過政信之「諾門罕」等書，蒙蘇委員會編著有「諾門罕事件概述」一書（趙琪璠編著）。

此後數年由於日本大舉侵華，我國傾全力抵抗，已無餘力兼顧外蒙古，及至民國三十四年，二次世界大戰已近尾聲，美國總統羅斯福、英國首相邱吉爾及蘇聯首領史達林在克里米亞半島之雅爾達，舉行秘密會議，美國希望蘇聯出兵，以期提前結束二次大戰，史達林則趁機作政治勒索，兼以羅斯福身邊多爲美共人員，遂作成遺毒人類歷史之雅爾達協定，強迫我國與蘇聯訂立所謂「中蘇友好同盟條約」，美英並在該協定中許俄國以我之旅順爲軍事基地，大連之優越權利、南滿鐵路及中東鐵路優越權利，保持外蒙古「獨立」地位，此一協定實爲人類道德之污點，而外蒙古也因此項協定而有「中蘇友好同盟條約」中「外蒙古獨立問題由公民投票決定」之規定。

我國政府爲顧及世界局勢及國內之安定，勉予同意，遂於民國三十四年十月九日由內政部次長雷法章爲代表，蒙藏委員會委員長兼處長楚明善等十五人，於十月十八日飛抵庫倫，參觀外蒙古公民投票，當時際於外交情勢，雷氏在其

「奉派赴外蒙古參觀公民投票報告書」中，僅作「……至其辦理投票事務人員對於人民投票名爲引導實係監視甚爲嚴密實顯然之事實也」等較含蓄之句語，實則外蒙古此次所謂「公民投票」全在俄人操縱控制之下，絕無自決之意味，故其投票結果並不能代表外蒙古同胞之真正意願，故次年八月二十七日聯合國安全理事會我國已故代表蔣廷黻氏，對此次「公民投票」曾作如下之發言：「吾人認爲此是吾人所不能接受之過份簡單的歷史，當適當時機來臨後，我國政府有從事進一步觀察之權利」，稍後蘇聯即背信忘義，卯冀共匪全面叛國，以致神州陸沉，我國人民與政府遂一致要求廢止「中蘇友好同盟條約」，適於民國四十二年二月二十四日由立法院全體委員代表民意一致決議廢止「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其決議文如下：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八月廿四日中華民國與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在莫斯科簽訂之中華民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友好同盟條約及其附件予以廢止；並保留我國及人民對於蘇聯違反條約及其附件所受之損害，向蘇聯提出要求損害賠償之權」。

我總統遂根據立法院之決議，於民國四十二年（西元一九五三年）二月二十五日明令廢止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外交部長蔣經國亦正式聲明，宣告該條約無效；按我國之同意外蒙古之獨立，乃根據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及其附件而來，而訂約之初蘇聯信誓旦旦遵守條約，訂約之後隨即毀約，現該約既經明令廢止，凡依據該約及其附件而作之任何決議，自也同時無效，外蒙古之獨立自然喪失依據，是以外蒙古實仍爲我中華民國領土，同時亦爲蒙藏委員會施政之對象，凡此皆爲不爭之事實。

回紇文字的起源發展及其與蒙古文字的關係

阿不都拉原著
永樂多斯譯

隨著蒙古王朝的建立，由索格底文字源而來回紇文字也復興起來。同時，由於蒙古王朝的擴張，使得回紇文字在亞洲廣泛地區被使用，並且藉著商業和外交的關係，推廣到歐洲的部份地區及北非。

至於索格底（在中國文獻中多使用「粟特」一詞——編者）這名詞的來源，歷史學家迄今尚無定論。有些學者認爲它指的是一羣居住在在中亞的人，可是另外也有學者認爲索格底只是個地名。不過，到目前爲止，好像並沒有歷史學者肯定的說它是一個特別的種族或民族。

在維吾爾長遠的歷史過程中，他們一共使用了諺尼文（RUNIC）巴瑪文（

象，凡此皆爲不爭之事實。

外蒙古自民國三十四年「獨立」後，蘇聯欲使之成爲殖民地及軍事基地，乃大量「援助」外蒙，使其不能脫離蘇聯，名爲援助，實際以經濟爲手段，加強對外蒙之控制，共匪也曾對外蒙古給以援助，但自匪俄衝突後，因外蒙政要均係受俄卵翼多年之親俄份子，其偏向蘇聯實爲意料中事，共匪對外蒙已無影響，僅有之勞工援助，亦多被遣回，在民國五十一年即曾遣回匪僑所派勞工一萬八千人之多。

在民國五十一年以前，蘇聯在外蒙古投資總額約爲十億美元，蘇聯之所以「援助」外蒙古，據筆者膚淺之看法，約有以下兩點原因：

（一）外蒙古地處我國正北方，居高屋建瓴之勢，我國華北與東北之安定端視我國能否有效控制外蒙而定，而華中、華南之安定繫於華北之是否安定，是以外蒙古實爲我國國防上之生命線，關係全國之安危，有清一代，以少數之滿族，入主中原，享祚二百八十餘年，實基於能有效之控制外蒙。蘇聯深知此中利害，故必須擁有對外之控制權，故予外蒙以「援助」。

（二）蘇聯爲達成一目的，而又恐懼外蒙古之重返我國懷抱，唯有大量「援助」外蒙古，使其在經濟上與中國脫節，則外蒙當不致再返回我國，因此始予外蒙以「援助」。

因此，蘇聯其援助外蒙古之目的，吾人實應深加注意，他日反攻復國時，如何針對此項用心，俾能順利規復外蒙古，亦應及早綢繆。

BAHMA）、藏文、閃文，索格底文，回紇文和摩尼文，在回紇文制定之後，索格底文和摩尼文仍然佔著相當重要的地位。至於在不同的時間內，使用上述不同的文字，完全是受宗教信仰改變的緣故，這就是說，信基督教的維吾爾人使用閃文，而信摩尼教的維吾爾人便使用摩尼文。可是突厥人以及和他們居住在一起的維吾爾人雖然是薩滿教的信徒，却一直使用他們基本的文字——由諺尼文衍變的突厥文。

據估計在西元八世紀時，維吾爾人開始使用由索格底文字衍變而來的文字，但是，最早的歷史文獻——由回紇可汗在卡拉巴卡瑪（QARA BALCHA-

SUN) 所立的石碑碑文却將日期推延到九世紀初，而這種文字也由此變成維吾爾人通用的文字了，它被使用的範圍，從宗教領域擴展到政治、學術、法律、商業甚至於外交等方面。

雖然我們不能確定索格底究竟是何種族，但是我們却無法否定他們是居住在波斯東部和中亞西南與古絲路上從事商業活動的旅行有關，伊明先生 (M. EMIN BUGRA) 在他「東突厥斯坦歷史」一書中強調索格底是突厥回紇的一支。波斯的歷史學者那迪米 (EN-NADIM) 在他的「學術論文」(387-988, FHRST-AL-ULUM) 中也有關於索格底的記載。他說他曾經到中亚阿姆河與錫爾河中間 TRANSOXIANA 地方去旅行。那裏就有一個地方叫 SOGD (索格底)。他說那裏的居民都是突厥人，他們不是信奉一種名為 ACHARIK 的二神教，便是基督徒，首都是 NAVIKAT

從這段記載看來，維吾爾可能與索格底種族相近，這位波斯學者還更進一步指出索格底是在札拉閃河和撒馬爾罕與布哈拉之間。有些學者因此就認為索格底地方的居民是突厥回紇人，他們是逃避東方薩滿教的壓迫而遷居至此的。當然，這只不過是個假說罷了。

關於回紇文是由索格底衍生出來的，最早的學說是由波斯學者法拉丁·穆巴拉夏 (FAHRADDIN MUBARAKSHAH) 提出的，他說維吾爾人除了使用索格底文外，同時也使用 TOQUZ-OGHUZ 這種文字。回紇大語文學者馬木德 (MAHMUD OF KASHGAR) 在他所編的突厥大字典中也提到這項解釋。因此，我們可以看出來索格底文字和回紇文字是有密切相關的。

因為經過這一階段的發展後，回紇文字才臻於成熟，所以回紇文字由此得名，與其他文字比較，索格底文與閃族字母符號最為相似，因此我們可以說這個文字演化過程是奠基於阿拉米文字 (ARAMIC) 而且極可能是它東方的一支。

自從回教進入中亞之後，它便阻礙了維吾爾文字在西突厥斯坦政教中心——如撒馬爾罕、布哈拉、巴里赫 (BALH) 等地更進一步的使用。無論如何，維吾爾文在東突厥斯坦仍被繼續使用。同時，由於蒙古人接受了這種文字，並且用它作在成吉思汗建立的蒙古帝國的官方文字，所以，維吾爾文隨著蒙古王朝的擴張，在西突厥斯坦、波斯、小亞細亞復興起來，直到十八世紀，波斯學者卡夫 (MEHMET KAFUR) 在他的著作中還提到維吾爾文在奧古斯可汗 (OGHUZ KHAN) 時還繼續被使用着，並且還有一段輝煌的發展。從這一記載看來，回紇文在歷史上整整活了一千年。

蒙古人是在西元十三世紀滅乃蠻人後才接受回紇文的。成吉思汗征服乃蠻

之後，用塔什阿通 (TASH ATUN) 在他的宮廷中做掌璽官，塔什阿通除了教導成吉思汗使用國璽和官印外，也建立了處理公文機構，瑞泰沙 (ABEL REMUSAT) 在他的 NOUVEAUX MELANGES ASIATIQUES 一書中指出塔什阿通曾在宮廷中教導成吉思汗諸子維文，而歷史家傑維尼 (DJUVEIR) 也說蒙古人起初並無文字，但是由於寫作的需要，因此被迫接受與他們種族相近的維吾爾人的文字，其他資料也顯示出一個叫塔塔通古的維吾爾 BAKSHI 曾在蒙古宮廷當皇家秘書和掌璽官，因此，維吾爾文是蒙古王朝的官方文字是無庸置疑的，十五世紀的學者阿布都·拉札克 (ABDUL-RAZZAQ) 叫這種文字為蒙維文，從這時候開始，這種所謂的蒙維文就在蒙古王朝勢力範圍下被廣泛的使用了。

忽必烈即位時改信喇嘛教，他為了提高蒙古人的聲望，開始着手創造新蒙文，有一位西藏喇嘛曾經努力從事，但都沒有成功。不過在此之後更進一步的嘗試却得到了收穫，這就是在元朝官廷中被樹立起來，在歷史文獻中出現的加力文 (GALIK)。當時的許多翻譯作品和原文著作都是使用這種文字。在這些作品中，除了是翻譯蒙古、中國和西藏的作品之外，也有相當數量的作品是從維吾爾和梵文翻譯來的。

由土吉奧瑟 (TO JI OSIR) 創立的加力文實在可以說是一種混合的文字。因為加力文的字母中有五個是從維吾爾文中借去的。由此，我們可以看出在創造加力文的過程中，維文是有它的影響力的。所以說，忽必烈朝代中發明的加力文實在與維文是有關係的。雖然在元朝官廷裏，他們還是努力地發展新蒙文，但是維文在蒙古、中亞和 KIPCHAK KHAN 的領域中被繼續使用。

這種蒙維文不但在社會上被繼續使用，在外交上也一直被沿用。特別是在帖木爾王朝和齊加汗 (KIPCHAK KHANATE) 的官廷中還享有崇高的地位，帖木爾給他兒子的遺言就是用這種文字書寫的。齊加汗 TOHTAMISH 在致波蘭王雅加拉 (YAGAYLA) 的一種稱為雅勒 (YARLIQ) 令書中便是使用維文。印度蒙古王朝建立者之父奧瑪爾穆沙 (OMAR MIRZA) 在他給 MIR SAID AHMAD 的私人信件中，也是同樣地使用維文。

土耳其著名的古董收集家穆巴瑞克 (MEHMET MUBAREK) 在伊斯坦堡發行了一本目錄，其中有許多蒙古汗國——包括伊朗、中亞、高加索、小亞細亞和克里米亞等地使用的錢幣。除了這些地方外，這種錢幣也在齊加汗的勢力範圍內被使用，其幣面所鑄印的也是當時廣泛使用的回紇文。

本文中所用「維吾爾」一詞，係近代譯法，見本期「滿清治新政策」序說部分之譯註。

滿清治新政策

羽田 明著
宋念慈譯

緒言

清朝統治新疆，大致可分兩個時期，其一爲自乾隆二十四年（一七五九）回部平定以後，至同治三年（一八六四）新疆大叛亂約一百年間，其二爲自光緒四年（一八七八）收復新疆起，至清朝滅亡（宣統三年，一九一）的三十餘年間。最初期間，它所採取的可說是滿清獨特的統治政策，第二個時期，這種政策已不復存在。因之，在本文之中，即將從滿清對異民族統治政策上看，認爲特別重要的第一期統治政策爲對象，而加以研究。

尤其是從第一期走向第二期的期間，自道光初葉（一八二一年左右）起，滿清在維持其統治政策上，已經發生了困難，因此隨着統治政策也就跟着變化，這是值得注意的一種情勢。我們對這樣的時期，可稱之爲過渡期，而第一期又可分之爲由開始到六十年左右，和後來約四十年間的兩部分，嚴密地說，在此成爲問題的是，第一期之統治政策中的最初六十年間，所實行的政策，可是在後來的四十年間，也還有些傳統政策，在現實上幾乎並無任何變化，所以這一時期的政策，對於滿清統治政策內容，可做開明事例之參考者有之，也有不能做參考的。但是過渡期的各種問題，有很多是應該和滿清統治政策的破綻、完結連起來觀察的，容在另章討論。

最後還有一點須要說明的，就是序論耗費了相當篇幅。這原是因為爲了瞭解統治政策，必須預先把回部的性質，以及歸屬清朝的經過，做爲不可缺的條件，同時一方面又因鑑於總括敘述此種問題之書籍甚少，而不正確的議論反而多見的緣故。

註：本文中所引上諭以及其他漢文，並未指出出處者，均係採自清朝實錄。

序說

一 回部之起源

回部之稱，以見於乾隆二十二年（一七五七）五月丁未之上諭者，似爲最初的样子，此即所謂現在新疆省天山南路地方，居住伊斯蘭教徒部落的意思。自乾隆二十年（一七五五）到二十四年（一七五九），剿滅了西蒙古的雄部、準噶爾部 Jungaria，平定了回部的清朝，把兩部舊地合起來，在「新疆的疆土」意義之下，命名爲新疆，以天山山脈爲界，因交通道路的關係，分成

南北南路，其中天山南路或簡稱爲南路的地區，即爲回部疆域，也總稱之爲回疆。西方人士習慣上稱該地爲東或中國突厥斯坦，這無非是沿用在波斯人中間所通用的 *Tukhsan*，後來復經伊斯蘭歷史家所傳下來的名稱。然此東突厥斯坦之住民，迄最近爲止，並無任何固有的種族名、國名乃至地方名字（民國二十三年即一九三四年採用了維吾爾的族稱。見譯者註），很少做波斯人的樣子，把他們的語言稱做土耳其語 *Turki*，但在此外他們却唯常常自稱爲回教徒 *Musliman*、回教徒民族 *Musliman khalk*、回教徒國 *Musliman yurti*、回教徒語 *Musliman tili*。這種習慣在西突厥斯坦也有，不過在該地方的突厥族，還保存着烏孜別克 *Uzbeks*、土耳其曼 *Turcomans* 等出身部族之名稱，反之，在東突厥斯坦則完全沒有此種族稱，此點實爲特異之現象。

無論如何，東突厥斯坦當地的風習和清朝所說的，也偶爾一致，自是極富興趣的事實，這不能不說是基於回部民族構成的複雜性和回教所具有權威的特種重要性所使然。

有史以前之事，暫不必論，自從中國歷史稱此地爲西域，較有詳細記載的漢代（紀元前二〇六年—後二二〇）以來，主要住民均係印歐語系諸民族，也是文化的擔當者存續於天山南路地方，因之此地成了突厥族的住地，至於被稱呼爲突厥斯坦，乃是九世紀中葉，回鶻被黠戛斯逐出漠北根據地，其中一部分西移以後之事。

四散之後的回鶻，其中一支占據了中國西北邊境甘州、沙州（敦煌）等地，另外一支則停止於天山山脈東端的附近，即分別占領以天山南北要衝之高昌（唐之西州、遼、金、元、明的火州、和州、清以來的喀喇和卓、吐魯番地方）和北庭（元之別失八里、今日之迪化、烏魯木齊附近。）爲中心，分佈於西域各地。在五代、宋、遼、金各朝，以西州回鶻或和州回鶻見知於世，元時稱爲畏吾兒國或亦都護地面。亦都護爲突厥語 *Idikut* 之譯音，乃畏吾兒之王號。到明代止，還沒有成爲種族的國家，十七世紀的伊斯蘭歷史家尙記錄着維吾兒斯坦 *Uiguristan* 的舊名。

此種西州回鶻，至宋初、十世紀的後半，另有興於天山北方吹河 *Chu River* 河畔，及俄領七河省托克瑪市 *Tokmak* 附近之貝拉沙滾 *Belasagun* 又名庫司歐爾達（中國歷史中所稱虎斯幹兒朵爲 *Chur Orda* 之譯音，爲突厥族之一部，虎斯族幕庭之意）爲根據地，擁戴依列克汗 *Jlek Khans* 或卡拉汗 *Kara Khans*（一一三〇）王家之突厥族，此族向南發展而佔有了喀什噶爾、葉爾羌、和闐等城市。

依列克汗家的突厥族，有謂爲回鶻種者，也有謂爲葛(邏)祿 *Katuk* 種者，葛祿雖似主要成分，但是若把它視爲一個摻進了其他突厥部族的混合種族，或更較適當，所以說回鶻也不是維吾爾種，唐代回鶻的名稱已用於包含於本來回鶻部之外但在其支配下的各部族，到宋初才開始使用「威奇爾」、「畏兀(或吾)兒」等新譯字。因之，西州回鶻、甘州回鶻和特別指定的場合，自當別論，如果單說回鶻，則認爲僅屬漫指一般突厥族，乃至西方諸民族之意而已。

於是自九世紀半及唐朝末葉起，游牧突厥民族的諸部族，相繼侵入西域定住，並出現了回鶻國和依列克汗國，將土著先住民之印歐語系統的諸民族，吸收於新來多數支配民族之中，突厥族因之失去了獨自的存在，但相反地，却脫離了從來的生活形態，而逐漸轉移到農業社會，與都市生活親近起來。出現了所謂突厥斯坦。在記錄裏可以找到的證據，最初使用這一名稱者，是十二世紀末，十三世紀初葉的伊斯蘭地理學者亞庫特 *Yaqut* (c. 1173-1229) 其人。西域之突厥化，在文化上也不能不發生顯著的變化，就中伊斯蘭教的傳入，可算得最有重要意義的一件事。

依列克汗家以貝拉沙滾城市爲根據地，十世紀中葉該處已成伊斯蘭教徒在東方的最前線基地。被目爲依列克汗家始祖的沙吐克，包格拉汗 *Satuk Bögür Khan*，於公元九六〇年間，率二十萬帳多數的突厥人，皈依伊斯蘭教，建都於此地，並非偶然，依斯蘭化了的依列克汗家對西域之征服與支配，既爲突厥族之勝利，亦爲伊斯蘭教之勝利。伊斯蘭教的最大敵人佛教，以及其他歷來繁榮於西域之各種宗教，都在依列克汗家的統治之下，衰頹下去。到十一世紀中葉，沿天山南麓庫車之東的布古爾，崑崙北麓的綠洲地帶，一直到和闐東方的車爾成地區，即除了畏兀斯坦以外的東突厥斯坦，都變成了伊斯蘭教國。自來以佛教王國著稱的于闐(和闐)在十世紀之末，爲依列克汗家所征服。北宋哲宗元祐六年(一〇九一)自此地領主所派遣之朝貢使，據傳爲打廝蠻某。打廋蠻等於元代之答失蠻等，無疑爲波斯語 *Danishmand* 之音譯。原來主要以佛教僧侶派充貢使者，至此似已新以伊斯蘭教徒擔當同一任務了。

自宋代起開始使用開來的回回一詞，若從其內容說，是和宋初以後的回鶻約略相等的。也許是回鶻的轉訛，意思是指的突厥人，或竟漠然泛指西方人的意思，它和往昔的「胡」字的表现是相應的。自元代起，尤其自世祖(一二六四—一二九四)時代開始，回回已確實成了伊斯蘭教徒的意思，畏兀兒的名稱普遍化了，而自此時起，回鶻的名稱亦漸廢止。蓋爲了和蒙古人自漢北時代開始即非常親近的景教徒，或佛教徒的畏兀兒人，和其餘的突厥人乃至西方人有別，依斯蘭教徒乃把自己叫成了回回。

回回教確立教權於畏兀兒斯坦，與其鄰接的哈密是何時歸於回教徒勢力之下的呢？

在二二一年征伐西遼以前即投降於成吉思汗的亦都護巴兒朮領土之內，就已有了回回，亦都護巴兒朮和他的後人，都是佛教徒，領內人民亦同爲佛教徒或景教徒，元朝時西方人把畏兀兒國稱爲它魯沙國 *Tharsic*，亦即「基督教徒之國」，這是一個有名的事實。

巴兒朮投降以後，畏兀兒國成爲亦都護的領土，非常安堵，以及於世祖之時，至窩闊臺汗之後窩海都發生叛亂(世祖至元四年、一二六七)，乃受其侵略，亦都護率國逃入中國內地，其屬下的畏兀兒人亦紛紛向哈密、甘肅一帶逃亡，畏兀兒國遭逢了崩潰的厄運。叛亂在世祖、成宗(一二九五—一三〇七)兩代，猖獗異常，迄成宗大德五、六年間(一三〇一—一三〇二)海都死，叛亂才自然歸於鎮定。惟其領土爲察合臺汗家所併，畏兀兒斯坦和其餘的東突厥斯坦各地，都一齊歸其所有。

是先爲成吉思汗所征服的(一二一九—一二三三)阿姆、錫爾兩河地方，所謂外歐克吉安納 *Transoxiana* 也和東突厥斯坦一樣，同屬君臨蒙古本地之大汗領土，但被封於天山北方沃土、伊犁方面的察合臺汗(一二四二年歿)，也曾被賦予若干支配權。在海都之亂中，大汗即大元皇帝之威力一有不及，遂即完全成爲察合臺汗家之屬領。

於是出現了橫跨蔥嶺東西的察合臺汗國，可是維持其統一却是不可能的，不久便於一三一八年分裂爲東西兩部。西部汗家以外歐克吉安納爲根據，東部汗家則以伊犁爲中心，占領了天山南北所謂 *Moghulistan* (即蒙古人之國的意思，包括天山以南廣大地區)本地和所謂東突厥斯坦一帶。察合臺汗家的君主，自此時開始信奉回教。當時的所謂察和臺蒙古族，從言語和血液上來看，已有很多是突厥化了的，西部汗塔爾瑪西林 (*Tarnashirin* c. 1322 or 26-1334) 信奉回教，號稱拉回魯 *Ala al-Din*，以回教的擁護者自任。稍後東部汗托古魯克鐵木兒 *Toghluq Timur* 1347-1363 也成了熱心的回教信奉者。

其後西部汗家在短短五十年中間，便有十幾個汗在交爭和亂立，走上了衰亡之一途；東部汗家在托古魯克鐵木兒死後，他封在喀什噶爾、葉爾羌等之所謂阿爾梯斜利 *Altı shari*、六城(英吉沙、烏什、喀什噶爾、和闐、阿克蘇、葉爾羌)地方，據傳爲蒙古出身的道格拉特家 *Dughlat Amirs* 的卡瑪爾阿爾丁 *Kamar al-Din* 者，曾一度篡奪了主家(一二六七)，後來帖木兒附馬(一二六九—一四〇五)撫輯了西部汗家的混亂，意圖再建蒙古帝國，前後幾次征討蒙古斯坦(一二九〇年左右)，終將篡奪者逐出，恢復了察和臺汗家。帖木兒死後，其兒孫發生內鬨，至十五世紀中葉，察合臺汗家分裂爲二，蒙古斯坦汗家和畏兀兒斯坦汗家成了對立的形勢。當時阿爾梯斜利地方，似乎還在道格拉特家的領有之下。

畏兀兒斯坦汗家一五〇二、三年時，遭受來自吉爾吉斯牧野烏孜別克族的

侵入而滅亡，然早有一族阿黑麻 Ahmad (一五〇一、三年) 繼嗣了畏兀兒斯坦家，故察合臺汗家的系統並未斷絕，阿黑麻死後，長子滿速兒 Mansur (1503-43) 稱汗或稱速里檀，君臨於吐魯番地方，至一五一四年三弟賽德 Said (1533) 伐道格拉特家，奪喀什噶爾、葉爾羌地方，創設了阿爾梯利利的汗家。

元代畏兀兒人或為景教徒，或為佛教徒，據明成祖永樂年間 (一四〇三—一四一四) 出使西域的陳誠等之報告，吐魯番地方有回回及畏吾兒錯居，畏吾兒人似為佛教徒。正好同時進貢的帖木兒的幼子沙路克 (Shah Rukh 1404) 的使節，也有相同的報告。佛教徒之銷匿匿跡，乃在畏兀兒斯坦汗家分立之後，尤其在阿黑麻自舊都別失八里移至吐魯番以後之事。十六世紀的回教歷史家塞非 Seif，他明顯地指出吐魯番是回教徒的城市，但却把哈密做為偶像教徒之國中華的門戶，哈密成為回教徒之居住地，是和吐魯番汗家之勢力發展同時而來的，哈密自唐、五代時起，一直到宋初，都有中國人的殖民地，也有漢人的王在那裏統治，自回鹘西遷以後，也不能斷定便沒有了畏兀兒人的占據者。元世祖時有畏兀兒人的移住者，前文業經說過，有元一代，在大元皇帝統治下，是由蒙古人的王管轄的。馬可孛羅認為哈密住民悉信佛教，但十三世紀間，因在當地設有景教的管區司祭，自然是應該有景教徒的。畏吾兒、蒙古、回回三種夷人混住之事，曾見於明初的記錄，當時的王似乎已稱為速里檀。明室曾在此置哈密衛，冊封蒙古系的王為忠順王、忠義王，以期為西北之屏藩，惟適逢西蒙古的別部瓦剌的勃興期，遭其干涉，後以北邊多事，不克長久保持威勢，王統屢呈斷絕狀態，回回乘此形勢，伸張勢力，賴吐魯番之援助而壓迫蒙古、畏吾兒兩族，其中逃往甘肅、肅州寄居者頗多。哈密完全置於吐魯番治下，乃在滿速兒時代，亦即明朝的成化、弘治年間。至嘉靖八年 (一五二九) 明室亦放棄了收復哈密的意圖。

其後吐魯番的汗家和喀什噶爾汗家的關係，如何進展，無從詳知，但於對立抗爭的結果，勝利似歸於喀什噶爾汗家一方，據萬曆三十三年 (一六〇五) 由印度到中國來的貝內地克特派僧侶格耶思 Benois de Gosses 說，當他通過哈密時，吐魯番和哈密，都是在喀什噶爾汗家穆德一族支配之下的。

歷史上所稱「畏兀兒」「畏吾兒」「畏吾」或「纏頭」等稱，極不雅馴，民國二十三年友人何語竹耿光、徐廉伯達在新工作，乃擬定「維吾爾」三字，呈請省府頒行，以示對邊胞平等互愛之意，特表而出之，藉誌其實獻也。

壹、回部與清朝

一、清初的回部

回部的突厥化和回教化的經過，已略如上述，但至於回教的權威顯著地伸

張，真正可得叫做回部的成立，乃是自明末起至清初之事。

清朝自滿洲進入中原，定鼎北京之時 (一六四四)，天山南路地方，尚為察合臺汗後裔諸汗所君臨。順治十二年 (一六五五)，嘗有哈密使節來嘉峪關，乞求進貢的回目，以葉爾羌來使的身份呈覽表文，據傳阿克蘇、庫車、和闐、吐魯番、哈密等處諸城的首長，皆為葉爾羌汗阿布都喇 (成吉思汗十九世孫) Abduallah 的昆弟，徵之回部史料亦然，惟在一族之間，始終反覆無常的封建戰爭，更配合上東突厥斯坦地理條件的影響，各種勢力的離合集散靡常，這不獨完全失去了察合臺汗國的統一，即諸汗的統治也幾乎僅止於名目上的事情而已。在這種狀態之下，潛藏於傀儡君主的庇蔭之下，而掌握政治上實權，秘密窺伺奪權機會者，即尊稱為和卓的回教教長的一族。

和卓 Hodja (Khawadja) 一詞，發源於波斯語官職名稱，其後轉為貴族稱謂，現在竟變成一般的敬稱，廣泛地使用於東方回教圈裏，可是在西突厥斯坦，却不知從何時開始，把最初四個回教國王阿布貝克 Abu Bekr、歐瑪爾 Omar、歐斯曼 عثمان、阿里 Ali 等的子孫們，都給了這種稱呼。他們在社會上成了一種貴族的地位，大約在十五六世紀時代，其中進入東突厥斯坦，得到察合臺諸汗的信任，不久便掌握了政權者，為回教的神祕派之一的合卓，是以布哈拉和卓巴哈、阿魯、丁、拿克脩便德 Baha al-Din Nakhshband 1317-1389 為始祖，又係被認為是拿氏第五代長老瑪哈圖木阿雜木 (Machdumi Aeen + 1542) 的兒孫。

據通常的說法，預言家 (派噶木巴爾 Paigambar (波)) 默罕穆德的第二十六世孫，賽葉特即阿里之後，「神光」之所有者的瑪哈圖木阿雜木，自撒馬爾罕訪問喀什噶爾時，在賽葉特汗 (一五三三年歿) 之後，阿不都、拉西德汗 (一五三一—一五六六) Abdu Rashid 的治世，他深得有敬虔之譽的拉西德汗之殊遇，受到多數土地與人民的歸附，參與政治密勿，深得民心，他的子孫也成了聖裔，或為汗的師父，地位穩固，他更利用極為迷信的回人對他的敬畏，次第收攬政權於一族之手中，和卓在血統上、宗教上，以穆罕默德直系的后裔者自居，相信當然他應是世界上最唯一的統治者，但自何人才是真正的「神光」所有者的問題上，在主張正統者之間發生分裂，終至演成黨爭。長子和卓瑪木特額敏 Muhammad Emin 的黨稱為白山黨 Aktaghuk，幼子和卓依司哈克 Ishac 的黨稱為黑山黨 Karataghuk，各以喀什噶爾和葉爾羌為根據，拉攏回民，援助附近之游牧民族吉爾吉斯，清朝所稱之布魯特，狂熱地從事於政權之爭奪。

清初東突厥斯坦的情勢是如此的，但準噶爾部的興起，又給這一局面帶來一大變化。

準噶爾部為明代瓦剌部之後，它和成吉思汗後裔所支配的東蒙古之韃靼部，是另一系統的蒙古族。額魯特 Oirat 發達於十三世紀，其根據地為西北蒙古

葉尼塞河上流，及克姆河 Ken 各支流所灌溉的地方，自十五世紀起以卡魯瑪克 Kalmaik 之名，為回教史家所知，西方人所說的卡魯穆克 Kalmauk 為其轉訛，據說原為不信者的意思。

在有元一代不得不雄伏的瓦剌部，自元朝崩壞以後的十五世紀，俄然勃興，及梟雄也先 Esen (一四三九年間——一四五〇) 之出為最盛期。蟠踞於天山、阿爾泰之間，收哈密，征服吐魯番，東從蒙古的大部分，進犯明朝邊塞，撈英宗於土木堡 (正統十四年一四四八)，西征烏孜別克，達到錫爾河流域。

也先死後，瓦剌部的勢力雖未立即衰弱，但是韃靼部在達延汗 (一四七〇——一五二二) 領導下又復興起來，因為遭受其孫俺答汗 Altan (一五二九——一五八三) 的屢次征伐，不得不從葉尼塞河上游逃避於依爾底斯河源之間的地方。當時的瓦剌部是由韓羅斯、Choros 日卡圖特 Baghatut 輝特 Hot、土爾圖特 Torgut 四部而成，稱為四額魯特 Dörben Oirat。

韃靼部到俺答汗時代獲致了大的發展，像現在在外蒙一帶所見到的，都是出自達延汗末子之系統的喀爾喀部所分布，青海也有蒙古族的佔據者出現，而黃派喇嘛教在蒙族間流行，亦自此時開始。

十六世紀的後半，被西北蒙古壓迫的額魯特，於雌伏數十年之後，迨十七世紀初頭準噶爾部長巴圖爾珲臺吉立，乃復歸隆昌，準噶爾原非姓 (部族名)，因為蒙語 'Jesün Shur' 是「左手」「左翼」，所以相當於額魯特左翼之意。在俄國的記錄上，巴圖爾珲臺吉叫做 Boghatir Kontaisha，以葉尼塞河上流為根據地，據稱經常與俄互換使節禮物。

根據清朝紀錄，巴圖爾為也先九世孫，以綽羅斯為姓。但綽羅斯之中，尚有叫做杜爾伯特 Derbet 的部落，巴圖爾的部族似乎特別稱為厄魯特 Öörz / Oghelet。十六世紀末，十七世紀初，巴圖爾成為準噶爾的首領時，土爾圖特還在依爾底斯河上流游牧，前代的巴卡圖特已漸漸無聞，代之而起的是其別派的和碩特 Hoshot 時正列帳於天山北方烏魯木齊的附近。土爾圖特是 Torghaut 之略稱，為蒙古語「侍衛」之意，乃元代克烈部人之後，或為突厥族之蒙古化者，和碩特為成吉思汗之季弟哈布圖哈薩爾子孫的部族，元應與韃靼部歸屬同一系統。在此之外再加綽羅斯和輝特，便形成了四額魯特的瓦剌部。

可是在一六六六年時 (明萬曆四十四年清太祖天命元年)，巴圖爾和以烏爾沙淖爾附近為根據地，並與俄國相通的，名叫阿爾廷汗 (Altinkhan) 的喀爾喀部一酋長戰爭失敗，遷徙於依爾底斯河畔，土爾圖特的大部分以牧地被奪，而開始向西方移動，最後乃以窩瓦河地方為游牧區 (一六一一——一三〇年)。和碩特在順賢汗 Gushi Khan 率領之下，移住青海 (崇德元年，一六三六年間) 恐怕也是由於遭受準噶爾部壓迫的結果。因此在天山與阿爾泰之間，有附牧於杜爾伯特的輝特、和碩特以及土爾圖特等部的殘衆，大體上確立了以綽羅斯 (厄魯特及杜爾伯特) 為中心的準噶爾部綱權，厄魯特的名稱最為顯揚的結果，清

朝把西蒙古各部總稱為厄魯特，因為發音相近的關係，有時也混用衛拉特一名。

巴圖爾的時代，在部族團結方面是一個忙碌的時期，可是在這一時期也曾和喀爾喀發生爭端，又討伐過哈薩克，以外並屢與俄國發生問題，一六三四年據說還遠征過布哈拉。哈薩克是於十六世紀初年滅亡蒙古斯坦汗家的烏孜別克族的別支，當時是西自塔什干，東迄巴爾喀什湖的左右一帶，過着游牧生活的回教徒突厥種族的部落。巴圖爾又與和碩特的順賢汗進兵西藏，奪佔拉薩，並曾威脅第五代達賴喇嘛捕捉後藏紅派的藏巴汗。崇德五、六年 (一六四〇——一四一年) 他因欲在塔爾巴哈臺東方的和博克薩里，經營一個定居的都市，曾向俄國購求材料 (一六五〇年間)，此事見載於俄國記錄，耶穌會教士杜、哈德 Du Haide 並傳說他曾在其幕府所在地之伊犁河上流地方，建立喇嘛廟兩座。所謂厄魯特法典之編纂，以及卡拉瑪克文字，即清朝所稱之托克托文字之完成，均為巴圖爾時代之事，據此可以推測其國力與文化之迅速向上。

巴圖爾死後 (一六五六年間) 因繼承問題一時陷於內亂狀態的準噶爾部，由於喀爾丹的嗣立，而達於全盛期。喀爾丹是巴圖爾的末子，曾在西藏學習喇嘛，因接其兄僧格被異母兄所殺之噩耗而歸國，將反對者打倒，而自立為長。如自康熙十一年 (一六七一年) 算起，他的生年為順治元年 (一六四四年)，則他成為準部之長時，當為二十八歲時之事 (一說為順治六年，一六四九年誕生)。

喀爾丹由於達賴喇嘛，尤其是他的執事官桑結之支持，以建設喇嘛教——準噶爾王國為畢生事業，並以兵力向四方擴展。他因要擊敗功而干涉藏事之和碩特部的勢力，乃於康熙十六年 (一六七七年) 先襲殺占據西套的和碩特別部的酋長，本擬立即侵入青海，嗣以滿清在甘肅之防備甚嚴，而未得實現。但位居聯駿伊犁與西藏青海之孔道的哈密、吐魯番兩地，似於康熙十八年 (一六七九年) 歸噶爾丹所有。該年九月他所派的代表，曾到駐紮甘肅靖逆將軍張勇之處，據說噶爾丹已由達賴喇嘛授以博碩克圖汗的汗號。

得到了吐魯番和哈密的噶爾丹，更一舉而獲致了喀什噶爾和葉爾羌的統治權。

當時該地乃由阿布都喇汗 (見本節初) 之弟伊思瑪業勒 Ismail 汗所統轄，他與黑山派 (依斯哈基亞) Ishaqiya 聯合，放逐了白山派 (依夏尼亞) Ishaniya 的領袖和卓圖克 Hazret Apak。阿巴克為瑪木特額敏之孫，乃民衆視同穆罕默德一樣尊敬之人。阿巴克被逐出喀什噶爾之後，經卡什密爾進入西藏，得達賴喇嘛之書信，而求救於噶爾丹。於是噶爾丹率準噶爾兵，遠征喀什、葉爾羌，降其二城，將所獲的元朝後裔諸汗，都徙往伊犁。自此之後，回部已再無稱汗之人，和卓阿巴克數行神政政治，至此乃成立了名符其實的回部。他又在各城設置準噶爾之稅務官員，以徵收賦稅與阿勒板 Alban，對回

部之內政，似全未干涉。對於噶爾丹征服回部之年代，頗多異說，從諸多理由似可認定為康熙十八年（一六七九年）以後，二十四、五年（一六八五—一六八六）前之事。

阿巴克死後（一六八三—一六八四年康熙二十二年、三年），黑山黨之勢力再盛，與白山黨之間，繼續發生劇烈爭鬥，黑山黨之首領為和卓丹尼牙爾 Danyal、白山黨之首領為和卓阿巴克之孫馬合木德 Mahmud。繼嗣噶爾丹的準噶策妄阿拉布坦，乘此爭端再度進兵回部（康熙五十九年一七二〇年），俘獲了兩個首領及馬合木德之子波羅泥都 Burhan ud-Din 和霍集占 Hodja Jihan，拘囚於伊犁額林哈畢爾噶（山名）地方，使其隨從的回人從事耕種。和卓被擄走之後，回民選阿奇木伯克 Hakin Bek（總督）為諸城之長，但黑山黨首領丹尼牙爾於康熙五十九年（一七二〇年）又被送還，使其管理所謂六城地方。但其長子仍留伊犁為人質，丹尼牙爾也時前來稟報。此外還有分給準噶爾各臺吉的地方，各城仍在準噶爾監督之下，由阿奇木伯克所統治。據傳到策妄阿拉布坦之子噶爾丹策凌的時代（一七二七—一七五四），仍承認黑山派的優越，曾將丹尼爾的四個兒子分封於葉爾羌、喀什噶爾、阿克蘇、和闐等城。因此，回部在宗教上處於西突厥斯坦出身的和卓支配之下，在政治上則受準噶爾部的干涉，除哈密吐魯番兩地外，直至乾隆二十三、四年征服回部止，幾與清朝無任何直接交涉。

二、吐魯番之內屬及清之回部平定

清朝與回部關係始自順治三年（一六四六）吐魯番之入貢，旋因回部之回教徒策勒順治五、六年之甘肅回教徒的叛亂，故一時嘉峪關為之關閉，入貢亦因之斷絕，到十二年乃許重開，直迄康熙年間。

所謂朝貢自然是在承認中國皇帝的宗主權形式之下，對外國特許的通商形態，在一個普天之下所應該共同擁戴的天子，以恩惠勞諸遠夷的觀念下，是一種極有利的貿易。特別是在明代的回部朝貢，因為在性質上僅屬防止入寇的懷柔政策，所以是一種相當有利的貿易，回部的商賈藉貢使之名，以從事中國貿易，他們不僅都組織了幾百人的隊商和中國往來，並攜帶家口寄居甘肅，在北邊逐漸多事的嘉靖年間（一五二二年間），終於因為他們的誘引，而致吐魯番汗滿速兒入寇甘州，順治年間之回亂，亦可視為此種形勢之延長。

順治十二年允許回部入貢之後，前來甘肅的隊商，每隊也有幾百人，他們都是攜帶妻子眷屬入關，狃於前代以來的恩寵，不斷地要求賜給糧食以及其他物品，不知饑足。清朝鑑於此種情形，乃規定限制貢使數目，限制進京數目，禁攜帶婦女，定貢期及不許寄居、滯留等種種對策。因此清初對回部的關係，總算沒有脫出前代以來的朝貢關係，但自噶爾丹征服回部，轉而侵略喀爾喀，

對清採取敵對態度，新的關係乃應運而生。

噶爾丹似乎早已有了侵略喀爾喀的用心。自從康熙十六年（一六七七）襲擊西套的和碩特時開始，就傳開了那樣的風聲，十八年（一六七九）自喀爾喀也有同樣的情報傳來。但其後雖然也時有似有武裝衝突，然仍未至大舉入寇階段。天聰十年（一六三六），太宗受內蒙古各部之擁戴，繼嗣成吉思汗正統，以蒙古可汗資格君臨蒙古以來，噶爾丹在實際上雖容有另外想法，但至少在名目上它似乎已充分知道，侵略服屬於滿清的喀爾喀，必將導致與清朝演成正面衝突的危險。當時業經征服了回部、哈薩克、布魯特，並威壓青海和雄視中央亞細亞的準噶爾王國，正壟斷着布喀拉、俄羅斯與中國之間的中間貿易，誇富稱強，火器的充實，尤喧騰衆口。在其對清廷的貢物之中，與馬、駝、貂皮等同來的厄魯特鳥槍，尤為人所注目。然康熙二十七年（一六八八）企圖侵犯喀爾喀而請援於俄羅斯的噶爾丹，其行為已足以充分說明其如何恐懼與清朝發生衝突了。

雖然如此，可是喀爾喀本身竟給了噶爾丹進侵的口實。

其時喀爾喀分為車臣汗、土謝圖汗、札薩克圖汗三部，土謝圖汗與札薩克圖汗之間，因舊札薩克圖汗屬部的歸屬問題，繼續發生爭執，雖經清帝及達賴喇嘛之調停，亦未發生效果。札薩克圖汗沙喇與噶爾丹有血緣關係，而土謝圖汗則是他的宿敵。當康熙二十五年（一六八六）因達賴喇嘛與清帝之斡旋，兩汗於會盟之際，土謝圖汗之弟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喀爾喀活佛）代表其兄前往會盟，與達賴喇嘛之使者抗禮，互不相讓，且土謝圖汗亦未履行所定交還札薩克圖汗舊部衆之義務，以達賴喇嘛護法者自任的噶爾丹，認為活佛為其仇敵之弟，故責其非理，因之雙方意見更深，噶爾丹為沙喇促請對方履行盟約，土謝圖汗亦不之應，且辱罵噶爾丹之使者，襲殺沙喇，進侵噶爾丹之牧地，並擊斃噶爾丹之族弟。

違法非理既在土謝圖汗一方，於是噶爾丹於康熙二十七年夏，與師三萬，自阿爾泰遊牧地出發，越杭愛山向喀爾喀問罪。喀爾喀早聞噶爾丹有入侵之說，但疏於防守，於是三部慘遭敗北，依照活佛指示，遁走漠南，仰賴清廷庇護，康熙皇帝乃開歸化城、張家口、獨石口等處倉庫，加以賑卹，並給予內蒙古界內之牧地，恩養八年之久。康熙三十年（一六九一），喀爾喀三部乞帝親臨，會盟於多倫，誓為臣屬，以後直至清末，效忠不替。

允許喀爾喀內附的康熙帝，認為不是既在喀爾喀這邊，則用和平方法與噶爾丹和議，使其從蒙古地方撤退自為上策，除非萬不得已，乃肯用兵擊退強敵，還喀爾喀部衆於舊地，但和平方法無效，噶爾丹更藉口追擊喀爾喀為名，南下至赤峯附近，清兵邀擊（康熙二十九年、一六九〇）之於烏爾布通，康熙三十五年（一六九六）率三路軍親征漠北，在土拉河之北、肯特山之南的昭莫多 Chamodo 戰役之中，準噶爾再度遭遇痛擊，而致一敗塗地。其時與噶爾丹對

立的兄僧格之子策妄阿拉布坦，乘叔父久稽漠北不在之際，在天山、阿爾泰間之準噶爾盆地，建立了堅定的地位，回部也落入他的掌握，噶爾丹無地可逃，又聞清軍進迫，乃於康熙三十六年（一六九七）仰藥自殺於阿爾泰山中，杜、哈德於憑弔英雄之末路時說，假如噶爾丹若不是遇上了像康熙帝那樣的英主為敵的壞運氣，且不遭其姪策妄阿拉布坦的背叛，即中國的命運亦不容逆睹。

噶爾丹的敗亡導致了哈密對清朝的內屬。清朝聯合策妄阿拉布坦以期牽制噶爾丹，為自康熙二十八年以來的政策，三十二年曾重派理藩院員外郎馬迪，出使策妄的幕庭。馬迪到哈密時曾遭噶爾丹屬下之掠奪，因得哈密達爾漢伯克（頭目）額貝都勒拉的保護，而得平安歸還嘉峪關。厭惡準噶爾的勒索，希望脫離其羈絆的哈密，其企圖接近清朝的痕跡是很顯然的。及昭莫多大敗之後，噶爾丹欲至哈密取糧，額貝都勒拉即派使於清廷乞求內附，適噶爾丹之子丹濟拉抱噶爾丹之屍奔哈密，額貝都勒拉之擒獻於清廷。於是清廷頒額貝都勒拉札薩克勒印，賜紅纓，待遇優渥，翌康熙三十七年（一六九八）派官至哈密編旗隊，此為清朝勢力向關外發展之第一階段，額貝都勒拉之曾孫玉素布平定回部有功，受郡王銜，子孫相承，直至民國十九年止。

噶爾丹死後，準噶爾的勢力亦未遽形衰落，向東方的發展雖被遮斷，但向西方的活動，無寧說比前代更為顯著了。策妄阿拉布坦於康熙三十六年（一六九七）成為準部酋長，他除承認黑山派在回部中的優越，並強化其支配權外，且欲征服厄瓦河畔的土爾扈特，攻擊哈薩克使其部落解體，又併吞了依西庫庫爾湖邊的布喀特，部眾之大，一時無出其右者。

當時俄羅斯正為彼得大帝之世，他命令自特包爾斯克城起，連築要塞，直達回疆。其目的在掠奪此一方面之金礦為己有，因與準部發生紛爭，折衝交涉甚久。同時俄國商人往來，亦極為頻繁，據俄國一使節報告，伊犁地方三十年來農業之發展極速，五穀水菓出產極多，皮革、織布、冶鐵等手工業更為繁盛。俄國俘虜並有人協助策妄阿拉布坦及其子噶爾丹策凌，製做洋槍白砲者，策凌所派之商人，往來於印度、西藏和中國之間。

策妄因在西方獲致了超越噶爾丹的成功，故又轉而與清朝相爭。

策妄憤恨哈密內附，康熙三十九年掠奪其商民於吐魯番，康熙五十四年（一七一五）復派兩千騎進迫哈密北境，因遭駐防清軍及回兵擊敗，且聞即有援軍自肅州到來，故引兵遠遁。清軍追至巴里坤，翌年便在嘉峪關外各地，自布隆吉爾起至哈密、巴里坤附近興辦屯田。而策妄則越過了達克拉克馬干沙漠，自和闐進兵西藏，占領拉薩，並在該年殺害了附清的和碩特部汗。深恐準噶爾領有西藏的滿清政府，自青海四川兩路進兵西藏，將之收入版圖（康熙五十九年一七二〇），同時又攻取了吐魯番，康熙六十一年（一七二二）命福康安、傅爾丹二將，自巴里坤，阿爾泰襲擊準噶爾根據地，適值策妄與俄羅斯構毀，疏於東邊之警備，故烏魯木齊為清軍所輕易占領，但以糧秣不足，未得進兵伊犁。

而還。

策妄既失吐魯番，故每年必設法攻擊，以圖恢復，然清廷在防備上亦微費苦心，康熙六十一年（一七二二）帝崩，雍正帝嗣立，三年（一七二五）與準部和議，將駐巴里坤大軍撤回，吐魯番回民六百五十戶，懼準噶爾威脅，請求內徙，清廷將其安置於肅州境內。此為吐魯番回民內屬之始，後九年（雍正十一年，一七三三）吐魯番（魯克沁）頭目額敏和卓，亦率眾八千餘人徙瓜州（安西），後乾隆十九年（一七五四）授額敏和卓札薩克，使編旗隊，哈密吐魯番回部二旗，於茲成立。迨準噶爾勦滅後，瓜州回民始全部返回故地，封平定回部有功之額敏和卓為郡王，統治屬眾，世傳封爵直至同治年間，肅州之回民亦依準部裁定後方回故土，屬於清朝派遣之領隊大臣，從事屯田。

策妄阿拉布坦死於雍正五年（一七二七），其子噶爾丹策凌嗣立。其為人梟雄，不亞於噶爾丹策凌，雍正九年於科布多之西的通泊，破清將傅爾丹之兵，兩度侵入喀爾喀，此時擊退準噶爾兵者，為土謝圖汗部之郡王額駙（駙馬）策凌，以戰功晉封親王，並承認其贊普諸額部之獨立，故迄今喀爾喀分為四部，其由來概如是也，戰敗的結果，準部疲弊乞和，清廷亦撤西北二路（巴里坤、科不多）之兵，噶爾丹策凌屢向清廷要求歸還阿爾泰舊地，清廷拒之，至乾隆二年（一七三七）乃以阿爾泰定為準喀兩部之界限。

乾隆十年（一七四五）噶爾丹策凌死，準噶爾部四代之霸業，始告衰微，三子一女之間因繼承問題而爭鬭，準噶爾部亂起，至此清廷方漸得平定伊犁之機會。

策妄阿拉布坦的外孫阿睦爾撒納，為此次準部爭亂之中心。阿睦爾撒納屬於杜爾伯特，是遊牧於塔爾巴哈臺的輝特部酋長，他曾殺噶爾丹策凌之後，而援助準噶爾聖吉達瓦齊，並佐其就汗位。但不久兩者之間發生不和，阿睦爾撒納遁而降清，在熱河入覲，獻策攻取伊犁（乾隆十九年秋一七五四）。於是乾隆帝以為奇貨可居，於翌二十年春，發西北兩路之師，衝入伊犁巢穴，正在內亂中的準噶爾部眾，幾乎未交一戰即行敗竄，達瓦齊奔回疆，為烏什阿奇木伯克霍集斯所擒，引渡於清軍。

於是清廷變更舊轄衛拉特四部（準噶爾—厄魯特、和碩特、土爾扈特、杜爾伯特）之組織，擬以輝特代土爾扈特，封阿睦爾撒納為該部之汗，設綽羅斯部以代準噶爾部，如喀爾喀四部之規模，以分其權力，惟阿睦爾撒納垂涎四部之長，陰謀獨立背棄清朝。因之乾隆二十二年（一七五七）再有第二次征伐準噶爾之舉，將軍兆惠率軍攻入伊犁，阿睦爾撒納原為一野心家，但非準噶爾汗之正統，不能服眾，且當時痘疫流行，疲弊至甚，兆惠乘之轉戰各地，故得輕易奏功。阿睦爾撒納棄博羅塔拉（宰桑淖爾附近）根據地，逃往哈薩克，更奔西伯利亞，罹痘疫死，俄國將其屍骸送往恰克圖，引渡於清。禍首既喪，叛亂亦次第歸於平靜，但為了善後，自乾隆二十三年起至二十五年止，前後還整整

費了三年時間。清朝之用兵，非常殘酷，準噶爾六十餘萬人口中，半數病死逃亡，其他一半則為清兵所殺戮，伊犁各地已無厄魯特存在。

隨着準噶爾之滅亡，其隸下人民及被認為是阿拉巴圖 albatu (蒙) 的回部，不久亦歸清朝所管理。

如前所述，策妄阿拉布坦以來，黑山派在回部之優越地位已被承認，噶爾丹策凌死後，黑山派首領即擬乘準噶爾內部紛爭之機，唆使回部脫離準噶爾。治乾隆二十年（一七五五）清兵一定伊犁，企圖秘將回部據為己有的阿睦爾撒納，即進言清朝的將軍班第，將禁錮於伊犁的白山派首領和卓馬合木德的二子波羅泥都（布拉尼敦）霍集占兄弟，即所謂大小和卓木者釋放，使兄返回喀什噶爾抵當黑山派，留弟霍集占於伊犁，使他管理當地回民。阿睦爾撒納叛亂時，霍集占不獨率回民協助叛徒，同時波羅泥都還在喀什噶爾和葉爾羌打敗黑山派，炫示着要建立一大回教王國，以威脅清朝的形勢，阿睦爾撒納敗亡之後，霍集占遁歸回疆，和哥哥聯合起來樹起叛旗，虐殺了招撫的清使，庫車以西的回民被煽惑參加者很多，造成很大的騷動。

從事征勦準噶爾殘賊的清軍，也未能立即南下。乾隆二十三年（一七五八）五月，任都統雅爾哈善為靖逆將軍，率軍萬餘自吐魯番西進，圍庫車。此時大小和卓木來援在城中，頑抗不降，但結果還是屈於清軍長期圍困之計而遁去，八月殘餘份子乃開誠投降，清帝以此役以萬餘官兵，圍城數月，然尚予大小和卓木以逃遁的機會，對此非常震怒，乃斬雅爾哈善以下諸將以徇，並命伊犁將軍兆惠前往平定。兆惠招撫庫車、阿克蘇、和闐諸城，壓迫大小和卓木至於

西藏志的撰述人

楊和璫

清人類勒德特氏和寧，字太莽，于乾隆五十三年（1788）任關中承宣使者期間，在成都獲得西藏志（亦作誌）手抄本。因為他覺得「西藏為生佛之地，與教之方，其山川疆域，風俗程途，尤不可不詳其記載也。」乃于乾隆五十七年為之序，並刻板複印，以公同志。在他的序文中，他說：「是書傳為國朝果親王所撰。」果親王（1697-1738）者，康熙第十七子允禮（亦作胤禮）是也。歿于乾隆三年二月，無子，皇族乃以雍正第六子弘瞻（1733-1765）為其後。於是，弘瞻也就承襲了果親王的封號。可惜他于乾隆二十八年因罪降為貝勒，直到死前不久才恢復到郡王的位置。

在西藏志的事蹟篇末尾部分，有雍正末年果親王奉旨前往泰寧（藏名 Ngag-thar，即惠遠廟所在地噶達）與達賴喇嘛相見，並派兵送他回拉薩的記載。這個果親王當然是允禮。他因為要紀念該次旅程，除將沿途所賦詩詞集冊印行

外喀什噶爾、葉爾羌附近，但因孤軍深入，於喀什東方的黑水營陷於重圍，直至次年（一七五八）春，援軍方纔開到，撤至阿克蘇。同年夏兆惠再度起兵，他自烏什向喀什，副將富德則自和闐向葉爾羌，各領精兵一萬五千進攻。清朝為清除禍根，本不辭殲滅準部，但以匪黨內部互相爭鬪，諸城利害本不一致，對此缺乏團結的回部，也並未當做大敵看待，故在名義上是聲討大小和卓木之罪，但實際上是獎勵一般回民的投降，而專從分化匪酋勢力着眼。諸城回民因眼見霍集占兄弟的形勢，日益不利，且極苦於勒索，隨着清軍的節節進逼，相繼請求歸順，至此和卓兄弟幾無一戰的勇氣，僅在少數親信陪同下，逃出重圍，逃往帕米爾地方。清軍自阿爾楚山窮追至巴達克山（阿姆河上流地方）界上伊西洱庫爾湖畔。和卓木兄弟逃入巴達克山，被其梭里檀沙所擒殺，獻霍集占之首級於清。回疆既平，遂為清之領土。

隨天山南北兩路的平定，帕米爾以西諸國，各民族，如哈薩克（乾隆二十二年—二十九年）、布魯特（乾隆二十三年、四年）、愛烏罕（阿富汗）（乾隆二十七年）、浩罕（乾隆二十四年，額爾德尼汗表請內附。貢馬）、塔什干（乾隆二十三年）等，相繼遣使入覲，請求內附，然除哈薩克、布魯特與浩罕之外，則不過僅與回部之間，保持通商關係而已。乾隆三十六年（一七七二），居住於窩瓦河畔之土爾扈特部衆七萬餘口，聞伊犁鎮定，乃脫離俄國的暴政來歸，清朝遂撥給天山山裏的珠勒都斯谷地（焉耆）、塔爾巴哈臺（現塔城）、庫爾喀喇烏蘇（現烏蘇縣）等地的牧場，以資安插。（待續）

，並將目見耳聞，逐日紀錄，收為上下二卷，冠以自序，題名為「西藏日記」。民國二十六年二月，禹貢學會據江安傅氏藏稿本，已重印傳世。據前清同光年間清泉逸叟所記（見西藏日記跋）：

允禮「博學多聞，妙嫻翰墨。著有春和堂集，靜遠齋集，奉使紀行詩。別著西藏志一書，流傳殊罕。」……「嗣王弘瞻……亦善詩詞，雅嗜典籍……洵可云後先濟美焉。」

宣統三年，陽湖許光世與蔡晉成二氏于其合編之西藏新志例言第一條稱：「是書遠稽前古，近採時聞，昔果親王有西藏志，本書定名新志，蓋紀實也。」

是以後之學者除少數認為西藏志撰人未詳以外，多半皆與許蔡二氏之說相同。允禮從泰寧回到北京以後不久，世宗宴駕，高宗即位。允禮受遺詔輔政，

不幸于乾隆元年坐事失寵。他曾任職理藩院，工部，戶部，並又親赴西康與達賴喇嘛會面。既然從康熙末年開始清廷已積極經營西藏，適時編纂一部有關西藏的志略實有必要；而由允禮那樣一個有文華的宗室著手理稿也很可能。因為他既有力量羅致人才，也可自由運用官書文檔。

西藏志下冊第四十三葉所記之「自藏至布魯克巴路程」一節，按民國二十五年王雲五主編叢書集成初編之西藏考第四十六頁云，該行程係「雍正十三年正月初二日差千總李仁寶勒印賜布魯克巴諸彭林親等三部落從西藏起身至布魯克巴路程」。當這種公務旅行呈報到理藩院以後，自然就成了編纂西藏志的最好材料。又如處理有關兵制與邊防之史料時，若不引用官書，恐怕就很難達成任務了。

綜觀西藏志全書所記與史實年代有關之處，除了第二十七葉下記有「第十四世（或作第六世）班禪于乾隆六年（1741）坐床」一節以外，其餘紀事多為乾隆三年（1738）以前發生者。正巧，允禮就是在乾隆三年二月離開人間的。可見西藏志的脫稿年代與果親王允禮的喪期一定有其密切關係。

和寧在成都獲得西藏志手抄本時，弘瞻故去才二十三年，就已經不能確定該書作者為誰，只說「相傳為國朝果親王所撰」。而在二百年後的臺北市，于文海出版社收西藏志入中國邊疆叢書第二輯時，主編者沈雲龍先生在他民國五十五年元月九日所作的「影印西藏志前言」中，明白指出該書為清焦應旂所撰。另外還有一位精於西藏歷史的意大利籍教授 Luciano Petech 先生，亦于一九七二年修訂過的再版著名史書 *China and Tibet in the Early XVIIIth Century* 第七頁，增列「西藏志」為主要中文參考書之一。他也認為西藏志是焦應旂于一七三七年，即乾隆二年後不久所完成的。

如果他們的立論根據正確，從西藏志流傳以後直到目前為止，有許多曾經引用過西藏志而又註明該志為果親王所撰，或是認為「撰人未詳」的典籍，都必須加以校正。可惜僅憑 Petech 的認為，與沈雲龍的「西藏志，清焦應旂撰，其里籍不詳。……（一七一）……五月，返抵遼陽本任。……時應旂年五十七歲，乃以所撰『藏程紀略』一篇，冠諸西藏志之首。……」等字句，似乎不夠令人確信西藏志就是焦應旂寫的。因為沈氏的「前言」：末句「惟志中有涉及雍乾時代者，似此書之纂成及梓行，或當在乾隆以後也。」就足以引起讀者的疑惑了。

文海出版社影印的，以及 Petech 所引用的西藏志，都與駱博士（J. F. Rock）為美國西雅圖華盛頓大學遠東圖書館收藏的手抄本「西藏志」的版本相同。這種手抄本在其他地方也可以找到，譬如國立政治大學教授劉義棠先生于撰著「西藏之政教合一制」時所參考的「西藏志」就是舊抄本線裝書。按照他的「參考書目」，該志是「不著撰人」的。像文海出版社及 Petech 所根據的版本，除了「西藏志」本文上下兩部分以外，前頭還有一篇焦應旂于康熙六

十年五月十一日所作的「藏程紀略」。而像駱博士收集的手抄本，則以和寧于乾隆五十七年春季吉日為西藏志之刊行所作的二葉半序為始。至於該志本文的排版與葉次，皆完全相同。

若西藏志果為焦應旂所撰，乾隆六年當班禪在札什倫布坐床時，他就應該是一位七十七歲的老翁了。如果他確實活得如許高齡，也確曾有機會去運用官廷文書，更能持之不懈，在發表了「藏程紀略」二十年後，又完成了一部上下兩卷的「西藏志」，他的著作精神可就令人無限敬佩了。

可是，在衛藏通志裡頭，西藏志被稱為「舊志」，不與卷四程站部門的「附錄藏程紀略」視為出自同書。當然，這種安排是跟和寧脫不了關係的。這個和寧跟另外一位比他年長而名字相似的鈕祜祿氏和琳（歿於嘉慶元年八月）都曾為駐藏大臣。當和寧為西藏志作序刊印時，正是和琳赴藏之日。二年後，和寧亦派入藏為幫辦大臣，且於嘉慶五年至六年復派赴藏為大臣。據丁寶存著清代駐藏大臣考第五十四頁云：

「和寧在藏著西藏賦一篇，於西藏之地理、歷史、氣候、物產、風俗等均有敘述，加以豐富之註釋，中具不經見之材料甚多，於嘉慶二年刊行。」如果像和寧這樣有學養的人士都不知道西藏志是焦應旂撰的，那麼後人的立論所據又係出自何典？會不會另有他人將焦氏的「藏程紀略」與撰人未詳的「西藏志」湊合在一起而來他一個張冠李戴？結果和嘉慶年間重修四川通志一樣，在卷百九十五，西域志五，第三葉上的一國朝駐藏大臣題名」的和寧名下註上一句「和寧……著有西藏志西藏賦」。當時負責搜集有關和寧的著作資料的人可能看見過和寧曾為之作序而刊印的「西藏志」，卻沒有看見他在序中所寫的「是書傳為國朝果親王所撰」的字句。

如果西藏志確係出自焦應旂的手筆，為何他竟不在志前或志後署名作序，以介紹他十餘年來的心血結晶呢？他並不是一個怕出名的人！因為他曾以下列文字結束他的「藏程紀略」：

「因不揣固陋於回藏之暇援筆以紀其略匪敢矜功市異亦以誌此番閱歷此番辛苦……皆康熙辛丑仲夏中浣之吉知涇陽縣事焦應旂識。」

也許西藏志的纂成和衛藏通志一樣，並非出自一個人的手筆，而是由官家幕後支持而編修文獻。由於和琳與和寧皆曾為駐藏大臣，而且後來也都歷任清廷顯宦，由他們出面羅致人才，把經略西藏的文書典籍纂成通志，實非難事。書成後，不但可為後人治藏借鑑，亦可資紀念其在藏務上所付出的一番心血。是故人人皆云衛藏通志撰人未詳，然亦不敢否認琳、寧二氏與該通志之密切關係。同樣的，那位曾經管理過理藩院多年，且又曾奉旨治理第七輩達賴喇嘛由康返藏事務的果親王允禮，也可能與西藏志的纂成有不可分割的關係。

西藏志的「事蹟」及「紀年」二篇，皆以雍正十三年為終結，而且最詳盡。其涉及乾隆二年與三年的事蹟不多，且僅有「第十四世班禪于乾隆六

年坐床」一句是允禮身後所發生的史事。所以，如果說西藏志的編纂工作與果親王允禮的生命同終，那是不會錯的。甚而進一步說果親王生前曾在幕後促成西藏志的編修，也有可能。

如果說那位當年曾經參與押運糧秣工作而赴藏，經過九死一生的艱辛旅程而終於平安返任的五十七歲的巡陽縣知事焦應旂，日後也曾被羅致在果親王幕

下，為西藏志的編纂而貢獻過他的才智，那也並非絕對的不可能！
既然西藏志可能不是出於一個人的手筆，而是一種集體編修而成的，在主腦人允禮逝世以後，自然就沒有再擴增篇幅了。像那種「乾隆六年坐床」的字句，也許只是某某人士後來在原定稿上添上一朵小花而已罷了。

——一九七三年六月一日寄自愛爾蘭之堡——

先秦時代邊疆民族與中央之關係 (續)

萬 毅

丙、西周時期中央與諸夏對邊疆民族之政策及關係

據史記周本紀載，周之先世，在陶唐虞夏之際，均作「稷官」，號曰「后稷」，及太康失國，其先不窋乃自竄於戎狄之間，歷十代而至古公亶父。時「古公亶父積德行義，國人皆戴之，燕育戎狄攻之，欲得財物，予之，已復攻，欲得地與民，民皆怒，欲戰，古公曰：有民立君，將以立之，今戎狄所為攻戰，以吾地與民，民之在我，與其在彼何異，民欲以我故戰，殺人父子而君之，予不忍為，乃與私屬，遂去邠。」孟子亦載其言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二三子何患乎無君，我將去之。」以外莊子讓王、淮南子道應訓、尚書大傳等均載古公避戎之事。讀史至此，每感「以吾地與民，民之在我，與其在彼何異」是何其胸襟：「民欲以我故戰，殺人父子而君之，予不忍為」表現了至高之人道主義。但吾人尤須認識者，乃其所據領土本即戎狄所先有，故古公不願殺人父子而「君」之。「民之在我，與其在彼何異」，「為吾臣與狄人臣，奚以異哉」，更證其無「敵」。「我」之分，無「族類」之別，惟「習俗」不同而已。故居住於戎狄之間，不得不隨其俗，及遷於岐下，始「貶戎狄之俗而營築城郭室屋」。因之孟子稱「文王西夷之人也」。然而當時若干人對戎狄與諸夏之界限並不深，周室之先人不僅「自竄于戎狄」，即古公亶父二子太伯虞仲亦相偕「亡於荊蠻，文身斷髮」。

周自古公遷於岐，另闢天下，三子季歷繼之，是為公季。「公季修古公遺道，篤於行義，左右諸侯順之」。時領導天下者為商朝，而武乙暴虐無道，大戎首先擾邊，西方諸戎亦乘機而起，然欲侵商，必越周境，周坐鎮西方，復得民心，對戎狄入侵，守土有責，且又奉令專征，因是與西方諸戎接觸頻繁，歸納言之，可別為四方述之。

一、征伐

商武乙卅年，周師伐義渠，乃獲其君以歸。（竹書紀年）
商武乙卅五年，周季歷伐西落鬼戎，俘二十翟（狄）王。（後漢書西羌傳、竹書紀年文）
商太丁二年，季歷伐燕京之戎，戎人大敗周師（後漢書西羌傳、竹書紀年文丁）。

商太丁四年，季歷克余無之戎。（後漢書西羌傳文、竹書紀年文丁）
由於周季歷數次伐戎之舉，引起中央（商太子）之重視，遂命季歷為牧師（同右注）。

商太丁七年，周季歷伐始平之戎克之。（竹書紀年文丁）
商太丁十一年，周季歷伐豳徒之戎，獲其三大夫。（竹書紀年文丁）

以上二事，後漢書西羌傳：「太丁命季歷為牧師，自是之後，東伐始豳徒之戎，皆克之」。而竹書紀年除分別紀述外，並謂周季歷於伐克豳徒之戎獲其三大夫前往獻捷之際，為文丁所殺。史通疑古篇、雜誌篇兩引，皆作文丁殺季歷。

公季卒，其子昌嗣位，「遵后稷公劉之業，則古公公季之法，篤仁、敬老慈少，禮下賢者，日中不暇食以待士。」天下聞之，歸之者四十餘國。竹書紀年載：「商紂王三十三年錫命昌為西伯，得專征」。西伯雖奉命「專征」，但以「伐逆不伐順」為原則。

商紂王三十六年，周遂伐昆夷（竹書紀年）

此為西伯「得專征」後，首次伐夷，何以伐昆夷？竹書紀年云：「（商紂王）三十四年，昆夷侵周。」帝王世紀云：「文王受命四年，周正月丙子朔，昆夷伐周，一日三至，周之東門，文王閉門修德而不與戰」。此與竹書相合，由見周之伐昆夷，乃昆夷先伐周，周所以伐「逆」也。

又後漢書西羌傳：「及文王為西伯，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獫狁之難，逐獫狁而戍之，莫不賓服，乃率西戎征殷之叛國以事紂。」按西伯昌伐獫狁為一大事，詩經屨載其事。采薇篇云：「靡室靡家，玁狁之故；不遘啓居，玁狁之

故。」又云「豈不日戎，獫狁孔棘。」詩六月又載：「獫狁孔棘，我是用急，王予出征，以匡王國。」

成王四年，周公伐東夷定之。史記周本紀載：「周公爲師，東伐淮夷，殘奄，遷其君薄姑。」後漢書東夷傳：「管蔡畔周，乃招誘夷狄，周公征之，遂定東夷。」竹書紀年：「成王四年，王師伐淮夷，遂入奄。」

按成王嗣位，周公輔政，管蔡作亂，招誘徐夷等反叛中央，此時，周雖克殷，其政治勢力與威望尚未達到東方，東夷對周室認識不夠，加以受管蔡之「招誘」，願爲盲從。周公於定管蔡之後，對其平定。時魯伯亦帥師相助。史記魯世家云：「伯禽即位之後，有管蔡等反也，淮夷、徐戎亦並與反，於是伯禽率師伐之於盼。」

成王十三年，會齊侯、魯侯、伐戎。（竹書紀年）穆王十二年，伐犬戎，得白狼四、白鹿四以歸。

按竹書紀年十二年載：「北巡狩，遂征犬戎」；復於十七年載：「征犬戎取其五王以東」。注者疑此爲十二年之脫文。據後漢書西羌傳云：「至穆王時，戎狄不貢，王乃西征犬戎，獲其五王，又得四白鹿，四白狼，王遂遷戎于太原。」然周本紀云：「犬戎氏以其職來王。天子曰：『予必以不享征之，且觀之兵，無乃廢先王之訓，而王幾頓乎？吾聞犬戎樹敦，率舊德而守終純固，其有以禦我矣。』王遂征之，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自是荒服者不至。」據正義引賈逵云：「白狼、白鹿、之職責也」，犬戎既「以其職貢來王」何以又「以其不享征之」？至於「犬戎樹敦，率舊德而守終純固」，正所以立性敦篤，循規蹈矩，保持邊境安寧，豈非樂事！穆王竟以「禦我」而征之，「自是荒服不至」以及爾後邊地失寧，穆王難辭其咎。

穆王十二年，徐戎侵洛，十四年，帥楚伐徐戎克之。

此竹書紀年文，然不見於周本紀。據史記秦本紀載云：「周穆王西巡狩，樂而忘歸，徐偃王作亂，造父爲穆王御，長驅歸周，一日千里以救亂。」史記趙世家同。後漢書東夷傳載其經過云：「徐夷偃號，乃率九夷以伐宗周，西至河上，穆王畏其方熾，乃分東方諸侯，命徐偃王主之，偃王處潢池東，地方五百里，行仁義，陸地而朝者三十有六國。穆王得驢騾之乘，乃使造父御以告楚，令伐徐，一日而至，於是楚文王大舉兵而滅之。偃王仁而無權，不忍聞其入，故致於敗，乃北至彭城武原縣東山下，百姓隨之者以萬數，因名其山爲徐山。」

觀前述穆王二伐夷、戎，一以「犬戎樹敦」；一以「徐夷行仁」，而穆王伐之，豈其「義」乎。所幸「徐偃仁而無權，不忍聞其入」，不讓古公專美於前，亦棄地而去，百姓隨之者以萬數，正孟子所云「天下歸仁」矣。

懿王二十一年，虢公帥師北伐犬戎敗遁。（竹書）孝王元年，命申侯伐西戎。（竹書）夷王七年，夷王衰弱，荒服不朝，乃命虢公帥六師伐太原之戎至

於欽泉，獲馬千匹（竹書紀年及後漢書西羌傳）。厲王十一年，伐戎不克。後漢書西羌：「厲王無道，戎狄寇掠，乃入犬丘，殺秦仲之族，王命伐戎，不克。」厲王十四年，召穆公帥師追荊蠻至于洛。（竹書）

宣王三年，命大夫秦仲伐西戎，戎俘秦仲旋殺之。（此竹書文、後漢書西羌傳謂宣王四年，秦仲伐西戎，爲西戎所殺，竹書謂西戎殺秦仲在宣王六年。按十二諸侯年表，宣王七年乃秦莊公元年，再徵之秦本紀，秦仲立二十三年死於戎，其長子莊公立。故竹書所記爲是，後漢書乃概括記之也。）

宣王五年，尹吉甫伐獫狁至於太原。（此竹書文，詩六日「獫狁孔棘，至於太原，文武吉甫，萬邦爲憲。」）八月方叔伐荆蠻。（竹書，後漢書南蠻傳）

宣王六年，召穆公帥師伐淮夷。王帥師徐戎，皇父休父從王伐徐戎次于淮（竹書）

宣王七年，召秦莊公弟五人，與兵七千使伐西戎，破之。（史記秦本紀）

宣王卅三年，王帥伐太原之戎不克。（此竹書文，按後漢書西羌傳，王遣兵伐太原戎不克，乃在使秦仲伐戎（宣王四年）後之廿七年，事當在三十一年。）

宣王卅八年，王帥及晉穆侯伐條戎、奔戎，王帥敗遁。此竹書文，後漢書西羌傳謂伐太原之戎後五年，應爲卅六年。史記晉世家：「穆侯七年伐條，十年伐千畝有功。」

宣王卅九年，王帥伐姜戎，戰于千畝，王帥敗遁。此竹書文。國語周語：「（周宣王）卅九年，戰于千畝，王帥敗績於姜氏之戎。」史記周本紀：「卅九年，戰于千畝，王帥敗績于姜氏之戎。」史記趙世家：「奄父曰公仲，周宣王伐戎爲御，及千畝戰，奄父脫宣王。」

宣王四十年，晉人敗北戎汾隰。（後漢書西羌傳及竹書紀年文）

宣王四十一年，王帥敗于申。此竹書文，後漢書西羌傳謂征申戎破之。

幽王四年，秦人伐西戎。（竹書）

幽王六年，王命伯士率師伐六濟之戎，王帥敗遁，伯士死焉。（後漢書西羌傳及竹書文）

二、入侵

商紂王卅四年，昆夷侵周。（竹書文）

周武王十一年，萊夷伐齊。史記齊太公世家：「武王已平商而王天下，封師尚父於齊營邱，東就國……黎明至國，萊侯來伐，與之爭營邱，營邱邊萊，萊人、夷也。會紂之亂，而周未定，未能集方遠，是以與太公爭國。」

成王二年，奄人、徐人及淮夷入于郕以叛。此竹書文，史記齊太公世家：

「管蔡作亂，淮夷畔周。」

穆王十三年，徐戎侵洛。（竹書）穆王十四年，翟人侵畢。（竹書）懿王七年，西戎侵鎬。（竹書）懿王十三年，翟人侵岐。（竹書）厲王三年，淮夷侵洛。（竹書）厲王十一年，西戎入于大丘。（史記秦本紀、竹書、後漢書西羌傳）宣王六年，西戎殺秦仲。（同右注）宣王十四年，戎人滅羌邑。（竹書、後漢書西羌傳）幽王六年，西戎滅蓋。（竹書）同年，西戎圍大丘，虜秦襄兄伯父，歲餘釋歸。（史記秦本紀、後漢書西羌傳文）幽王十一年，申人、鄩人、犬戎入宗周，殺王及鄭桓公，殺王子伯服，執褒姒以歸，西周遂亡。（史記、後漢書西羌傳、竹書紀年）

三、來賓

周武王十五年，肅慎氏來賓。（竹書）後漢書東夷傳：「武王滅紂，肅慎來獻石磐楛矢。」史記孔子世家：「吳敗越王勾踐會稽，有雋集于陳廷而死，楛矢貫之，石磐矢長尺有咫。陳潛公使使問仲尼，尼曰：『雋來遠矣。此肅慎之矢也。昔武王克商，通道九夷，百蠻，使各以其方賄來貢，使無忘職業，於是肅慎貢楛矢，石磐長尺有咫，先王欲昭其令德，以肅慎矢分大姬。……』」

武王克商之後，威德廣被，九州之外，蠻夷戎狄，莫不梯山航海而至。書旅獒：「惟克商遂，遂通道于九夷八蠻，西旅底貢厥獒，太保乃作族，獎用訓于王。曰：『嗚呼，明王慎德，四夷咸賓，無有遠邇，畢獻方物。』」

成王九年，肅慎氏來朝。（竹書）成王廿五年，四夷來賓。（竹書）成王三十年，離戎來賓。（竹書）康王之時，肅慎復至。（後漢書東夷傳）穆王十三年，西戎來賓。（竹書）穆王十五年，留昂氏來賓。（竹書）穆王十七年，西王母來朝。（竹書）孝王五年，西戎來獻馬。（竹書）夷王二年，蜀玉、呂人來獻瓊玉。（竹書）

四、聯合作戰

後漢書西羌傳：「及文王受命西伯，西有昂夷之患，北有獫狁之難，遂攘戎狄而戍之，莫不賓服，乃率西戎征殷之叛國以事紂。」

周武王伐商紂王時，率蜀、庸、羌、豳、微、緄、彭、濮人從周師伐殷。（書牧誓、竹書紀年）

綜觀西周時期與戎狄之關係，計「往征」者二十八次，「入侵」者十三次，「來賓」者十次，「聯合作戰」者二次。由此小計來看，大抵內政修、邊民即來歸，內政不明，即乘機內侵，則中央勢必討伐。故「來賓、入侵、征討」三者互為因果。如周武王克殷後，「偃干戈，振兵釋旅，示天下不復用兵」，（史記周本紀）。並「通道于九夷、百蠻，使各以其方賄來貢，使無忘職業，

於是肅慎氏貢楛矢石磐」（國語魯語）。成康嗣位，內政修明，刑錯四十餘年不用，故四夷來賓。反之，穆王好巡遊，樂而忘返，故徐夷叛；厲王暴虐，故西戎入侵；幽王無道，故犬戎來攻。由是觀之，故善治邊者乃自內政始，不輕易動干戈。當穆王將征犬戎時，祭公謀父諫曰：「不可，先王耀德不觀兵，夫兵戢而時動，動則威，觀兵則玩，玩則無震。……是故先王非務武也，動恤民隱，而除其害也。」按周初對邊民與中央之關係亦仿前代「夷蠻要服，戎蠻（狄）荒服」，並規定「要服者貢，荒服者王」，如有「不貢則修貢」「不王則修德」，再不然，乃「讓不貢，告不王」，於是始「有威讓之命，有文告之辭」。

如果經「布令陳辭而有不至者」，「則增修於德，無動民於遠」，「是以近無不聽，遠無不服」。再者，周初明瞭「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者異俗」，固而對邊疆地區，只是「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禮記王制云：「五方之民，言語不通，嗜欲不同，遠其志，通其欲，東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譯。」此種邊疆政策，均為適應其特殊習俗而定。元陳澧注禮記引方氏云：「以言語之不通也，則必達其志，以嗜欲之不同也，則必通其欲。必欲達其志，通其欲，非寄象鞮譯則不可，故先王設官以掌之。寄，言能寓風俗之異於此。象，言能做象風俗之異於彼。鞮，則欲別其服飾之異，譯，則欲辨其言語之異。劉氏曰：此四者，皆主通遠人言語之官，寄者，寓也，以其言之難通，如寄託其意於事物而後能通之，象，像也，如以意做像其形似而通之，周官象胥是也。狄，猶迷也，鞮，戎狄履名，猶屨也，遠履其事，而知其言意之所在而通之。周官鞮譯氏，亦以通其聲歌，而以舞者所履為名。譯，釋也，猶言謄也，謂以彼此言語，相謄釋而通之也。越裳氏重九譯而朝是也。」

由見先賢治邊理想之美，策略之寬。然自成康以後，多未能謹守「遺訓」，征戰不已，誠足惜哉！

丁、東周時期諸夏與邊疆民族之關係

周平王以西都逼戎，鎬京殘破，乃東遷洛邑。以秦襄公逐戎有功，封為諸侯，並賜岐以西之地。自是東周王畿縮小，天子微弱，王室威嚴喪失，諸侯聲勢陵駕天子，政治重心由中央（天子）轉移至地方（諸侯）。因之整個東周時期，非中央與邊民之關係，乃地方（諸侯）與戎狄關係。茲分別言於次。

一、戎狄侵諸夏

宋武公之世，鄭驪（狄）伐宋。史記魯周公世家：「初宋武公之世，鄭驪伐宋，司徒皇父帥師禦之，以敗翟之長丘，獲長翟綠斯。」史記集解：「服虔曰：武公，周平王時，在春秋前二十五年，鄭驪，長翟國名。」

隱公七年經：「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凡伯，周公子封于凡伯，今之河南輝縣。戎何以伐之？據左傳：「初戎朝于周，發幣于公卿，凡伯費賚，冬王使凡伯來聘，還，戎伐之于楚丘以歸。」隱公九年傳：「北戎侵鄭，鄭伯禦之救齊。六月，大敗戎師，獲其二帥大良，少良，甲首三百，以獻於齊。」史記鄭世家：「北戎伐齊，齊使求救，鄭遣太子忽將兵救齊。」史記齊太公世家：「北戎伐齊，鄭使太子忽來救齊。」莊二十四年經：「多，戎侵曹。」莊三十年，山戎伐燕，史記齊太公世家：「齊桓公三十三年，山戎伐燕，燕告急於齊，齊桓公救燕，遂伐山戎。」史記燕召公世家：「山戎來侵我，齊桓公救燕，遂北伐山戎而還。」莊卅二年經：「狄伐邢。」注曰：「狄，北狄也。」閔元年傳：「狄人伐邢……齊人救之。」

閔二年經：「狄人衛。」左傳：「狄人伐衛……戰于焚澤，衛師敗績，遂滅衛。」史記衛康叔世家：「懿公即位，好鶴，淫樂侈奢，九年，翟伐衛，衛懿公欲交兵，兵或畔，大臣言曰：君好鶴，鶴可令擊翟。翟於是遂入殺懿公。」齊桓公以衛數亂，乃率諸侯伐翟，為衛築楚邱。」

僖公八年經：「狄伐晉。」左傳：「晉里克帥師，梁由靡御，虢射為右，以敗狄于采桑。」夏、狄伐晉，報采桑之役也。」

僖十年經：「狄滅溫，溫子奔衛。」左傳云：「十年春，狄滅溫，蘇子無信也，蘇子叛王即狄，又不能於狄，狄人伐之，王不救，故滅，蘇子奔衛。」

僖十一年傳：「夏、揚拒、泉臯、伊雒之戎，同伐京師入王城，楚東門，王子帶召之也。秦晉伐戎以救周，秋，晉侯平戎于王。」史記齊太公世家：「齊桓公三十八年，周襄王弟帶，與戎翟合謀伐周，齊使管仲平戎于周。」

僖十三經：「春，狄侵衛。」僖十四年經：「狄侵鄭。」僖十六傳：「秋，狄侵晉，取狐厨、受鐸，涉汾及昆都，因晉敗也。」僖公十八年經：「邢人、狄人伐衛。」僖廿一年經：「狄侵衛。」杜注：為邢故。僖廿四年經：「狄伐鄭。」

左傳：「狄伐鄭，取櫟，王德狄人，將以其女為后。」僖卅年經：「夏、狄侵齊。」左傳：「卅年春，晉人侵鄭，以觀其可攻與否。狄聞晉之有鄭虞也，夏，狄侵齊。」僖三十一年傳：「多，狄圍衛。」僖卅三年經：「狄侵齊。」

左傳：「狄侵齊，因晉喪也。」僖卅三年傳：「狄伐晉于箕。」文公四年經：「狄侵齊。」文公七年經：「狄侵我（魯）西鄙。」左傳：「狄侵我西鄙，公使告于晉。」文公九年經：「夏、狄侵齊。」文公十年經：「狄侵宋。」

高氏聞曰：「狄侵諸大國，獨宋未爾，自宋亂之後，狄既侵之，楚次厥貉又將來伐，則國幾亡矣。」按李宗侗「春秋左傳今注今譯」一書未將「狄侵宋」列入，而另曰：「多，狄侵齊。」未悉所本。文公十一年經：「狄侵齊。」又載：「多十月甲午叔孫得臣敗狄于鹹。」左傳：「鄭瞞侵齊，遂伐我，公卜，使叔孫得臣追之。」文公十三年經：「狄侵衛。」文公十六年傳：「楚大

飢，戎伐其西南，至于阜山，師于大林，又伐其東南，至于陽丘，以侵魯枝，庸人率羣蠻以叛楚。陳人率百濮聚於選將伐楚。」宣公二年，鄭瞞伐齊，齊王子城父獲其弟榮如。（史記魯周公世家文）宣公三年經：「秋，赤狄侵齊。」宣公四年經：「赤狄侵齊。」宣公六年傳：「秋，赤狄伐晉，圍懷及邢丘。」宣公七年傳：「赤狄侵晉，取向陰之禾。」宣公十三年傳：「秋，赤狄伐晉及清，先穀召之也。」成公六年傳：「伊維之戎、陸渾之戎，蠻氏侵宋。以其辭會也。」成公十二年傳：「狄人問宋之盟以侵晉。」定公三年傳：「鮮虞敗晉師于平中，獲晉觀虎，恃其勇也。」哀公元年傳：「鮮虞人伐晉，取棘蒲。」

二、諸夏征戎狄

周平王元年，秦襄公逐戎救周。史記秦本紀：「西戎犬戎與申侯伐周，殺幽王酈山下，而秦襄公將兵救周。」後漢書西羌傳同。

周平王二年，邢侯大破北戎。後漢書西羌傳文。

周平王二十一年，秦文公伐戎。史記秦本紀：「十六年，文公以兵伐戎，戎敗走。」竹書紀年：「周平王十八年，秦文公大敗戎師于岐，來歸岐東之田。」

周平王時，宋武公伐長翟鄆。敗翟于長丘，獲得翟綠斯。史記魯周公世家：「初：宋武公之世，鄆瞞伐宋，司徒皇父率師禦之，以敗翟于長丘，獲長翟綠斯。」集解引服虔曰：「宋武公，周平王時，春秋前二十五年。」史記宋微子世家：「昭公四年，宋敗長翟綠斯於長丘。」索隱：「魯世家云武公，此云昭公，蓋此昭當為武，然前代雖有武公，此杵臼當諡武也，若將不然，豈下五代公子特為君，又豈諡昭乎？」

周平王末年：「周既陵遲，戎逼諸夏，自隴山以東，及乎伊洛，往往有戎，於是渭首有狄獠邽冀之戎，涇北有義渠之戎，洛川有大荔之戎，渭南有驪戎，伊洛間有揚拒泉臯之戎，潁首以西有蠻氏之戎。」（後漢書西羌傳文）實則此時，非僅戎狄逼境，諸夏亦橫逆，孔子因魯史修春秋，以寓王法，乃託始於此。自是戎狄與諸夏關係多見之於春秋經傳。

桓十三年傳：楚伐盧戎。或作羅。注曰：盧戎，南蠻。秦武公十年（魯莊六年），伐邽冀戎，初縣之。（史記秦本紀文）莊十八年經：「夏，魯追戎於濟西。」左傳：「夏、公追戎於濟西，不言其來，諱之也。」莊二十年經：「多，齊人伐戎。」莊廿六年經：「春，公（魯）伐戎。」莊廿六年經：「夏，公（魯）公至自伐戎。」莊廿六年經：「秋，公（魯）會宋人、齊人伐徐。」莊廿八年傳：「晉伐驪戎，驪戎男，女以驪姬，歸生奚齊。」史記晉世家：「晉獻公五年伐驪戎，得驪姬。」莊三十年經：「齊人伐山戎，殺梁慶之曰：『內無

因國，外無從諸侯，而越千里之險，北伐山戎，危之也。」莊卅一年經：「齊侯來獻戎捷。」公羊以為「威嚇魯國」。閔公二年傳：「春，號公敗犬戎於涓。」僖十年經：「夏，齊侯許男伐北戎。」僖十一年傳：「秦，晉伐戎以救周。」僖卅三年經：「衛人侵狄。」左傳：「夏，狄有亂，衛人侵狄。」僖卅三年經：「晉人敗狄于箕。」魯文公四年，秦穆公三十七年，秦伐戎王，益國十二，闕地千里，遂霸西戎。（史記秦本紀文）文五年經：「秋，楚人滅六。」左傳：「六人叛楚即東夷，秋楚成大心，仲歸帥師滅六。」

文十一年經：「冬，十月甲午叔得孫得臣敗狄于鹹。」史記魯周公世家：

「文公十一年，魯敗翟于鹹，獲長翟僑如。」又云：「衛獲其弟簡如。」集解：「服虔曰：獲與僑如同時。」又文十一年左傳云：「鄭厲侵齊，遂伐我，公卜，使叔孫得臣追之，吉，侯叔夏御莊叔。縣房甥爲右。富父終甥驅乘，多十月，甲午，敗狄於鹹，獲長翟僑如。富父終甥擗其喉，以戎殺之，埋其首於子駒之門，以命宣伯。初宋武公之世，鄭厲伐宋，司徒皇父帥師禦之，彫祁御皇父充石，公子穀甥爲右，司寇牛父驅乘，以敗狄于長丘，燭長狄綠斯，皇父之二子死焉。宋公於是以前賞彫祁，使食其征。謂之彫門。晉之滅潞也，獲僑如之弟焚如。齊襄公之二年，鄭厲伐齊，齊王子成父，獲其弟榮如，埋其首於周首之北門。衛人獲其季弟簡如。鄭厲由是遂亡。」按左傳乃綜合言鄭厲被滅之經過，文中所云兄弟，並非「同胞兄弟」。誠如趙鐵寒氏云：「所謂晉獲僑如之弟焚如，齊獲如之弟榮如，蓋謂其兄弟三支也。否則齊獲榮如於桓公十年，前距魯獲僑如者八十年，晉獲焚如於宣公十五年，後距魯獲僑如者二十二年，兄弟之壽，斷無綿延百又二年之理也。」（見春秋時期戎狄的地理分布及其源流）又公羊傳曰：「兄弟三人，一者之齊，一者之魯，一者之晉，其之齊者，王子成父殺之，其之魯者，叔孫得臣殺之，則未知其之晉者也。」唐徐彥疏云：「言相類如兄弟。」穀梁傳云：「兄弟三人，佚宕中國。」由見均不得以兄弟解之。

文十七年傳：「秋，周甘駁（周大夫）敗戎于邲垂，乘其飲酒也。」

魯宣公二年，齊王子堆父敗長狄鄆，獲其弟榮如，埋首於北門。（史記魯周公世家文，集解：「昭案年表齊惠公二年，魯宣公二年也。」）

楚伐陸渾之戎。宣三年經：「楚子伐陸渾之戎。」史記楚世家：「（莊王）八年，伐陸渾戎，遂至洛，觀兵於周郊。」

魯取根弁。宣九年經：「秋，取根弁。」杜注：「根弁，東夷國也。」

晉滅赤狄潞氏。宣十五年經：「六月，癸卯，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

晉滅赤狄甲氏及留吁。宣十六年經：「春王正月，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左傳：「十六年，晉士會帥師滅赤狄甲氏及留吁鄆辰。」史記晉世家：「（景公）七年晉使隨會滅赤狄。」

周伐茅戎。成元年傳：「元年春，晉侯使瑕嘉平戎于王，單襄公如晉拜成。」

劉康公徵戎將逐伐之，叔服曰：「背盟而欺大國，此必敗。背盟不祥，欺大國不義，神人弗助，將何以勝？」不聽，遂伐茅戎。三月癸未，敗績于徐吾氏。」

晉伐赤狄廆咎如。成三年經：「晉郤克衛孫良夫伐廆咎如。」左傳：「晉郤克衛孫良夫伐廆咎如，討赤狄之餘焉。廆咎如潰，上失民也。」

晉敗狄于交剛。成十二年經：「秋，晉人敗狄于交剛。」左傳：「狄人問宋之盟以侵晉，而不設備，秋，晉人敗狄于交剛。」

齊伐萊。襄二年傳：「齊侯伐萊，萊人使正與子賈賈以索馬牛皆百匹，齊師乃還，君子是以知齊靈公之爲靈也。」

齊滅萊。襄公六年經：「十月二月齊侯滅萊。」左傳記其經過云：「十一月，齊侯滅萊，萊待謀也，於鄭子國之來聘也，四月，晏弱城東陽而遂圍萊，甲寅之環城傳於萊。及杞桓公卒之月，乙未，王湫帥師及正與子棠人軍齊師，齊師大敗之，丁未，入萊，萊共公浮柔奔棠，正與子王湫奔莒，莒人殺之。四月，陳無宇獻萊宗器于襄宮，晏彌園棠，十一月丙辰而滅之，遷萊于郕，高厚崔杼定其田。」

晉敗羣狄于大鹵。昭元年經：「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大鹵。」左傳：「晉中行穆子敗無終及羣狄於大鹵，崇卒也。將戰，魏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厄，與什共車必克，困諸阨又克，請皆卒。』自始戰。久毀車以爲行，五乘爲三伍。」荀吳之嬖人不肯卒，斬以徇。爲五陳以相離歸。」

晉伐鮮虞。哀六年經：「晉趙鞅帥師伐鮮虞。」左傳：「晉伐鮮虞，治范世之亂也。」

楚伐東夷。哀十九年傳：「秋，楚沈諸梁伐東夷，三夷男女及楚師盟于敦。」

綜觀前述戎狄侵諸夏卅八次，而諸夏征戎四十八次，顯然諸夏佔優勢。其間戎狄勢力雖嘗危及諸夏，且滅衛滅邢滅溫，然終爲諸夏所制。首先晉襄公斬白狄君，魯文公斬獲長狄君僑如，晉獲焚如，衛獲簡如，長狄遂亡；而晉又滅赤狄潞氏、甲氏、留吁、鐸辰等部落，使北方長狄、赤狄先後衰亡。此時狄族僅餘白狄之鮮虞（河北正定縣一帶）、肥（山西晉陽一帶）、鼓（河北晉縣一帶）三大部落。至魯昭元年，晉又滅肥，昭十七年再滅鼓，自是狄族僅餘鮮虞，其後則有中山。

未幾，諸夏內訌，韓、趙、魏三家分晉，田氏亦篡齊，至周威烈王進入戰國局面。而此時東方諸夷戎，先後爲齊魯等國所征服，已漸散爲民戶（後漢書東夷傳）。南蠻則爲楚國征服（後漢書南蠻傳）。惟趙之北尚有林胡（史記集解引如淳曰：「林胡即僂林，爲李牧所滅。」）樓煩之戎，中有中山（白狄鮮虞之餘種）腹心之禍；燕北有東胡山戎；秦自隴西縣落、緄戎（顏師古爲混夷，韋昭謂即春秋大戎）。翟獯之戎，岐梁山涇漆之北有義渠、大荔、烏氏、朐衍之戎（史記匈奴傳）。

（待續）

奇蹟似的成吉思汗

Harold Lamb 原著
史耀古 譯

七百年以前，有一個人幾乎征服了整個大地。他身為半個世界的主人，爲人類佈下了恐懼的種子，一代一代持續着。

他的一生爲他掙來了許多封號——「千手屠」(the Mighty Manslayer)，「上帝之鞭」(the Scourge of God)「十全勇士」(the Perfect Warrior)和「萬王之王」(the Master of Thrones and Crowns) 而他最爲人知的尊號還是成吉思汗。

不像歷來其他虛有其名的統治者，他完全名符其實。在歐洲文明傳統下長大的美國人，他們所熟知的大人物的名單不過始於馬其頓的亞歷山大 (Alexander of Macedon)，繼後有羅馬衆皇帝，止於拿破崙 (Napoleon)。而成吉思汗却要比這些歐洲舞臺上的風雲人物來得更威武了。

的確，我們是無法以常情來衡量他的。他和他的遊牧人馬長征的時候，越過一道又一道經緯線，根本無法以道里計。無數的城市在他的腳下踐踏着，大軍所至，河水爲之斷流，大沙漠裏傷殘枕藉，總之，他足跡踏過之處，一度人煙繁華的土地只怕唯有狼與禿鷹是僅存的生物了。

當時帶來了生命財物的毀滅是現代人無法想像的——儘管我們可藉二次世界大戰的損害得到一些概念。成吉思汗這位遊牧民族的領袖，崛起於戈壁大沙漠，向文明的世界發動戰爭，卒得勝利。

要了解此中真相，我們必須回顧西元十三世紀。發現穆罕默德的信徒要人相信這樣的大變動只有超自然的力量才足以造成，世界末日極可能已經來到。史家們疾呼：「回教徒以前從未遭遇這種情勢，在拿撒勒人 (Nazarenes) 和蒙古人的蹂躪下，慘遭瓜分。」

於是，驚懼之情充塞了基督教的世界，成吉思汗逝世後，他的繼承人帶領着可怕的蒙古騎兵隊，踏遍了西歐，波蘭大公 (Boleslas of Poland) 和匈牙利王 (Bela of Hungary) 自戰場上逃脫，日耳曼之塞里舍公爵 (Duke of Silesia) 在萊哥尼茲 (Liegnitz) 一役和他的條頓武士 (Teutonic Knights) 皆死於蒙古人的弓箭之下——難逃與俄國喬治大公 (Grand-Duke George of Russia) 相同的命運。這時候美麗高貴的加士底爾女王 (fair Queen Blanch of Castile) 也對聖路易 (Saint Louis) 哭訴：「我的兒啊，你到那裏去？」

有一副冷靜頭腦的德皇腓特烈二世 (Frederick II of Germany，亦稱腓特烈大帝。) 曾寫信給英國的亨利三世 (Henry III of England) 說，難軛

(Tatars) 之禍不啻是上帝的懲罰，上帝假他們之手懲罰基督教世界的罪惡。而蒙古人自身也正是當年以色列失蹤的十部落之後，他們會供奉金牛崇拜偶像，而被驅逐於亞洲的荒原上。

培根 (Worthy Roger Bacon) 也以爲蒙古人是反基督的兵衆，駭人的來收割最後的莊稼。

一般誤托是聖哲洛姆 (Saint Jerome) 的奇異的預言更加强了這種感覺。此一預言說明在反基督的日子裏，將有一個突厥的民族興起，來自亞洲大山之後的哥格 (Gog) 和瑪哥格 (Magog)，這個不受洗禮，褻瀆神明的種族，不用酒，不用鹽，也不用麥根，將爲世界帶來空前的浩劫。

所以，教皇召集勞恩斯 (Lyons) 大會，多半是爲了設計方案以阻遏蒙古人的攻勢，並派遣魁梧而學業望的約翰 (John of Plano Carpini)，他是主持少年修道會的神父——爲羅馬教廷的特派代表，前往蒙古大軍駐處。「因爲我們耽心他們恐怕就是教會最逼近的，即將來臨的敵人。」

於是無數教堂中呈獻了千萬的祈禱，祈求能逃出蒙古人憤怒的火燄。如果成吉思汗的一生就是像這樣蹂躪世界、阻礙人類的進步的話，他也不過只是阿提拉 (Attila) 或阿拉瑞克 (Alaric) 再生罷了。——一個可畏而漫無目的的流浪者，然而，這位上帝之鞭却也是十全勇士，萬王之王。

且讓我們仔細瞻瞻環繞在成吉思汗身上的奇蹟。他不過是一個遊牧者，獵戶，羣獸的牧者，然而却統領三個大帝國。他也不過是個野蠻人，從未見過大場面，根本不知文字的用途，却爲五十個民族立下了法律和典則。

就軍事天才而言，拿破崙當是歐洲人中最傑出了。但是我們却忘不了他曾放棄一支大軍，任它在埃及自生自滅，也曾留下另一支大軍在俄國的冰天雪地裏殘存；最後見他昂然地慘遭滑鐵盧潰敗 (débaüle of Waterloo，譯者按 débâcle 一字係法文，意爲傾覆、敗北。) 他親耳聽到帝國崩塌的聲音，他的律令被撕碎，他的兒子不能繼承他的皇位。這一切出色的遭遇浮沉恍若帶着舞臺和戲劇的味道，拿破崙自身只像是個演員罷了。

再看馬其頓的亞歷山大，這個莽撞而百勝的小伙子，我們發現到他具有相當於成吉思汗似的征討天才，人稱爲如神的亞歷山大 (Alexander the God-like)。他率着方陣大軍 (Phalanx) 朝太陽升起處進發，背負着希臘古文明的託付和祝福。他和成吉思汗一樣皆死於勝利的漲潮高峰時。他們的名字今日依然留存於亞洲的傳奇故事中。

他們生前皆榮，唯死後有別。他們死後的成就幾乎無法相比。亞歷山大帳下的將軍們很快便爲了爭奪帝國而互相傾軋，大動干戈，他的兒子只得被迫逃亡。

成吉思汗則不然，他完全完全征服了起自阿美尼亞 (Armenia) 以至朝鮮，從西藏到窩瓦河這一片廣大的疆域，他的兒子毫無阻礙地承繼了他的帝國到他的孫子忽必烈汗的時候，仍然統治着半個世界。

這個由野蠻人不用符咒成就出來的大帝國著實迷惑了許多歷史學家。最近有一批學識功深的英國學者編纂的成吉思汗時代的歷史，他們承認這個帝國的造成是一樁不可思議的事實。一位知名的學者擲筆而嘆的說：「成吉思汗命定式的性格，根本是比莎士比亞的天才更難令人解釋的。」

我們無法看清讀在其中的成吉思汗真正的性格，許多外在的原因，裹上了一層紗布，一則是蒙古人不會書寫，或者就是無心刻意記載。結果他當時的年齡僅散存於烏格爾 (Ugurs) (譯者按：係今外蒙首府烏蘭巴托爾，原名庫倫。)、中國、波斯和阿美尼亞。一直到最近，蒙古史家塞楞格、塞特任 (Mongol Ssanang Setzen) 時，這段英勇的故事才被完整地翻譯出來。

所以最有睿智的蒙古年表史家們總是他的敵人。——因爲他們不會忘了去詳審他。這些人不外是異族。尤有甚者，像十三世紀的歐洲人一樣，他們對於自己國土以外的世界的概念是非常模糊的。

他們冷眼看着蒙古人，從暗處中不打訛號地便出現了，深深感覺到蒙古騎兵駭人的衝擊，眼睜睜地看着他們從身上踏過，又到另一個他們不知名的國度。一個穆罕默德的信徒悲憤地訴說他與蒙古人遭遇的經驗，可總括爲下面幾句話：「他們來了，破壞、屠殺——掠奪戰利品，然後離開。」

要將這些各種來源不同的史料加以閱讀和比較，一直是相當困難的事。因此很自然地，研究東方的學者整理出蒙古人南侵西征，主要在政治上的各種細節之後便感到滿足了。在他的眼中成吉思汗成爲野蠻力量的化身——一枝鋼鞭，不斷從沙漠裏出現，鞭笞並摧毀腐敗的文明。

蒙古史家——塞楞格、塞特任的英雄故事 (The Saga of Ssanang Setzen) 也無助於了解成吉思汗的神秘。它只不過很簡略地說及成吉思汗乃是一位神明中之神明 (bogdo of the race of gods (譯者按：bogdo 博哥杜係蒙古語，意爲聖賢者。)) 看來，成吉思汗不只是神秘 (Mystery) 而已，簡直是神奇不可思議的奇蹟了 (Miracle)。

中世紀的歐洲史家們大多以爲這是撒旦的魔力投附在蒙古人的身上，使之來到歐洲來肆虐。

這種見解真叫人發火——現代的史家們仍不得不再映響十三世紀的迷信。尤其當時的歐洲視成吉思汗的侵略大軍如同幽靈鬼魅一樣。

只有一個辦法可以看成吉思汗周身的所謂神秘。這個辦法便是把時鐘撥回七百年前的當時，並按當時大事年表所記載的老老實實看成吉思汗。不看奇蹟，不以爲是野蠻的化身，而是直接的來看其人其事本身。

我們將不從蒙古整個民族在政治上的成就著手，而來著眼於成吉思汗一人如何領導蒙古，由默默無人知曉的部落搖身巨變成爲世界的統治者。

要直接觀察此人，我們就得實際地走近他的身邊，我們要來難在他的臣民中，並實際觀察七百年前當時的世界形勢。絕不能以現代的文明來衡量他，反之要以他所居處的環境視之。那是一個荒涼不毛的世界，聚集了許多獵戶，騎着馬馴鹿，逐水草而居的遊牧民族。

在這裏，人以獸皮裹身，以鮮奶和獸肉果腹。他們全身塗油以防寒濕。更奇怪的是他們或者餓死凍死，或者便由別人幫他砍死。

「此地無城無市」第一個踏入這塊土地的歐洲人佛瑞、卡爾匹尼 (Era Carpinus) 說：「處處皆是不毛的沙漠。肥沃之處百不得其一，只除了極少數水草濕潤之處。」

「土地上幾乎是濯濯無一樹，雖然適於放牧畜牲，即使皇帝和公侯也和其他所有的人一樣，皆餓牛馬之糞以烹食或暖身。」

「此地天候也是暴寒暴熱，即使在仲夏，依然有可怕的風暴，雷電交加，常有人畜死於其下，甚至有大雪下降，寒風狂起，這時人們簡直無法騎於馬背上，必須伏於地上。飛沙走塵之中，難見一物。而且常有冰雹，大寒之後却又緊跟着無法忍受的高熱。」

這便是公元一一六二年的戈壁大沙漠，在一年十二個象物中，這年正好屬猪。

「神居天上，神之權力賜可汗行使大地，乃授人間帝璽。」

——成吉思汗玉璽

惠稿請逕寄臺北縣樹林鎮啓智街一四三號宋念慈收，以

期迅捷。稿件可做印刷品寄，不必密封。

蘇俄人的民族性

顧耕野

共產主義害酷了人

年華老大，海隅流離，十年春二月間，我曾寫過幾段華僑在蘇俄的情形，以後因為文字太壞，自己看來都不順眼，就未繼續了，可是引起深感興趣的仍不乏人，有熟朋友，也有素不相識的，紛紛來信，要我再寫些關於蘇俄人的事，作爲國土光復後，知己知彼保境立國的應付，可惜我不是「俄國通」，所知有限，今請就個人在哈爾濱時期，帝俄時期，與白黨連年公務上接觸的時期，及在北平兩次中俄會議充任小職員時期，民國廿六年抗戰派往西北接收軍火，廿七年春改組爲外賓招待處時期，三年後任甘肅新運處處長，並兼中蘇航空公司協理時期，所有與蘇俄人朝夕相處，身親目擊的事事物物，錄撰國人，凡所報導，指事直陳，初無高論，不過信而有徵，絕非道聽途說罷了。關於現在我要談的，大家想要知道的，當是蘇俄的民族性，大致有下列各點：陰毒、懶惰、多疑、粗笨、酗酒、盜竊、髒污、遲鈍、固執、拖延、以上種種，帝俄時代已然，蘇俄成立更甚。但是蘇俄民族性的長處也多：如堅韌、沉着、吃苦耐勞、忍人所不能忍、悟性極高、男女體格並健，惟以教育落後，從帝俄到赤俄，教育都未普及，以致人民知識水準低下，技管窺蠡測，作分別縷述，亟盼專家教正，以作將來政府外交上參考！

蘇俄人的懶惰

可以說世界知名，有些勞苦人羣，寧挨餓而不做工，男人更甚。一部份窮人，一到春天，早期的野生瓜果成熟，不論杏子、李子、甜瓜等等，他們就把飯鍋賣掉（俄人不煮飯，鍋以煮菜、燒水），而仰賴天不絕人，他們的懶法，是躺在菓樹下，腳抵樹身，肚子餓了，用腳一蹬，菓子紛紛墜落，伸手取得，到口即化，絕不起身採擷拾取。吃飽酣睡，就這樣一天混過，且到冬季天冷，再打主意，一般平民如此生活，白俄赤俄並無差別。還有一點可爲證明，蘇俄一般家庭用餐已畢，盤碗刀叉仍扔在飯桌上，誰都不管，任他杯盤狼籍，且先圍坐談笑，誰感困倦，誰就睡去，等到大家慢慢走光了，盤碗仍在，要到再度做飯的時候，才加洗刷，這是一般小戶人家的習慣，有傭人的貴室豪富又當別論。對日抗戰時期，我在西北招待外賓，（即蘇俄運送軍火入華的車隊，當時稱爲「羊毛車」），我最怕他們中途休息，一大隊汽車六七十輛，早晨六七點開出去，本可在九十點鐘中途小停，加油加水，頂多廿分鐘完事，可是他們走到一

個寬敞地方，隊長把手一舉，車子一輛跟一輛的停下，司機原當儘快把應做的事做完，再爲休息，他們却不那樣，車停後，一屁股坐下，向後一仰，躺了下去，有的沉沉入睡，有的彼此閒談，一坐就是兩三小時，我方抗戰需要軍械，急如星火，他們是牛步安閒，遲遲而行，歇了才一個個懶洋洋的爬起來，再坐下，抽幾口用報紙捲成又粗又辣的烟捲，然後上車開走，已是日將中天，而我們招待所預備的午飯，就必須等到三四點鐘，車隊到達，才能推出，那却是午飯已過，晚飯未辦的時候了。

愚而多疑

蘇俄人對任何人，都會把他當作間諜看待，嚴加監視調查，你身上是否帶有炸彈？假如手中拿有雞蛋，他必疑爲炸彈，或者認爲蛋已下毒。在蘇俄要人聚會用酒時，必須把酒拿到飯桌上，當衆開瓶，先行開好的絕不取飲。在史大林時代，就憑這些莫須有的疑猜，造成許多次大獄，因而被處死或監禁的人犯成千成萬，那些舉世震驚的蘇俄三次大審，毫無事實，完全是疑心作祟，請再講個小小笑話：某次蘇俄軍火車到達蘭州，照例休息三天，以便整理修補，我們招待處通知車隊，如有警報，可把車輛疏散到城外某處掩蔽，同時也告訴他們警報聲音的長短與懸掛紅球爲記等……某日我在街上閒行，忽然看見羊毛車羣向黃河北岸疏散地倉皇開去，我截着一問，他們說的逃警報，我叫他們停下，查明再開，結果，不過是一挑擔子賣雜貨的小販，搖出「播浪鼓」的聲音，他們疑心生鬼，當作警報，由隊長下令，傾巢出走，類此因疑懼而造成的輕舉妄動，時有所聞。

嗜酒如命

蘇俄人嗜酒如命，是因為地處寒帶，冬季總在零下三十度，富戶防寒設備，全世界不能比他們再好，房屋建設，第一重要是防寒設備，儘管食衣與住行面面顧到，總也抵不過大寒流的墮指裂膚！富家暖汽壁爐溫暖如春，一般勞動階級必須戶外作苦，雖有厚重皮棉，亦難擋入骨寒風，惟一恩物，就是「伏特卡」白酒，一杯下肚，實在生溫提神，又最簡便，他們嗜酒，却不必上酒館配菜肴，僅僅掏出一塊或五毛錢，向櫃臺上一放，店裏伙計們就會倒給一杯烈酒，他仰口吞下，抹嘴出門，雙方始終不交一語。至於聚會時間，如盛宴，如鷄尾酒會，如舞會，或過年過節，那就有許多精彩的表演了，始而彼此互敬，繼而

相讓相勸，終而大家上搶，誰能奪得一瓶半瓶，就將六親不認，瓶嘴人嘴，膠合爲二，像自來水般灌進肚皮，不論白蘭地、伏特卡，一瓶兩瓶是尋常事！看過「戰爭與和平」影片的，就可了解俄國人性過半，那大沙小姐的表哥參加酒會，站在高樓窗臺上，背朝室外，仰脖灌酒狂態，直叫觀者膽戰心驚！一般平民喝完烈酒，一跟頭栽倒地下，長眠不起者多的很。年節上俄人醉酒死亡之多，總可以與美國聖誕節日車禍併美。俄國人喜歡野餐，男女一羣，攜帶酒館，遠足郊外。郊遊該是娛樂身心的健康運動，俄人却多乘興而出，敗興而歸。尤其春季第一佳節，他們叫作「巴斯哈」，正是春暖花開，少長咸集，樹上草上，大家來個放浪形骸，不醉無歸。酒戰之後，歡盡悲來，有的濫醉如泥，有的半醒半睡，彼此扶持，勉強上路，中途倒地不起，或橫臥路上，呼呼入睡，整夜不醒，致被車馬行人踐踏而死也是常事。東北吉黑兩省與俄連壤，華人吸鴉片，俄人嗜酒，中國禁烟不禁酒，俄人醉酒不嗜烟，華人越界在俄境種烟，與俄人求酒如不及，需求兩應，正合經濟原則，可是都不能公開交易，只有相互走私，雖是國界分明，獨惜距離太近，相識友善，通氣推誠，一水不能隔絕芳鄰，舉步即已邁過，城市有政治上人爲的界線，鄉村却人情洋溢，所謂「卡倫」哨衛，只駐兵三三五五，「鄂博」界碑僅國際標誌，私人可以不見不聞，烟酒互換，彼此無吝無隱。水路則黑河、松花江、同江、烏蘇里江都是一草可航，隨處爲岸，俄人不種菜蔬，賴我供給，春季水化河開，我農民大獲蔬菜裏潛置高梁，滿載過江，俄方早把鴉片備妥，欣然交割，愉快而退，抗戰時期羊毛車隊，每一車都有二支備用的車輪外胎，當時在中國售價高到現洋二百元一支。中國司機要買一支他們絕不肯賣，可是司機若拿出一瓶白酒，便立刻可以成交過戶。二次大戰之後，中共赤俄間交易情形尚未有聞，以中共之亟求外匯，烟酒外銷必大，俄人飲量亢進，狂醉必更精采矣。

粗心笨拙

蘇俄人之粗心笨拙，也造成許多謬誤與笑柄。廿七年春，俄方送到飛機一批，都是拆散後用羊毛車運來（爲節省機油及保全機件性能），到了哈密，再將機翼及落地輪裝上，機關槍上的子彈，則散裝大木箱內，到了哈密，因我機場設備不良，就在附近幾棵大樹蔭下，鋪好蘆席，把大箱子彈倒出，用人工一顆一顆的套上彈夾，成爲一條帶子形狀，因爲保密，不准僱用工人，我也跟着車隊人員一起工作，工作簡單，誰都優爲。照常理講，軍火極關重要，應該包裹妥善，每箱子彈總有一噸重量，打開箱面，除蓋了一層牛皮紙外，子彈竟像垃圾一樣，亂七八糟，上下塞滿，向蘆席上一倒，發現裏邊竟有兩個牛肉罐頭，使我愕然不解，就算裝箱時忙中有錯，也不該逾乎情理至此，說他們惡作劇罷，這又有什麼意義。又一次迪化招待處職員王君牙病，至感痛楚，到省立醫院診治，那時她化只此一家，醫生都是俄人，經檢查結果，認爲右上第一大牙動搖，

非拔不可，經過一番勸說，王纔接受手術，這位蘇俄大醫師鄭重的消了毒，打了麻酔針，王君躺在床上，醫生拿起鍍銀夾子，伸到嘴裏，夾緊痛牙，用力一拔，王君一聲哀呼，取出血淋淋的不是第一顆病牙，而是第二個好牙。王君大憤，翻身含着壞牙跑了。再如蘇俄婦產科裏，常把初生嬰兒交錯，在俄人不足爲奇，在我們就認爲關係重大了。蘇俄國內醫院很少，大城市中也不過三兩家，所以經常客滿，婦產科更是迎接不暇，投婦產科的手續，是產婦到醫院掛號後，馬上檢查，認將臨盆，立刻送入待產室，無論何人，不准同入，產婦先作熱水浴，再扶上產床，由助產士守着，嬰兒出世，助產士提起兩條小繩，使頭朝下，在屁股上打一巴掌，待發出啼聲，這是各國通行的辦法，馬上送到另一房間，內設長案，寫有一二三四……號碼，嬰兒擱在案上某號，轉手就給母親以同號牌子，大約過了一點鐘，再憑牌子認領，可是往往弄錯，男嬰變成女嬰，黑髮變成黃髮，不斷引起爭執。我更有一件身經的荒謬事件，就是蘇俄駐哈密的第八團，駐進哈密是民國廿七年初，在我們南京撤守之後不久，駐紮地點在哈密城東約三十華里，扼着甘新公路要口，當時一切極端秘密，新疆當局正在高度親蘇，爲了避免人們發現，把甘新公路中已築成的哈密東門出至猩猩峽的一段，改由哈密城南門繞個五十里大圈子，再轉東到猩猩峽，這是該國當時對我中央政府極秘密的國際間陰謀計劃，所以一切設施，神鬼不曉，若或有意無意觸及禁地，必遭槍斃不貸。

紅八團的組織

紅八團組織極爲龐大，並不像國軍編制，正與中國抗戰時期八路匪軍一樣，是個漫無限制包羅萬象的東西，約等國軍一個集團軍組織，完全機械化，配有飛機、坦克車、大砲、騎兵、步兵、汽車隊，自哈密城東至廟溝五十華里周圍，全爲紅八團天下，絕對禁止閒人，其中飛機場、電臺、軍火庫、汽油庫、防空壕、地下交通網，再加數百間現代化營房，真是洋洋大觀，當時迪化只有極少數人知道其事，直到民國三十二年秋，德軍北竄，莫斯科危急，八國部份撤回作戰，禁區開放，大家才發現這片碩大無朋的聖地。當初規定特嚴，不要說選勝探幽，進去觀光，連口頭說說都是殺身取禍的。但儘管如此森嚴，因爲蘇俄人那種粗心氣浮，不免時常自己暴露自己的秘密。民國廿九年，西北公路局某次的羊毛車，從甘肅滿載出口物資，到哈密交貨後，受命回程載運汽油，公路局油庫在哈密城南十餘里，由蘇俄運輸代表保管，因我車隊急於回甘，特用電話通知代表處，我將派人領隊入庫裝油，旋有軍服輝煌的人前來領路，於是我站員率車八輛，十幾名工人隨行，兩個鐘點後，却空車回來，報告我說：「領路俄軍官把我們帶到油庫前，向兩邊有鐵絲網圍着的樹林裏，一聲大喊，國中衛兵就把鐵門拉開，我們長驅直入，走了約半里路，看見土屋幢幢，長無盡頭，中間一道木製的大門，很寬，能容兩車並行，再入，是很平整的廣場，停

着許多車輛，我們從中直走，走下坡路，足有兩丈寬，都是用厚木板鋪平的，再進，分爲幾條通道，接往地下室，每室堆滿汽油，我工人把油桶推出，外邊司機及助手，就趕緊裝車，裝滿四車，忽然另來一個軍官，態度兇橫，問我們何來，誰人領入？經予指示，他立即將領車人叫到身邊，暴燥如雷，大罵「你這個混蛋，怎可領外人深入，真該槍斃」，領車人往外跑，罵人的軍官叫把汽油卸下，車輛開出，所以大家空手回站。」像這樣軍事秘密地方，粗心的蘇俄人竟會把大批外人領了進去，真是粗疏，毫無腦筋。羊毛車隊的俄司機多是無知的粗人，毫無常識，因爲蘇俄不重視輕工業，沒有鐘錶，司機們一到中國，個個買錶，（我政府給他們的津貼很多），他們不會上法條，錶店人教過他們，他們却像孩提一樣，得錶愛不忍釋，用那隻大手像發動汽車渦輪般轉動幾下，把錶內細微機件擰壞，聽聽無聲，搖搖不走，再放在地面，用老皮靴踩踩，還是不走，就都不看跑開了。類此事件多的很。可是在另一面，蘇俄太空競爭，却將進入月球，所以他們是畸形突出性的民族。

教育低落偷竊成風

蘇俄教育低落，也是公認的，蘇俄爲實行愚民政策，不願使國民受到高深教育，以致民衆知識水準低落，一般人都很粗野，赤貧者食不飽，衣不暖，住的房屋還夠不上大雜「院」，只可說是四海一家的大雜「戶」，一間屋子住上好幾家人，中間能掛上一條舊毯子作爲間隔，算是最奢侈的了，中國人說窮到討飯爲止，蘇俄偏又不許人民討飯（中共亦然），飢寒起盜心，由古已然，所以蘇俄十月革命成功以後，盜風大熾，二次大戰結束以前，無論何人進入蘇俄，莫不被竊，蘇俄的「竊道」已成國民公開的行爲，其肇因有二：一、是窮人太多，竊案已成家常便飯，所謂「法不責衆」；二、是蘇俄政府獎勵偷竊，蘇俄是特務警察國家，盜竊非但取得財物，而且常常發掘政治上秘密文件，因此不但無罪，反而有功，偷得財物歸個人，偷得重要文件呈報政府，往往能得重賞，獎勵他們向各國外交官、軍政人員進攻，於是相習成風，愈演愈烈，火車上、輪船上、旅館內成了盜竊舞臺，凡是到過蘇俄的外賓，很少不受損失。例如民國十七年日本駐俄大使赴任，在西伯利亞火車上失掉箱子，小偷拿回一看，全是童裝鞋襪，又將送回，這完全表現是「政治性」的偷。（英、美、加拿大各國在莫斯科大使館的被盜竊，總是層出不窮的。）非但在國內大偷特偷，並且偷到世界各處。第二次大戰期間，蘇俄駐外外交官員，投奔自由，見於報章雜誌，轟動國際，如他們的駐荷蘭情報首領華德克「英基」，如戈程科，如派駐西班牙特工首領亞歷山大奧格夫，都把偷得重要秘密文件，作爲投奔自由的禮品，因此各國認識了蘇俄的醜惡面孔，也堵塞了中共替蘇俄捧場的貪嘴，世界各國輿論大聲呼出「謹防扒手」，可是美英原子秘密早已失竊，不啻賊去關門，多此一舉了。以上是「官方」的偷。再說說民間情形，社會上每日每個

城市行竊的新聞，若按有聞必錄，將佔盡當地報紙整個版面，猶恐登載不全，所以報館乾脆不登，請把我入俄臨時旅行所遭敘述幾項：民國廿三年，我奉交部令到新疆公幹，因爲九一八東北淪陷，要經東北入俄，必受日人騷擾，才決定從海參崴，搭西伯利亞鐵路轉新，西伯利亞頭等車是單人房間，尚屬平安，可是我領館人員仍然一再諄囑，我們也就不敢離開車廂，幸而無事，及改乘土西鐵路，那是一條才完成的路，且是爲軍事目的而建築的，一切極爲簡陋，只有三等車，車上都是長條木櫈，全然不加間隔，我們一行四人好容易擠了上車，搶到長櫈安坐，車廂擠滿了人，沒座位的就筆直站着，多是軍人，其餘的也分辨不出是幹那一行的，一律穿着破舊衣服，更看不出誰非小偷，火車開走一會，好戲隨即出場，一會這人大呼帽子不見，一會那邊又喊箱篋丟了，我們四人馬上提高警覺，行李放在座位上，大家圍坐在地下，眼睜睜望着行李，夜裏輪流睡覺，到了下半夜，有個睡在上舖的人，脚伸向外，鞋子却被人脫去一隻，急得直嚷，一夜之間，我們車廂就有三起竊盜，一列車十幾節，還能統計得了嗎？翌日到了阿拉木圖（維哈語蘋果之父）住入中國領館，等候新疆省的入境證，閒中出遊，街上沒有商店，只有小市場，商品寥落可憐，有的用碗裝着一磅牛乳，一斤量的麵粉，或是一碗黃豆，或是幾件舊衣，這且不管，還是談談「偷」的本題：在全市場黑壓壓大羣窮人中，只我們四個中國人是衣履整齊的紳士，窮人們衣服襤褸，走來走去，都像無業游民，眼光四射，搜求獵物，一會那邊打起來了，說是偷了東西，一會兒這邊又打起來，也爲失竊，此起彼落，目不暇給，洋洋盈耳。三年之後，中日大戰期間，我又赴新接收蘇俄軍火，兼辦俄運送軍火車隊的招待事宜。由猩猩峽至甘肅的安西，延伸到陝西的西安，我國共設廿四個招待站，等於現在臺灣的美軍招待所，雖沒有美軍招待所設備考究，大致已夠得上一般醫院的三等病房，或一人一床，或是通長的木炕，每一床位都是白細布棉被棉褥，更有三條輪換的臥單，吃的更夠標準，在西北牛羊肉是取用不盡的，雞鴨蔬菜源源不絕，上海人所稱「羅宋湯」的原料，即是牛羊肉加洋芋、包心菜，正是西北特產，因此把老毛子司機餵得腦滿腸肥，有了活力，便在各招待所施展手脚，先是偷食堂刀叉，繼而殃及臥單被褥，我們明知其故，礙於賓主友誼，怎好公開報破，日久數大，無力補充，才向俄總代表交涉，得到許可，如確知某人行竊，負責憑物證罰款，數日後，車隊開過蘭州，我方招待人員早已注意，翌晨開車前，請總代表派人共同查驗，搜出臥單十六條，被單四條，都是綁在圍腰，外面加上他們又粗又厚的大衣，滑眼絕對看不出，再向腿上老皮靴一掏，掏出刀叉滿地，結果贓物截留，車隊開走了事，以後歪風並未改變，依然照偷不誤。其後我又因公到過蘇俄，都是飛去的，在飛機上幸未被偷，一到地面，就得全神貫注，以免遭受災害。我曾住阿拉木圖蘇俄招待所，樓房華麗，稱得上美奐美倫，招待生是些中年婦女，亦各略具丰姿，蘇俄縫紉機都是手搖的，第三天早晨，三個招待生吵作一團，聲音很大，我

叫她們雅靜一點，不要妨礙睡眠，一個高個子身材的對我說，她借得一架縫紉機，睡覺時放在桌上，天亮起身一看，已沒有了，指係另一招待生入睡略後，忘了關門，以致被竊，因此爭吵。我又閒來無事，上街觀光，也可說是舊地重遊，時隔六七年，照蘇俄幾個五年計劃說阿拉木圖已成繁榮都市，我尋到前幾年到過的市場一看，真把我嚇了一跳，所謂新興都市仍是那般「兇樣」，慘兮兮的正如叫化大集團，竊風通行，無人在意，偷的與被偷的雙方惟力是視，誰的氣盛力大，能把對方制服，東西就歸了誰。我離開市場，走到通衢，在別的國家，應是商店林立，氣象萬千，阿拉木圖不然，家家門戶緊閉，究竟裏面有沒有人，我們初來，可不知道，街上行人很少，都是些老者和小孩，中年男子少見，那是因為大戰發生，壯丁都被徵調，街上無什好看，惟一觸目的，又是偷的場面，一個老太婆從鄉下趕着牛車，車上裝滿木柴，進城變賣，老太婆伏臥車上，趕着牛走，儘管這樣，頑童們還從車後抽取一枝一枝的木柴跑去，老太婆毫無辦法，假使下車追趕，不但木柴將盡，尤恐牛與破車一並失落，此我在俄境旅行窮途其盛，絕非道聽途說，故為宣傳也。

骯髒如同畜牲

在我腦子裏，認為俄國人的性格總是突出的畸形，正負兩端距離懸遠，不像別的國家，人民貧富智愚雖有距離，總不會相差十萬八千里。先就整潔與骯髒方面來說，蘇俄富貴人家當然講究清潔衛生，窮人就顧不了許多，勞工階級沒財力與時間化妝修飾，可是至少吃飯與大小便的地方總該分離的，蘇俄窮苦人家，冬天怕冷，竟不出門，室內即可大便。村鎮中也很少公共廁所，偶有一二所，竟是滿地金汁金條，無從落腳，尤其可怪的是大家不用草紙，恬然不為意。蘇俄東部鄉下，以手代紙是最通行的，所以廁所牆上，手印斑斑，旅館廁所牆上，更是皇皇大印。猶憶抗戰後期，我任中蘇航空公司董事，曾與交通部派航政司辦吳元超、及新疆外交特派員吳禮泉先生，民國三十三年二月到阿拉木圖開第三次公司董事會，蘇方派中蘇航空公司董事兼總經理郭魯諾夫，及公司會計主任民航局機組長沙甫洛夫出席，六人都住阿拉木圖省政府招待處，那是一所高等建築物，暖氣水管、抽水馬桶俱全，可說是完全「現代化」，惟因戰時關係，沒有煤燒，暖氣停止，自來水管凍結，當冬令零下三十八度，我三人整天穿着皮大衣開會，吃的是自己從地帶帶去的麵包，牛肉罐頭等，最困難是早晨洗臉水問題，中國人習慣洗臉用熱水，這裏連涼水也沒有，招待處在城外廿里的鄉下，全靠三個下女到附近山上拿些白雪，放鍋內溫化成水，給我們洗臉刷牙。我每天起身最早，向下女要得一大碗水，連洗帶刷，再回到屋裏穿大衣取暖，三個俄人起來，相繼到盥洗間洗臉，怎麼弄來的水，可不知道，最後是我們吳幫辦起來，披着大衣到廁所，俄式擦臉毛巾，總是一條很長很長的掛在牆上一個木軸上，誰要使用，往下一拉，就換出一段新毛巾供你擦手擦臉，很是方便，吳洗好了臉，把毛巾往下拉，想要擦乾，忽聞一股臭味，

吳近視拉近看看，不料拉得太近，抹了一鼻子的臭屎，氣得他大發脾氣，高聲叫罵，我以為他同誰打架，出去一看，他執毛巾，示我：「你看這些王八龜子，拉屎用手擦，又用毛巾擦手臉，這真不是人類的國家。」我勸他再洗，他說向下女要水比要油還貴，我找下女交涉，她說現在這盥水是你們吃早茶用的，費盡唇舌，才倒了一大茶杯水來，吳君勉強洗過，仍是氣虎虎的，我再三勸解說，這種事在蘇俄不算稀奇，你到鄉下看看，那些窮人污穢如豬，又何必少見多怪呢？

蘇俄人生性遲緩，與之共事，須有極大耐性，他們的時間不值錢，叫他守時，比登天還難，坐下開會，廢話又多得很，一談就是一兩小時，還沒盡興，完全是賣膏藥一般，自吹自擂，看看聯合國蘇俄代表長篇闊論的那一套，載在報紙上，令人十分噁心。這一點我又受其害的，我在西北辦理蘇俄軍隊招待三年，及辦理甘新驛運兼任中蘇航空公司職務期中，都須與之坐下來談，一經開始，就等於坐在嚼後吐出的膠皮糖一樣，永遠扯不盡，拉不斷，去飽聽他們「黨八股」的宣傳。時間在俄國不值錢，尤其在交通方面，有鮮明的表現。歐美文明國家都將時間把握得很準，在蘇俄全不重視這檔事。大戰期間，有這樣一個國際間的諷刺：說有一個旅客經過德俄兩國，在德國車站問站員，火車什麼時候可到？站員答八點五十五分三秒，客人很奇怪的再問，怎麼火車行駛還以秒論？站員說，「打仗的時期，分秒在所必爭！」果然，德軍準時到達了。幾天之後，他入俄境，問火車何時到站，站員答覆：「誰知道呢！今天，還是明天！」客問：「行車沒有固定的時間嗎？」站員說：「打仗時期怎會有一定的時間呢！」以上雖然出於戲謔，可是描寫盡了這兩國人民的習性。我自離開學校，就到哈爾濱工作，頻年都與白俄共事，以後抗戰，又到西北辦理赤俄軍火運輸事宜，白俄赤俄，他們均非惜時如金。請看西伯利亞鐵路國際列車，豈不是有名的誤點專車嗎！向蘇俄鐵路人員問行車時間，他們總說「一會兒就到」，他們說的「一會兒」，伸縮性很大，也許是一二小時，也許是一天兩天，你為接客送客，就非在車站坐等不可，最出你意料之外的是：火車也會提前一兩小時到達，因為司機喝醉了酒，到前站忘了停車，火車竟一直衝到下一站來了啦！

貪得無厭、得寸進尺

蘇俄國人性情十分固執，是世界上害羣之馬，半個世紀來，被他們攪得全球不安，與任誰都不合作。計自一九一七年蘇俄「窮黨政府」成立，就立刻拖着德國也建立勞農政府，幸虧德人機警，感到俄人口甜心狠，不是好的「相與」，立刻改向民主路線。土耳其受他勾引，一度成立共黨政府，因忍受不了蘇聯太上皇式的專斷橫行，也搖頭一變，改行共和政體。蘇俄乘第一次大戰之後，以「扶助弱小民族」假仁假義的口號，把捷克、南斯拉夫、波蘭、各鄰近小國，都拉入他的懷抱，騙他們掛起獨立招牌，內部當家的却是俄人，說一不二

，必須照共產主義前進，本身沒有置喙的權利，如魚入網，喪失了一切自由，永遠不得翻身。

二次大戰期間，蘇俄利用民主國家弱點，到處行規，打搶了整個中國大陸，打搶了半個朝鮮，打搶了半個越南，在西方霸佔了整個東柏林土地，打搶了匈牙利，鯨吞所至，他必要作主人翁，稱太上皇，喧賓奪主，一切由他擺佈，稍有不滿，便是取而代之，這種例子多得。若是遇到強有力的主人，一脚把他踢出去，這種例子也多，在土耳其，在德國，他曾臉上抹過灰，捏過鼻子。拿東方來說，民國十五年，我蔣總統北伐之前，把俄國顧問斥革驅逐，纔能得到順利的統一成功，否則必是國民革命軍北伐，共產國際却在後面逐步接收，將成何種局面呀！最近大陸共匪與蘇俄決裂，那是蘇俄騎在毛澤東頭上，逼得「兒皇帝」透不過氣來，纔不再「一面倒」了。中蘇交惡，最大原因，當是北韓問題，北韓三十八度線，是三十年來蘇俄念念不忘的獵物，今竟為中共獨佔，豈能甘心！當然內幕還別有文章，還有不可告人的陰私。

俄人貪婪固執，原為天性，無論何人何事，必須大權在握，否則絕不會和平相處，例如滿清時代東清鐵路（後稱中東路）合同內，明白規定用人兩國各半，公文書中俄文並用，經兩國首長（正副局長）共同簽字，方為有效，結果路局成立後，用的人清一色是老毛子，文告全用俄文，局內沒有一個中國人，更用不着會簽，護路軍三萬，路警三萬，全是他們的，中國預繳股本五百萬兩，未徵同意，擅自存入道勝銀行，算是中國的「存款」，東清鐵路完全成了俄國獨佔資本。有人說是滿清腐敗，自己放棄權利，然而俄國革命後，亦曾鄭重宣言，「放棄所有在中國的非權益，包括東清鐵路在內」，迫我交涉歸還時，其條件之苛，尤勝於帝俄時代。民國十二年中俄會議了兩年，雖成立協定，仍堅持非法權利，致與東北當局時起糾紛，終於引起民國十八年的雙方軍事衝突。至於抗戰期間，為他本身解除日本威脅，以武器援助中國，因事實需要，並成立中蘇航空公司，其合同種種，亦如中東路約，即公司職員中俄各半，文告中俄文並用，並經中俄正副經理共同簽字等等，迫公司成立，在迪化開始營業，又是蘇俄一手包辦，我交通部派員六個，他只接受董事兼協理劉唐領一人，其餘一概擋駕，劉幹了三年協理，沒簽過一個文件，沒到過一次飛機場，多季無煤生火，叫劉自己上街買用，麵包也歸自辦，劉幹了三年工友的工作，覺得全不是味，向交通部辭職，當時我正在新疆籌備甘新聯運工作，民國三十一年秋，交通部電我兼任劉遺職務，我當時毫不考慮，立即電覆：「蘇俄把持公司已久，若不與爭，良心不安，爭則孤掌難鳴，請另派賢能」，交通部以為是我客套，委令照寄，同仁勸我「幹公司的事小，能爭回一點權利事大，不妨試試」，我往訪俄總經理，他像對馬路上一般行人一樣，叫秘書把我領進豬圈般小辦公室，有一張缺腿桌子，一張破椅，此外別無長物，多寒如冰，我室內整天沒有一個人來往，幸離我驛運處很近，有事尚可呼應靈活而已！過了一個禮拜，我問俄總經理何以沒有公文簽辦？他說：「劉唐領未簽過字，你為什麼要簽！我說：「劉不簽字，是劉違法，我必須按照合同辦事。」一場爭較，當然沒

有結果，但我每天必去，免得他又說我自己曠廢。不久，交通部令參加三十二年二月在阿拉木圖舉行的公司董事會議，我喜不自勝，預先擬好幾個提案，如人事調整，經濟公開，業務改進，公文程序等，先呈部核可，屆期部派三人，蘇民航局派三人，如期開會，俄方議案我們無異議列入議程，我們議案，却被一口回絕，說董事會無權討論中國提案，爭執了三天，毫無結果，開了一個星期的會，最後通過了一兩件小案，說明交由總副經理回新南酌進行，回到迪化，我以為總已不成問題，第一件是公司存款改存新疆省銀行，不再交由蘇俄駐迪館保管；第二是行文必須經協理會簽，方為有效；第三是機身要標明「中蘇航空公司」華文字樣，除外幾件小事，都是經董事會正式通過簽字，並註明回迪化立即施行，不得再有異議的。回迪三天，仍無公文會簽，我去質問，他說「以往未會簽，現在何須會簽」，我說「章程有規定，董事會議有決議，會議紀錄不是現在擺在你的桌上嗎！」他語塞，但仍借辭推延，我當然不想立時翻臉，不斷加以敦促，一次兩次，一天兩天，一月兩月，牛步的催促下去，照以往的經驗，明知一切枉然，我總拿定主意，每天一次或兩次，到他辦公室窮泡，使他身心不寧。一拖一泡就過了三四個月，毫無進步，我們兩人的容忍都到了最後爆發的程度。六月底某日，我們相見，他表現很高興，我勉強笑說：「今天很暖」，他說：「不錯，天氣熱了。」我說：「以前決議機身漆中文名字，你說天凍漆不上，現在可不凍了呀！」他的豬肝臉立即發紅說：「何必急急呢？」我問他：「還要等幾年？公司合同只訂十年，現在已過了五年，你怎麼說？所有議決的問題今天都得決定，存款、人事、會簽、漆名、營業等要立時實行，不能再拖。」他說是守蘇俄法令，我說：「這是迪化，這是中國，你必須遵守中國法律，你要違法，中國就可逮捕你。」他氣得說不出話來，把桌上茶杯拿起重重一放，滿桌是水，我拿起我的茶杯用力往地下一摔，玻璃粉碎，水花四濺，我立刻站起來，右手伸進褲袋，他明白我是摸的什麼，不再說話，我厲聲逼他答覆，秘書科長們紛紛跑進來，把他推出去，把我送回來。我想行動必須再進一步，就拿起電話，通知新省外交特派員吳醒農先生，他是公司董事長，報告經過，再電告省政府轉知各屬機關，凡本公司公文沒有我的簽字，請都退回，（因為戰時關係，公司買東西也須我簽字為憑），這一招很靈，發生了作用，過了一個星期，秘書到我辦公室來，很禮貌的說：「協理先生！這些日，出去的公文都被退回了。」我故意的問：「什麼公文？我沒見過。」他說：「我們三天都買不到麵包和煤了！」我說：「現錢現買，那能買不到。」他說：「仍須有公文證明」，我說：「哦！這是戰時管制的關係呀！」他不得要領，走了。又過三四天，看門人老周（是公司惟一中國人）告訴，蘇俄總經理要走了，我說：「他常常回國作報告的」，周說這回把所有東西都打了包，連小孩的車子都已捆好，是不再回來的樣子，果然！這老毛子不辭而別，真的走了。幾個月後，交通部接到蘇民航局抗議，說是我把總經理趕走的，我也就此辭去協理職務，以「車」換「砲」，棋局總還不壞。（待續）

西藏在我國經濟上的地位

白曉麟

西藏爲我國喇嘛教之聖地，也是接受佛教早期的發源地，其藏地政教領袖達賴喇嘛及班禪喇嘛，爲歷代滿清皇帝所冊封，一般人都稱它爲佛地，西藏對我們國家在經濟發展上，有雄厚的潛力，它有很豐富的天然資源，也有少數的人忽略了它，說它是高寒地帶，是不毛之地。其實並非如此。曾了解西藏的人把它比擬爲北美加利福尼亞州第二，它的出產有金、銀、銅、水銀、瑪瑙、琥珀、燕石、珊瑚等。藥材最爲著名的有藏紅花、當歸、大黃，爲國藥中高貴藥材之一，產地亦分佈於全藏各地區。

藏境河川大都流出沙金及其它貴重的礦苗，據外國許多到過西藏的地質學家說，藏東礦金是取之不盡的，一旦開採當可成爲我國的寶庫。藏地森林業特別發達，它橫斷西藏各大山脈，雅魯藏布江下游，氣候濕潤，雨量充沛，爲我國第二個原始大森林帶，其林地面積之大，僅次於東北。畜牧事業以犏牛、羊、馬爲主，農產品中燕麥爲藏胞的主要食品，犏牛、羊、馬，也爲藏胞的財富之一。社會階級制度劃分嚴格，喇嘛活佛地位崇高，不負納稅的義務，平民則一律要負納稅的義務。

西藏的各大寺院是藏區最大的特色，往日可以任人朝拜頂禮、朝聖時人山人海，每逢開放時，常有自西北各省及蒙古貴族前往朝聖，並遠道攜帶金銀、珠寶、玉器、獻給活佛及喇嘛們，人們都認爲奉獻金銀珍寶越多，得到的祝福也就越多，加以西藏的喇嘛及其世襲的貴族們，又多半喜歡積聚黃金珠寶，各寺院內的主持們，將遠道朝聖者奉獻之珠寶，都埋藏於寺院中。

過去七百多年來，西藏歷代喇嘛所積傳下來的金銀珍寶，並非屬於私有，而是分別置於兩大城市和四個主要寺院裏面，其中以西藏首府拉薩爲最多，由於拉薩市內的宮殿及寺院林立，除用金磚金瓦建築外，裏面還有數不清的金質佛像和其它寶物。例如市中心最大的建築物，當推唐代文成公主所建的那座「大昭寺」，寺內佛像頭上都戴着純金冠冕，正殿上的佛像冠冕並鑲有卅六顆鑽石、佛前一盞用純金質製的酥油燈，高達五尺三寸，重廿二斤，該寺其它每一個神殿，都有若干無價之寶陳設着，而這些寶物又多用黃金鑽石所製成，大昭寺以外的「小昭寺」，相傳係唐代文成公主的修道所在，她爲了思念故鄉，因而把「小昭寺」的正門向東開，裏面所陳設的計有黃金椅，金質佛像多尊，瑪瑙、琥珀等珍貴寶藏，僅次於大昭寺的「布達拉寺」，又稱布達拉宮，爲歷代達賴喇嘛的宮殿，該宮高三層，頂上蓋金瓦，裏面的幾十座佛殿，一律燃上酥油的金質燈盞，氣象雄偉，長年香火鼎盛。

西藏自第一輩達賴喇嘛起轉世至第十三輩止，每一輩達賴喇嘛各有一座金

塔，作爲安置他們的法身，並且每座金塔的鑄造都用黃金達十萬兩以上，更綴有無數的寶石以爲裝飾，單就這十三座金塔及陳設而言，已無法計算出其中的財富，何況還有其它無數的佛殿、佛像及無數的寶藏。自毛共侵佔西藏後所掠奪的黃金和寶物，預計將在六十多億美金的數字，又從其它各種匪情資料中知悉，金佛、珠寶、鑽石賣到英、法、義國家居多數，還有少部份賣至中東回教國家，以及由香港轉賣給其他的國家。

西藏拉薩市郊的寺院也有三大座，其中以「德本寺」的規模最爲宏偉，建築頗具匠心，這座建築物經考證已有五百七十年的歷史，昔日寺內經常住有學經誦道的喇嘛達七千七百人之多，其中還包括內地及其它國家來藏留學的僧人，總殿設於寺的中心，屋頂也像布達拉寺一樣蓋金瓦，該寺的裏面之酥油燈盞，百分之八十是金質的。其次爲「色拉寺」，規模雖不及前者，寺內只住有五千五百名喇嘛，然其聖蹟特多，向來爲世界佛教國家所重視，其最著名者爲「陀羅經文」，該經置於色拉中保存。

相傳該經來源，自遠古時代有一塊平滑的大圓石，從天上降落下來，圓石上面滿佈「陀羅經文」，祇要用一塊黃段子拓印圓石上面之經文，如將拓印經文覆蓋在一個人人身上，便可使死者不入地獄，真是法力無邊。倘若死者非修道有素的喇嘛，則不能享用，據說這塊圓石爲喇嘛帶走，並藏於一個深山中，後來毛共侵藏大事搜括寶藏，爲了追究這塊寶石，先後殺死了四百多個喇嘛。

西藏在國防上，地位之重要，即以其地理環境而言，境內多橫斷山脈及河川所構成，與我國其它各省不同之處甚多，地勢險峻，爲各省區之冠，更由於天然氣候之特殊，每年除七八九三個月外，其餘季候均不良於行，故建設西藏，鞏固西藏，自有其特殊條件，因此我人當了解西藏民情風俗之多彩多姿。西藏社會保守風氣之形成，因受地理環境，對外交通不便之因素所造成，但在防守上，則有天然優越條件，值得重視，如要保衛西藏，即等於保衛青海西康及西南之四川省，在國防上的重要性，較之西北之迪化，東北之瀋陽，可謂國防上鼎足而三之重點也。

藏胞爲構成中華民族之重要份子，目前西藏人口約一百四十餘萬人，而散居青海、西康、新疆各地區之藏胞數達一百五十六萬人之多，合計約有三百萬人之多，大都過着簡單而清苦之生活，遵照 國父民族主義，國內各民族一律平等之遺教，國人有責待大陸光復後協助藏胞同享自由康樂之生活。西藏基於地理環境特殊，成爲尚未開發之原始區域，境內天然資源豐富，森林茂盛，且動植物產量尤爲可觀，設計以求開發，反攻後可建設爲我國西陲之重要工業區，當

可改善藏胞生活，並為國防民生依賴之基礎，

西藏於光復後將遵照 國父遺教，總統昭示，將來其政治地位按照藏胞自己的意願給予適當之處置，民族融治自在意中，但是西藏為我國西陲重鎮，與印度關係密切，哲孟雄、不丹、尼泊爾、阿富汗諸國，皆屬毗鄰，利害相關，故建設西藏不但能鞏固國防體系，且可使哲孟雄諸國間獲得和平與安定，而與中印文化交流及民族團結上，均有莫大深切關係。

因此建設西藏，鞏固邊陲，應為復國建國中之首要工作，值得國人重視，我人更應本 國父遺教暨 總統歷次昭示，使西藏成為民族平等，民主自由，與民生幸福的近代化的三民主義新西藏。

至於藏地經濟建設，應配合國家經濟發展之需要，分別緩急，循序進行，其重點有五：

(一) 一般建設：

- 一、西藏工礦產業，應極力經營與開發。
- 二、藏地應舉辦各種合作社，並積極扶植合作事業，俾以增進西藏經濟的開發。
- 三、藏地應舉辦各種專業人才之訓練，以應西藏經濟建設之需要。
- 四、西藏地區交通建設，應配合西藏經濟發展進行。
- 五、西藏地區對外交通應積極建設。
- 六、藏地重要城市應普遍設立銀行，必要時得設置各種保險公司，融通各項資金，以應建設需要。

(二) 農業建設：

- 一、調查西藏地區農業情形，協助其改良。
- 二、本耕者有其田之原則，扶助自耕農，獎勵藏胞自墾自耕。
- 三、詳細測量荒地面積，研究土質氣候，尊重西藏同胞意見，劃定農牧區域。
- 四、普設農業試驗場所及示範農場，以改進農業技術，消除農田租佃方式，擴大生產。

五、興修水利，以利灌溉。

(三) 畜牧業建設：

- 一、於西藏重要地區，設立畜牧改良場，促進畜牧事業。
- 二、增進現代化之各種乳肉品加工廠，發展西藏乳肉業現代化之加工廠。
- 三、增進獸疫防治所及血清製造所，並在各牧區分別增建獸疫防治站，以減少畜牧病害。
- 四、於西藏畜牧區，增設各種毛革加工廠，以提高牧畜毛革之價值。
- 五、改良牧草貯藏之方法，以增進牧畜飼料之質量。
- 六、普設獸醫院及獸疫防治中心，以減少獸類的傳染病，促進家畜的繁殖。

(四) 電力建設：

- 一、在雅魯藏布江利用水之急流，設立現代化的水力發電廠，以供藏地及藏胞之需要。
- 二、設立國家科學研究院，研究山川蘊藏之稀有礦苗，以供給國家，用於造福人羣之核子發展。
- 三、設立各種電力訓練班，以備各方需要。

(五) 衛生建設：

- 一、設立現代化的醫院及衛生所，改善人民生活環境，減少疾病的困擾，維持健康，增進幸福之生活。
- 二、設立醫學院或醫科專門學校，訓練培養藏族醫護人員。
- 三、政府對醫學專科學生成績優秀者，得以公費保送國內外醫學機構深造，以提高西藏地區之醫學水準。

(六) 文教建設：

- 一、普遍設立國民學校，掃除文盲。
- 二、推行國語運動。

獻文

粉碎共匪統戰陰謀、開創反共復國新局

陳裕清

(中央社臺北四日電)中國國民黨中央海外工作會主任陳裕清，今天在中央聯合總理紀念週作專題報告時說：我們不為利誘、不為勢利的定力，以及絕不與共匪和談的定策，舉世週知，所有海內外愛好自由的中國人，莫不堅決支

持。這是民族大義之所在，這也是絕非共匪統戰所能突破的政治防線。中央聯合總理紀念週今天由中央評議委員張羣主持。陳裕清是以「粉碎共匪統戰陰謀，開創反共復國新局」為題提出專題報告，他指出：在當前迷惘

的世局、談判的時代中，國際間多邊與雙邊的談判，正如雨後春筍，紛至沓來，所有分裂的國家也莫不在進行談判之中，我們何以不能與匪談判呢？我們不能與匪談判的理由，簡單而明確：

第一、我們反共復國的鬥爭，不是爭奪政權，更不在於分配政府的席位，我們所爭的是國家民族的大是非；我們鬥爭的理想，是中國人自由生活方式的維護，中華文化優秀傳統的發揚，與乎國家現代化的促進，這其間沒有妥協的可能，更無和談的餘地，只有推翻共匪，光復大陸，才能實現我們鬥爭的理想與目標。

第二、國際間分裂的國家，皆因國際協定而形成，其間或有談判的基礎。我們國家的分裂，則是共匪武裝叛亂的結果。因此，漢賊不兩立，我不滅匪，匪必滅我，何能談判妥協呢？

第三、共匪向以和談為鬥爭的另一方式，從無以和談為解決問題的真情實意，韓戰和談如此，華沙會談亦無例外。我們與共匪具有長期談判的實際經驗，我們不重蹈覆轍。

當前共匪對外態勢

共匪現在整個對外的態勢，乃是全面的統戰，在國際政策上，放棄了反「美帝」、反「各國反動派」的基本立場，亦不再以日本為假想敵，而在世界的規模上，展開「笑臉攻勢」，爭取國際社會的同情與尊重，圖謀將我隔離孤立，在海外華人社會中，共匪的統戰，是「政治攻勢」，其主要的策略，是散播和謠言，號召回歸，促成所謂中國統一運動，其目的則謀破壞海外華人對於中華民國的信心與向心，使我在海外華人社會中，陷於完全的孤立，與此配合的，是其對內策略上，繼續並加強所謂無產階級文化革命以來的清算鬥爭，特別是權力鬥爭。最近共匪雖然解放若干文革時期反對毛澤東的幹部，但這決非權力鬥爭的終止，而是權力鬥爭另一形式的發展。共匪現階段的戰略，顯然就妄圖以對內的鬥爭和對外的統戰，改變其內憂外患的困境，從而貫徹其「解放臺灣」和「造世界的反」的戰略目標。

所以共匪當前的對外態勢，從滲透、破壞與武鬥，轉而為「笑臉攻勢」與「政治攻勢」，實係其在內憂外患、危局敗勢中迫不得已的措施，是其衰弱破敗的暴露，決非其穩定強大的表現，共匪如果確是穩定強大，他何須放棄立場，改變策略，處處笑臉迎人呢？

共匪現在所感受之內外的存在威脅，至少亦有下列三方面：

- 第一、金馬臺澎革命基地的存在與發展；
 - 第二、蘇俄勢力的滲透與軍事上的包圍；
 - 第三、大陸內部反毛反共勢力的滋長與結合。
- 這三種威脅單獨的或任何兩種綜合的演變，均足以致毛共偽政權於死命，

毛共今日之中心無主，自亂步調，決非偶然。

匪俄之間難免一戰

蘇俄對毛共偽政權的威脅，年來真是與時俱增，現在國際間研究匪俄關係的專家，大多認為匪俄之間的戰爭，不僅可能，且是無以避免的，此種判斷的理由，簡言之約有：

一、就蘇俄的兵力部署看，蘇俄部署於共匪邊境的部隊，其兵力總在一百二十萬到一百五十萬之間，約佔蘇俄總兵力三分之一以上。除非蘇俄決心對匪一戰，拔除共產集團分裂的禍根，何須部署百萬的大軍。

二、從蘇俄的國家企圖論，蘇俄的戰略企圖，在於摧毀共匪的核子工廠，殲滅毛匪軍事的主力，現在幾是人所共知。美國專欄作家艾索普與安德森兩人先後報導，蘇俄曾向美方透露此種戰略的企圖，但均被尼克森總統，以違背美國的國家利益為辭，斷然拒絕。美國前任駐義大利大使魯斯夫人，亦曾透露，蘇俄兩年以前，復有類似的表示，而遠東問題專家邢頓教授在其所著的「中共瘋狂的追求」一書中，指陳一九六九年，蘇俄即曾私下徵詢華府對於摧毀共匪核子設備的反應，華府的答覆也是否定的。新近出版紐豪斯所著之「冷靜的開始：限制戰略性核子武器談判之故事」，則謂曾任匪俄談判代表的蘇俄外交部次長謝米諾夫，曾向美國限制核子武器談判代表史密斯建議，美俄簽訂協議，聯合制裁中共任何挑釁行動，蘇俄對匪一戰的企圖，實是顯明之至！

三、自蘇俄的外交運用言，蘇俄年來在歐洲全力尋求和解，其目的自在促成歐洲的和局，以免將來陷入兩面作戰的困境；在亞洲方面，蘇俄除與印度簽訂二十五年類似軍事聯盟之友好合作條約外，更是高唱建立亞洲集體安全制度，大力爭取日本、泰國、菲律賓、孟加拉與星馬各國，其作用無他，願謀博取彼等的同情，支持蘇俄的立場。此外蘇俄對於美國的關係，最近更從裁軍、貿易與文化交流各方面，謀求大幅度的改善，月中俄共總書記布列茲涅夫之訪問華府，亦是蘇俄外交運用的繼續發展，這種運用的目的，自在配合蘇俄對匪的戰略企圖。

匪俄戰爭不可避免的態勢如此，共匪自知不是蘇俄的敵手，因乃不顧其立場，聯美親日以自重。防制蘇俄的軍事行動，然世局演變無常，巨強的國家利益，每難相容，且亦變動不居，共匪的「笑臉攻勢」，未必即能貫徹其戰略的要求。

大陸仍是支離破碎

今日中國大陸的形勢，在共匪全面統戰的運用中，似是平靜無波，實際却是一座火山，一顆定時的炸彈，隨時皆有爆發的危險。現在大陸上，一方面共

匪的權力結構，仍是支離破碎，另一方面大陸上反毛反共的力量，不獨不因林彪之被整被殺而稍戢，且在「林彪事件」之後，更形滋長發展，而一般人民的反共反毛，則因年來糧食不足，生活艱困，愈形激烈。最近共匪統戰的普遍運用，大陸鐵幕有限度的開放，更使大陸匪軍匪幹，思想紛歧，情緒不安。重增大陸的動盪不安，這種情勢絕非共匪策略的改變所能穩定，亦非共匪統戰的運用所能掩飾的。

共匪無法將我孤立

共匪企圖使在國際社會和華僑社會中，將我完全包圍孤立，使我無法繼續生存發展的陰謀，經過事實證明，現在是完全落空，此蓋由於：

第一、聯合國以及聯合國有關的國際組織，並非國際的權力機構，只是國際間接觸、集會與辯論的場所，會籍之有無，對於一國的聲望與權力地位，並無重大的影響。

第二、當今世界各國，皆採政經分離的政策，目前與我具有貿易等各項關係的國家，約在一百二十國以上，足見我在國際社會上，實質上並未孤立。

第三、目前國際市場的結構複雜，共匪若圖以傾銷的方法，破壞我們外銷，阻撓我們的國際貿易，終必損及其他國家的商人，勢將遭受多邊商人的聯合抵制，所以共匪至少在現階段，不敢也無力以傾銷破壞我們的外銷，打擊我們經濟的正常發展。

第四、共匪現在雖在世界規模的華僑社會中，展開心理的政治攻勢，製造華僑社會的分裂，但海外多數的僑胞，仍然維持其對中華民國的信心與向心。

自立自強開創新局

目前共匪在國際間，特別是在華僑社會中，故弄玄虛，擴大和謠的播散，妄圖藉此淆亂敵友的關係，造成邪正不分的氣氛，打擊僑心和士氣，實則我們不為利誘，不為勢規的定力絕不與共匪和談的定策，舉世週知，所有海內外愛好自由的中國人，莫不堅決支持，這是民族大義之所在，這也是絕非共匪統戰所能突破的政治防線。

我們今日的國際處境，表面上固甚艱險，唯在實際上，我們自強自立，開創發展的條件，却是優越之至，較諸過去若干重大的革命鬥爭，有過之而無不及。

所以共匪統戰的陰謀，決難得逞，我們反共的立場不變，復國的決心堅定，我們一方面固應澈底粉碎共匪的政治攻勢與笑臉攻勢，穩定海內外的民心與士氣；另一方面也要在撲朔迷離的世局中，在大陸主戰場上，結合反共反毛的勢力，展開反共抗暴的鬥爭，然後裡應外合，開創新局，摧毀毛共，光復大陸，完成國民革命第三期的神聖任務。

稿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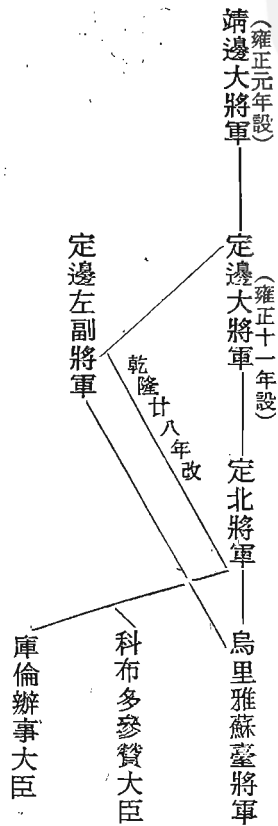
- 一、本刊園地公開，歡迎作家學者賜稿。
- 二、文字請用語體，用方格稿紙繕寫清楚，並加新式標點。
- 三、文章中如須加註外文者，務請書寫清楚，以便排字。
- 四、本刊篇幅有限，除特約稿外，六千字之稿件最所歡迎。
- 五、請勿一稿兩投。
- 六、請勿抄襲他人作品，以免自毀聲譽。
- 七、譯稿請註明出處或附寄原文。
- 八、歡迎有關評介研究前人對邊疆工作暨各種建設措施之文稿。
- 九、歡迎有關邊疆各省區反共抗暴活動報道性文章。
- 十、惠稿本社於必要時得斟酌損益，但絕對尊重作者原意，不同意者，請先註明。
- 十一、稿酬從優。

刊誤更正

- 一、本刊第四十一期第三十頁所載哈勒楚倫先生大作，題文「蒙古駱駝」誤為「駱駝蒙古」，特為更正，並向哈先生致歉。
- 二、同期劉學銑先生大作「內外蒙古及其界域」一文，最後附表原請工廠製鋅版，排版時未加注意，致缺劃線數條，特為補正，並致歉忱。

附表

靖邊大將軍職銜演變表



獻文

突破艱危、開創新局

在臺灣省行政會議專題講詞

吳俊才

(中央社臺北七日電) 中國國民黨中央文化工作會主任吳俊才，今天以「突破艱危、開創新局」為題，在臺灣省六十二年行政會議中發表專題演講。下面是吳主任演講的全文：

主席、各位先生：

今天是本省六十二年度的行政會議，個人能夠應邀參加這一盛會，深感榮幸。

各位先生在謝主席及歷任主席的領導之下，遵照中央的決策，辛勤建設，已經獲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像最近所推行的小康計劃，尤其是極富創意，裨益國計民生全面性有系統的實際工作。這些成就和工作，都是各位的貢獻，真是功在國家。謹借此機會，首先向各位致祝賀之忱。

同時，今天也想與各位先生討論一些我們所共同關切的問題，以下分四個要點來說明。

壹、越戰停火以來的國際形勢新變化

越戰停火，我們判斷並不等於是真正和平的到來，而祇是另一形式鬭爭的開始。國際情勢錯綜複雜的變化，將會比以前更為緊急。

值得特別注意的，是美國在越戰停火以後，其國際地位的變化。這與歷史上美國每經一次國際戰爭，而其國際地位隨着提高的史實，不盡相同。十九世紀末葉的美西戰爭，曾使美國從大西洋國家變成兩洋強國，其後兩次世界大戰乃至韓戰，都大大擴展了美國在國際上的影響力量，何獨越戰之後却反而削弱了美國的地位？

原因當然是多方面的，最重要的則是美國在民主陣營之中未能充份發揮堅強領導的作用。美國外與共匪、蘇俄妥協，動搖了盟邦的信心。內受國際共黨的嚴重滲透分化，再加以美元貶值與水門事件，影響政府威信。內外因素相結合，致使越戰停火以來，美國的地位有了變化。當然這並不是實質力量的衰退而是精神意志的頹喪。由此也可看出內部問題的重要性遠過於外在的客觀因素。當一九五七年蘇俄將第一顆人造衛星成功地首先射入太空時，美國也曾一時受到很大的衝擊，但不久由於其人民的發憤圖強，旋而迎頭趕上且遙遙領先。我們相信美國面對目前的艱困，亦必能振作有為，扭轉劣勢。

貳、俄關係繼續惡化

綜合各方報導，蘇俄在遠東及外貝加爾軍區，正擴建飛彈發射基地，其燃料已可從庫頁島取給而不再仰賴西部輸送，戰略武器儲存庫亦已有顯著增加。在中國大陸邊境所部署的陸軍部隊已達到四十九個師，蘇俄三分之一的陸軍都調集在這個邊境上，尤其最近蘇俄艦隊通過臺灣海峽，更是其武裝力量的炫耀，這一切主要都是針對着共匪而發。共匪也一直在向民主國家大叫：蘇俄大軍壓境，構成了嚴重威脅。蘇俄對共匪是欲以戰迫和，希望促使中國大陸出現一個有利於莫斯科的匪偽政權。現在的問題是毛匪是否可能轉變它的策略再向蘇俄靠攏？匪俄之間有無戰爭的可能性？一般相信，毛匪存在一日，匪俄難望復和，而其衝突擴大為戰爭的可能性，始終存在。

中南半島危急

現在中南半島的戰事，不僅沒有停止，而且在寮國、高棉更是擴大進行，高棉已在危急之中，四個多月以來北越南越繼續輸入了三萬多正規軍、幾百輛坦克以及重砲。同時監督停火小組的飛機被擊落，人員被擊斃，根本無從執行任務，巴黎恢復會談並無結果，美國且已停止對海防港內的掃雷工作，停止最後的繼續撤軍，並申明將不再給予北越復員建設的經濟援助。尼克森又公開宣布，北越如不能履行和平條款，就要冒和美國繼續作戰的危險。顯然，中南半島的和平仍然遙遠，而局勢繼續緊張。

美日貿易之爭

至於美日之間的關係，日皇與尼克森互訪一事，已經宣布延期。田中將去美國，羅吉斯也要到東京來，不過這都只是一種試探。雙方之間的關係，從越戰停火後似乎在不斷惡化之中。

美日間的貿易去年是美國入超四十五億美金，美國人的辛勤所得，輕易地轉移到日本人手上。美國市場日貨充斥，美國即使是再增加進口稅，恐難短期內改變此一現象，美金雖然貶值，日本的進口貨仍然是比較便宜。這一場貿易之爭，究竟將發展到什麼程度尚難預測。

西德難望團結

在歐洲方面，美國今天所努力的乃是希望以所謂新大西洋憲章的精神，就是為建設一個和平安定而又合作的大西洋集團，包括對美的貿易合作關係來減輕美國所受貿易的壓力。但是美國同時又希望與蘇俄進一步攜手，一面與莫斯科

科談判限制戰略武器，一面以大量糧食，乃至機器設備，和信用貸款提供給蘇俄。在這種情況下又如何能使大西洋國家團結一致防阻蘇俄呢？而且美國要求大西洋國家自行負擔防衛費用，美國並準備減少在歐洲的駐軍。因此美國在歐洲所面對的仍然是一個困難的局面，主要原因就是喪失了大西洋公約組織的同一敵愾精神。

東南亞的變化

至於東南亞國家，除了越、寮、高棉以外，其他印尼、菲律賓、泰國、星、馬和緬甸，目前都在尼克森對匪妥協的政策影響之下，而受到共匪與蘇俄雙重壓力。東南亞國家當然不會投靠日本，因為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日本軍閥的侵略暴行記憶猶新。東南亞國家也不會立刻和蘇俄合作，因為蘇俄在此區域內的力量究竟有限。共匪乃得以伺隙擴展其滲透，整個東南亞與印度洋的局勢的確已到了二次大戰以後最嚴重的危急之秋。

從以上的分析來看越戰停火以後的國際局勢，顯然是比以前更形緊張，戰爭的威脅比以前更加嚴重了。整個國際形勢的變化，推究其原因，我們不得不說大半是由於美國的政策所促成。

不過這只是形勢的變化、心理的變化，與國際政治的變化，而並不是實際力量的消長。因為就越戰而言，美國並沒有打敗仗；就共匪而言，其內部的危機，不但未見絲毫減輕，且益見嚴重；就東南亞國家而言，反而認識了危機之嚴重以及必須團結內部與堅強反共的決心。希望他們所採取的途徑不要像過去的印度一樣，是內部反共而外部親匪的矛盾策略，那是危險的。

貳、從外在形勢看匪共內部危機

本質上，共匪的所作所為，只有四個字，就是「恨、狠、詐、騙」從唯物主義的理論到所謂無產階級專政，所有言行，無一不是豺狼成性，既恨又狠而且處處詐騙，時時詐騙，事事詐騙，人人詐騙。所以它們從上到下，從內到外，無時無刻不在互相恨惡，互相詐騙而又互相鬥爭。毛共認為鬥爭乃是天經地義，是人類歷史進化的動力，因為他們看萬事萬物都是自相矛盾的對立體，要解除矛盾就只有鬥爭，要進步也只有鬥爭。所以今天是最親密的戰友，明天就變成了反革命和被鬥爭的對象。家人父子、夫婦朋友之間，鬥爭成了家常便飯，毛共就是這樣一個建築在鬥爭永無休止的基礎上的政權。實則，鬥爭的功能究竟如何呢？鬥爭只有使矛盾更形複雜，鬥爭破壞了社會的和諧，使社會的進展陷於停滯，鬥爭造成冤冤相報，否定又否定永無休止，而且古今中外歷史上，那有一個內鬨不已、同室操戈的政權，能夠持久而不自趨滅亡的呢？

以最近的例子來說，曾經在六年前被毛匪鬧得團圓了鄧小平，現在恢復了偽國務院副總理的職務而又拋頭露面了，這件事所說明的實質意義是什麼呢？

呢？

鄧小平生於一九〇三年，照中國計算年齡的方式已經七十二歲，而且，還是經過拷打的關身之身，今天又被抓出來，名義上恢復副總理的職務，實質上必難發生多大作用。但這一事件可以暴露出毛匪內部的矛盾與動盪。

鄧小平在法國當勤工儉學生時就加入了共產黨，隨後到莫斯科中山大學，回國以後擔任匪黨的宣傳與軍中政治工作。共匪盤據江西時期，鄧小平被認為是毛匪在江西的小組首領，與毛匪的關係極深。匪共偽政權成立後，一九五二年出任偽國務院副總理。此期間二度前往莫斯科，其中有一次是隨同毛匪朝俄。一九五四年任匪黨總書記，並為國防委員會副主席，身兼黨政軍三方面重職，可說是十足的當權派。可是到了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時期，就成為被鬥爭的主要對象了。而且當時情形頗慘，被紅衛兵抓出來五花大綁遊街示眾。鄧小平在「自我檢查」書裏還曾經供稱：「懷有推翻無產階級專政的惡毒意圖」、「違反了毛澤東思想」、「和劉少奇一樣是反革命的代表，是修正派，不適宜於負擔黨的中央所付託的工作」，當然也免不掉是「牛鬼蛇神」，更是「一株大毒草」。

現在，這個牛鬼蛇神，居然又被抓出來亮相了。如果說現在鄧小平「復職」是對的，那末過去文化大革命時期的一切都是錯的；如果鬧得天翻地覆的文革是對的，那末鄧某之復出就是錯的。這是一個矛盾，毛澤東如何解釋？如何自圓其說？如何消除思想上的一片混亂？

文化大革命時劉鄧派之被鬥，是毛澤東利用林彪系統力量。主要罪名則是「反革命的修正派」；去年林彪被鬥垮了，毛澤東所用的罪名也還是「蘇修反革命」。我們如把當前匪區狀況作深入觀察，即可發現：劉少奇的殘餘勢力和林彪的軍人集團，都並沒有真正被打倒。現在讓鄧小平翻身，只是頂著一頂帽子出來，反過來鬥爭林彪系勢力；同時也是毛澤東對劉鄧派的安撫，對內部的統戰。這是權力鬥爭的詐術，但所造的思想混亂，却難以善其後了。

將鄧小平恢復副總理的職務，至少周恩來是贊成的，或者還想加以利用。周恩來現在所走的正是徹頭徹尾「反革命修正路線」，比劉、鄧、林彪修正的更徹底，這也是毛澤東面臨蘇俄大軍壓境內部又互相鬥爭之際迫不得已的策略。周恩來出來執行此一策略，儼然聲勢浩大，但內心却不免提心吊膽，因為江青、姚文元、張春橋等看著眼紅，決不會聽任周恩來勢力膨脹。按最近敵後消息，江青成立了一個中央江青辦公室，專門監視中共內部的中上級幹部，這個消息可能是正確的。在文革期間被關閉了的青年團，現在又恢復了活動，江青正在部署青年團的勢力。這都說明了江青為了在毛生前掌權，在毛死後自己能打天下，正在加緊安排。周恩來也瞭解，風頭愈健，也就愈接近被抓出來鬥爭的危機，因此拉出鄧小平利用劉鄧派來壯大自己的力量與毛婆勢力相抗衡。

毛周之間只是在相互利用，而彼此之間的猜忌鬭爭，日甚一日，這一種矛盾不安的局面，是非常明顯的。在民主國家的內部，如果發生這種現象，乃是反常的；但在共黨國家的內部，這種趨勢却是必然的。因而周恩來在國際上要的花招愈多，他的地位便愈危險，真是步步刀山。而共匪在國際間叫喊的聲音愈響亮也正是其內部最軟弱最困難的時候。我們不妨回憶歷史，當對日抗戰之初，共匪偏處陝北，情勢危殆，於是不得不千方百計對外展開統戰，要求國民政府收編；並拉攏史諾與斯沫特來等以及美國駐華人員，以一副弱者姿態，爭取生存。及至抗戰勝利以後，尤其毛偽政權初成立時，毛匪除了一面倒向蘇俄以外，根本不理睬美國，似乎一般民主國家都不在他眼中，因為那時毛匪志得意滿，自以為天下已定，如日中天。而現在呢？他卻要與「美帝、日帝」携手了。這種姿態，如以歷史事實來印證毛匪作法，正可以看出其內部軟弱，以及內心的惶恐不安的心理狀態。

我們分析敵情，應當從敵人內部的根本之處去着眼。民主國家想和毛匪打交道，如果不明白毛匪的恨、狠、詐、騙、固然要上大當，但是毛匪這樣一再自己否定自己的做法，又怎能不最後毀滅了自己呢？

叁、我臺灣基地當前內外形勢

最近這一年多以來，由於外在形勢的變化，國際姑息逆流的猖狂，加上敵人的統戰推波助瀾，對我們一般國民，不免在意識上產生了一些影響，這是毋庸諱言的。有的人難免因此而偏激憤慨，還有的人甚至對國家的前途，抱着懷疑。作為一個政府工作人員的一份子，尤其是作為一個臺灣基地的建設幹部，我們對這些問題的看法和想法，究竟又應如何呢？我相信我們都十分關心這些問題，並且在研究如何來解決這些問題。

舉例言之，在今年舉行的中央和地方選舉中，大家聽到有人對政府對國父之侮蔑，都氣憤填胸，但終以我們的堅忍奮鬥，更加團結，更加努力，結果是將選舉辦好，以勝利為成果，作為對那些侮蔑政府的人以有力的答復，這就是很好的證明，證明我們只要團結奮鬥，就有力量可以為國家民族前途開創新局面。現在的課題是，如何使我們所具有的這種精神力量能夠更加擴大到全國同胞，使我們無論在海外在大陸，都能在思想上激起共鳴，並能由思想變為行動，由行動發出力量。所以我們當前的首要之務，應是要在思想上下功夫，要在思想戰線上首先戰勝敵人。

有時常會聽到說，現在國際形勢不好，但是究竟是那些不好呢？我們退出了聯合國，尼克森到了大陸，美匪之間互設聯絡辦事處，我們已和日本斷交，以及更多的民主國家已與共匪偽政權締交等等，這些當然都是事實。可是我們如果再問，假如像一年半以前一樣，沒有發生這些變化，是不是今天我們的革命形勢就是格外有利，也不會發生其他的問題呢？

照那時的情形看來，大家似乎是安安逸逸地過日子，安安逸逸地享受太平

生活，至多每年緊張一次，爭取聯合國的票數，保持我們的代表權，如此而已。那時，一般人的心理，是將國家的前途，寄託在國際形勢的變化上面。對於美國，似乎總是想到我國乃是美國最忠誠不渝的盟邦，為了美國國家的長遠利益和亞洲的和平，美國是不會和侵略成性、詐騙而又多變的匪偽政權接近的。對於日本，一般人也認為即使他們忘記了我國在戰後對日本以德報怨的恩德，至少亦不至悍然撕毀中日和約，使日本不再為世界所信任。

因此，儘可和日本長期合作。至於對於敵人共匪，雖然知道它在文革大混亂之後，欲振無力，但是我們很少想到它會在對外策略上，作大幅度讓步，向「美帝、日帝」乞援，放棄它自所標榜的原則和立場。這些，就是一年半以前一般人當時的若干想法。至於這中間可能發生的變化，我們一般人都看不到，但是英明的總統早已看到了。所以前年六月就指示我們要處變不驚，要莊敬自強，要慎謀能斷。緊接着，外交上不利的形勢接踵而來，我們也隨即毅然展開了一連串的政治革新、社會革新和經濟的改革，奠定了今天內部精誠團結，堅強領導的基礎。我們並沒有因為外在形勢的變化而動搖基礎，反因外來刺激而愈發堅強有力，奮發振作有為，真可以說是從教訓的體認中收穫了成果。

面對今日的情勢，我們能夠擇善固執，我們站在民族文化興亡的觀點之上，站在國家生存的立場之上，來決定我們的信念，是理智的而不是感情衝動的。所以我們能夠在危疑震盪之中，堅持我們的理念，提振我們的精神，開展我們的革命形勢，這就是敵人所最害怕的死硬派和頑固份子。有不少人被匪共捧為前進派、自由主義份子，他們專門從事那些危害國家民族利益的勾當而沾沾自喜；但是我們却決不放棄立場原則，決心與共匪奮鬥到底，且以作為維護人類自由與正義的死硬派而引以為榮。我們為了使全體國民都能在思想上結成牢不可破的防線，必須從思想方面，作更進一步的努力。

簡單地講就是我們要抱定志願，使國父手創的三民主義能實行於全國，宏揚於世界。過去，帝國主義不容許中國有實行三民主義建設的機會，用盡各種手段來加以阻撓破壞。我們在臺灣基地，把握了一個從未有過的難逢時機，積極進行三民主義的各項建設，立即收到了豐碩的成果，可見三民主義真是救國所必需，是人民所必需。但是我們不能以建設臺灣金馬為滿足，我們要以臺灣基地的建設作經驗模範，推展於全國，也就是一定要能使主義實行於全國，使全國同胞都能共享三民主義建設的幸福。在這種關鍵性時機，我們愈要奮發這種朝氣，要用一切方法，使大陸同胞知道，我們今天一切努力的目的，就是為了使三民主義的建設能實行於整個中國，我們要激起大陸同胞的共鳴，燃起大陸內部的反共人心之火，以結束共匪的暴政。至於眼前困難頓挫之來是必然的，能克服困難就是成功。這個責任當然是重大的，我們每個人必須窮畢生之力，集億萬人之功，努力以赴，才能求其實現，應該不會有時間和精力，浪費在那些消極頹唐的思想上，或者推磨打旋於毫無意義的工作上。

現在全世界最進步的政治學說與經濟思想，就是主張謀求民族獨立、政治平等；就是要求自由民主、社會安定、或者福利社會以及財富的均足。但是，放眼全球，當今之世，除了三民主義以外，再沒有任何一種主義或學說，能同時解決民族、民權與民生三大問題。祇有三民主義的民族主義，乃是真正求全世界各民族一律平等；只有三民主義的民權主義，乃是要人民有四種政權，政府有五種治權，合成一個真正的民主政體；也只有三民主義的民生主義，採取平均地權，發達國家資本同時節制私人資本，以求得社會的均富。我們有了這樣好的主義，而且國父指示我們實行的方略，並有總統領導我們走上了實踐篤行的道路，還有什麼好猶豫的呢？

我們憑藉三民主義，曾推翻了專制，建立了共和，打倒了軍閥，廢除了不平等條約，擊敗了日本的軍國主義，並且使東南亞國家在我們抗戰勝利之後，也一個個贏得了獨立與自由。今天，我們要憑藉三民主義來和邪惡的共產主義作戰，為復興建國而努力。我們肩負了這樣重大的責任，眼前實在是有着做不完的工作待我們去完成。

形勢是每天都在變化的，我們應當把握形勢進而創造形勢，改變不利的形勢為有利，這就是革命者的特性。我們在一般的外交上遭遇頓挫，就應當發揮整體國民外交的力量去奮鬥。當年國父革命的時候，那裏有什麼正式外交呢？那裏會有大使館、領事館幫他的忙呢？可是國父却能以其崇高的理想，偉大的抱負，不屈不撓的奮鬥，博得許多國家的支持。國父堅信凡事只要是合乎人情，應乎天理，順乎世界潮流，適合人羣需要的，由我們一往無前的去奮鬥，便決沒有不成功的道理。這是國父留給我們的成功寶訓！留下的珍貴楷模。

國父在民國六年所寫的「中國存亡問題」專論裏，對於外交問題，有極精闢的分析和指示。國父說我們與各國平時雖有外交關係，却没有善用外交的手段。其實擇其不損人而可利己之道而行之，可用的外交手段實多。

國父又指出：國家存亡的根源，無不存於國家及其國民不擁獨立的精神。其國不可以利誘，不可以勢劫，而後可以自存於世界。即今挫敗，旋可獨立，不然者，雖是獨立，其亡可以指日而待也。凡其國民有獨立不撓之精神者，人以尊重其獨立有利，即從國際利害打算，亦必不敢輕犯其獨立。國父的這些指示，總統在領導北伐與抗戰期中，皆一一表現於我們始終不屈不撓的外交奮鬥上。因此北伐獲得成功抗戰獲得勝利。國父給我們的指示和總統領導我們所創造的光輝業績，將足以鼓舞我們面對橫逆衝破逆境的勇氣。

可見主要的還是思想的問題，我們要以國父的思想，總統的思想來武裝我們自己，發揮在思想戰線上莫之能禦的力量鞏固自己，攻擊敵人，敵人將是必敗無疑。敵人那種種欺騙，敵詐而又多變，為目的而不擇手段妄想侵略他人的外交，以及自相殘殺鬭爭的內部潰爛，即或能取巧於一時，但最終是絕對不可能成功的。

肆、結 論

前面是一個很客觀的分析，我們必須冷靜而客觀的做分析。纔不致使自己迷失。面對這一形勢，每一位愛國的國民，尤其是政府的幹部，對於我們應當努力的方向，必定都有若干建議和主張。

一年半以來中央的決策是十分清楚的，一方面我們遵照總統的訓示，革新內部，加強建設；另一方面蔣院長一再明白表示：中華民國憲法所制定的國體決不改變；中華民國反共復國的總目標決不改變，中華民國永遠站在民主陣營的一邊，為伸張正義公理、維護世界和平的戰志決不改變；中華民國對於共匪叛亂集團絕不妥協的堅定立場決不改變。基於上述基本決策，具體推動政治改革社會農村建設、經濟發展和總體外交。中央的決策是十分明白的，這決策在過去一年半之中已發生很大的作用。

很明顯的，我們不但是沒有在外來衝擊之中喪失信心，而且我們舉行了選臺以來規模最大的也是最成功的選舉，我們打破了過去歷年的對外貿易的紀錄，就去年而言，我們的外匯準備增加了五億八千萬美元，我們也在國家總預算之中，連續兩年出現了平衡的數字，而且對農業投資一次又一次的增加，對貿易的放寬僅僅今年三月就解除了兩千三百多種進口限制，並且一次自美國採購七億美金的民生日用必需品，而且出現了在歷史上從來沒有過的我國貨幣對外升值的可喜現象。這些都是決策的正確，大家的團結，和有利的領導所造成的。未來也許是艱難的，需要我們繼續去衝破，但是未來是光明的，只要我們能奮鬥。

我們都知道外交是內政的延長，我們更應該加一句話，必須以內部的團結來支援外交的鬥爭，以內政的建設成果來扭轉外交的劣勢。而外交應是廣義的包涵了經濟戰、貿易戰、宣傳戰、心理戰、情報戰以及對敵鬭爭。我相信以我們今天內部革新的成績和毅力如貫注到對外鬭爭的工作，一定有一個新的面貌出現。

總結來說，我們應以堅定思想為核心，進而推展內部建設，然後擴大而為對外的奮鬥，這樣纔有層次，纔有體系，纔能構成為總體。今天，我們須要昂揚朝氣，突破艱危，我們要有悲天憫人的心胸，頂天立地的擔當，來作開天闢地的事業。一切以復興建國為最後的目的，使三民主義能實行於全國，而且弘揚於世界。方今，全世界最堅決反共的就是我們中華民國；全世界也只有一種主義，最能剋制邪惡的共產主義並能濟資本主義之窮，就是我們賴以立國的三民主義，誠如國父所說：三民主義是救國主義，三民主義也是改造世界的新工具。今天，我們以一千五百多萬人的力量，在臺澎金馬實行三民主義，已能有如是的成就，如我們能在大陸實行優越的三民主義，其成就必更大，必能撲滅共產邪惡的勢力。今天，共產主義已由歷史事實證明不能適應世界，並不能與造福人類，它的理論已宣告破產。我們的革命同志都應體認我們的大責任，應抱定志願，踏實地去努力，去實踐，使三民主義弘揚於整個人類社會，制抑邪風，將人類社會導入一個幸福境界。

編後記

本期輯入較長論文三篇，一為蕭金松先生所作「清代初置駐藏大臣原因之探討」，本文對清初喇嘛教之影響力、清初達賴與準噶爾之勾結、設置駐藏大臣的直接目的等方面，均有精闢之闡述。一為「漠北外蒙古」，為劉學銑先生之大作，敘述各部族之構成、地理概況、歷史沿革，而以俄帝日帝謀奪侵略為中心。民初北京政府軍閥政客秉政，不恤國事，惟個人私利是圖，言之痛心。一為編者舊譯「滿清治新政策」，為日本京都大學教授羽田明之原著，羽田氏為故東洋史及西域史學家羽田亨博士之哲嗣，亦為中國古代史、蒙古學、土耳其學之專家，著有中亞史研究、西域文化史等書，茲將此篇譯文附麗前二文之後，以期在蒙藏新問題上得以平衡。

阿不都拉教授的大文，原為第四次阿爾泰學會的研究報告，原文為英文，承允譯為國文，賜交本刊發表，至感榮幸。

本期復承楊和璠先生遠自美國惠賜大作，不勝感激。楊先生為研究西藏問題專家，本刊上期曾刊其所譯之「西藏中部的社會階層，一妻多夫婚制及家庭結構」一文，甚博佳評，本文可供研究史料者之參考。

先秦時代邊疆民族與中央之關係，至為複雜，萬先生大作引證宏博，讀之令人有溫故知新之感。

成吉思汗為我國歷史之偉大而特異的人物，史白兩先生譯作，流暢可讀，希望能在繼續發表的文章裏，更能發現他的偉大處，可資循省，而不徒為憑弔之資料也。

共匪近在海外大搞統戰工作，胡謔所謂「回歸」「認同」、妥協談和，認識不清或健忘之人，亦有被蒙蔽而上賊船者，陳裕清、吳俊才兩先生的諷詞剖析明確，是迷惘世局中的一盞明燈，至祈細覽參考。

顧耕野先生早年在東北西北歷任要職，因其長年與俄人折衝，故對俄人性格之認識，至為透澈。本期所載「蘇俄人的民族性」一文，為友人央其記錄，內容精彩生動，非耳食傳聞所能比。顧先生以高年碩德，猶孜孜不倦寫作賜稿，光我篇幅，至為銘感！

上期「編後記」第四行「再由我接過來」數字，應在第二行「這梓子」三字下，上版時弄錯，特為更正。

中華民國六十二年六月出版

中國邊政季刊

第四十二期

發行人：張志智

社長：周昆田

主編：宋念慈

發行者：中國邊政協會

地址：臺北市羅斯福路四段一〇七號
電話：三四三〇二九

印刷者：清水印刷廠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臺北市中山北路一段七一號
電話：五四五九二四，五四五九二八